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吕同六 主编



YIDALI
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千方百计

莱奥纳多·夏侠 著

李国庆
吕同六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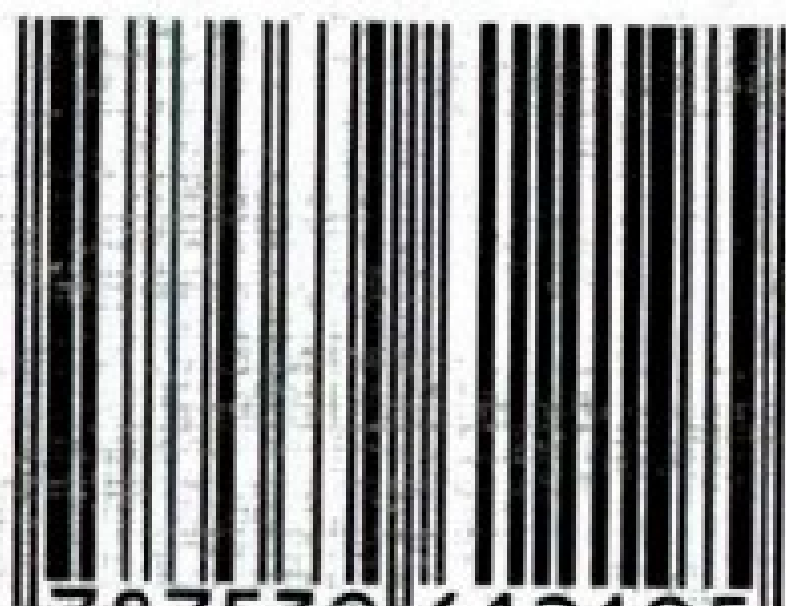
千方百计

吕同六 主编



责任编辑：张 磊
装帧设计：林 敏
丁 明

ISBN 7-5396-1219-3



9 787539 612195 >

ISBN 7 - 5396 - 1219 - 3 / 1 · 112

定价：5.40元



YI DA LI ER SHI SHI JI WEN XUE CONG SHU

登录号

120366

分类号

1546.45

种次号

003

千方百计

莱奥纳多·夏侠 著

李国庆 译

吕同六

吕同六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石油0111837



(皖)新登字 04 号

莱奥那多·夏侠 著

千方百计

吕同六 主编 吕同六 李国庆 译

责任编辑: 张 磊 林 敏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 行: 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60,000

版 次: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5396-1219-3/I·1120

定 价: 5.4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探究光怪陆离的西西里

——评夏侠黑手党题材小说

吕同六

毋庸置疑，黑手党是意大利最独特、最敏感、最引世人注目的问题。世界各地的通讯社、电视、广播，几乎没有一天不播出跟黑手党相关的新闻。时至今日，人们围绕黑手党撰写了无数的著作，其中不乏读起来饶有兴味的书籍，或者堪称情深博大的学术著作。一位西西里作家甚至写了一部喜剧，那简直是一份为黑手党涂脂抹粉的辩护书。而在蔚为可观的文学作品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胆敢触及黑手党问题。只有一个人这样做了。他就是——夏侠。

夏侠以写西西里黑手党和政治题材小说而跻身文学大家之列，其声誉远远超越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其影响则大大超越了文学领域。夏侠获得如此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步登天的。意大利动荡而微妙的社会、政治环境，终年累月扎根于西西里故土而汲取的滋养，坚定的人生信念，执著的艺术追求，当是造就夏侠的成长与成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莱奥那多·夏侠(Leonardo Sciascia)(1921—1989)，是西西里人，他的家乡是位于这个岛屿最南端，也是整个意大利最穷困、最偏僻的阿格里琴岛地区的一个小镇，名叫雷加尔穆托。他的家庭是世代矿工之家，祖父当过硫矿的工人、工长，父亲也一辈子跟硫矿打交道。在故乡度过少年时代以后，夏侠进入省会卡塔尼塞塔的师范学校就读。1941年，年方二十的夏侠回到雷加尔穆托，进入一家粮食收购公司当职员。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有机会熟悉小城方方面面的生活，接触小城形形色色的人物。

1949年，夏侠执教于家乡的一座中学。平静的校园没有能够使他胸腔中一颗年轻、躁动的心平静下来。他深深感到痛苦，他是位教员，但他觉得，他同宪兵、官吏等政府的其他“工具”相去不远，政府赐给他们面包，他们便沦为那些为害贫苦人民的骗子的同谋。1956年，他毅然辞去教职，到省教育厅工作。翌年，他迁居西西里首府巴勒莫。

在西西里生活的二十六个春秋，对夏侠日后的创作，无疑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对西西里岛的风土人情，人事沧桑，新旧交替，有了异常深切的体验，获取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雷加尔穆托、阿格里琴托、塔尼塞塔、巴勒莫，这些留下了他的人生足迹的地方，日后成了夏侠笔下那些动人心魄的善良与顽恶较量的场所；他异常了解、稔知于心的矿工、教员、官吏、豪绅和三教九流的人物，后来都在他的作品中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历史话剧。

夏侠从小酷爱文学，当然，穷乡僻壤和寒素之家难以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他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意大利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广泛涉猎法国、俄国、美国文学。他阅

读文学作品，绝不是仅仅出于兴趣，相反，他把书籍当作良师益友，以求通过阅读获得认识人生，理解现实的裨益。后来，他曾以不解自己的心情回顾这段经历：

“我常常被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所驱使，渴求从每一样事物的内部来认识事物。对于我而言，每一个人，每一件东西，全都犹如一部书，可以摊开于书桌上，任意翻阅……我一旦把它打开，一个世界便霍然呈现于我的眼前。”^①

正因为这个缘故，夏侠特别推崇皮兰德娄、维尔加、德·罗贝托、布朗卡蒂等西西里作家。这些文学先辈和同乡的作品，帮助他开阔视野，升华认识，掌握揭开西西里扑朔迷离的现实的钥匙。

夏侠的文学创作始于四十年代末。从一开始，他便是怀着一种虔诚、热烈、甚至痴迷的精神拿起笔杆的。他对此有一段生动至极的叙述：

“我对写作坚贞不二地倾注了一腔爱恋，我甚至爱上了那些供写作用的一切工具。孩提时代，我便喜爱练习簿、钢笔、铅笔、墨水。我这样频繁地使用这些东西，以致现在回忆这些往事，我似乎又嗅到了墨水的气息。兴许，我真喝过墨水呢。几个月以前，我看到斯丹达尔用过的一个烟盒，从里到外密密麻麻地写了字；我油然想起，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一样我伸手可及的东西、木片、废纸、不是被我写满了字的。”^①

夏侠最早的作品是1950年发表的《独裁者的童话》。这部闪耀着反法西斯精神的童话，没有引起批评界应有的重视。随后面世的《雷加佩特拉教区》（1956）、《西西里大叔》（1958），是夏侠蜚声文坛的力作。

① 卡塔涅依：《夏侠》，莫尼耶尔出版社，1979年，第54页。

① 安布罗依塞：《夏侠》，墨尔西雅出版社，1978年，第56页。

《雷加佩特拉教区》从作家自身经历的生活中撷取素材，对西西里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情，予以真切的描摹。这儿既有对岛屿历史的回顾，也有对外省小城生活的描叙，而透过这些回顾与描叙，则流露出对过去和现今的统治者的罪责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所进行的沉重的反思。

《西西里大叔》是一部中短篇集。其中的《四八年》是篇历史小说。作者采用倒叙的手法，把目光投向十九世纪中叶的西西里，着意描绘民族复兴运动在这块大地上掀起的洪波巨澜以及社会生活发生的变故，成功地塑造了在这场历史风暴中亮相的各式人物的形象，把封建贵族极端腐朽的真相照示于众，表达了南方平民的失望情绪。小说借鉴了德·罗贝托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的名作《总督》(1894)，但又以新的眼光来审视和剖析历史，反照现实，因而又比作《总督》高出一筹。

集子中另一则中篇《安蒂莫尼》以夏侠十分熟悉的西西里硫矿工人为主人公。面对矿井地狱般的生活，面对赤贫和死亡的威胁，主人公不得不告别矿井，宁愿选择任何别的生活方式，那怕是战争。于是他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战斗是炼狱之火，驱除了他的迷误，洗涤了他的灵魂，他终于明悟，他事实上是在跟他一般的兄弟厮杀，他的枪口瞄准了西班牙的矿工、雇农。

集子中还有一篇《斯大林之死》，表现二次大战后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西西里人经历的苦难的思想历程。

无论是把目光投向历史，还是投向西班牙内战，但都是殊途同归，立足当今。《西西里大叔》折射出对西西里故土和同胞的现状进行检讨和剖析的理性之光。

《雷加佩特拉教区》和《西西里大叔》的价值在于，作为夏侠文学活动的成名作，它们概括了作家后来在其他作品里以不同

的形式予以表现的所有主题。或者，正如作家本人所坦言：

“我的第一部小说《雷加佩特拉教区》概括了我后来在其他作品里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表现的所有主题。……我的所有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作品。这是一部关于西西里的作品，它触及既往和现今的各种令人痛心疾首的问题，它不啻是一部理智不断遭遇挫折的历史，是那些在挫折中被打倒和毁灭的人们的历史。”^①

从此，着力描绘西西里的历史与现状，展示在这块古老、美丽而又贫苦、落后的大地上发生的善与恶的残酷搏斗，便成为贯穿夏侠创作的一根红线。

二

六十年代，西西里迎来了迟到的工业、技术起飞。急速而紊乱的发展，加剧了西西里同北方原已尖锐的差距和矛盾。西西里陷入了异常复杂的、令人失望的境地。如今，它既同第一世界共处，但又面临第三世界的问题。它从表面的、无关宏旨的进步中获得好处，同时又遭受古老的和新生的弊病带来的双重痛楚。

原先以农村为大本营的黑手党，以此为契机，一举打进了城市，打进了金融、工业和政治领域。黑手党在一些地区窃取了政权，一些国家政权机关同黑手党同流合污。同政治权力的结合，使黑手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危害性，使它的罪恶活动在大红伞的保护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隐蔽性，也使同黑手党进行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艰难性和危险性。黑手党不啻是附着于意大利社会肌体的要害部位并恶性扩散的毒瘤。

正是从六十年代起，在上述社会政治大背景下，夏侠的创作

^① 夏侠：《雷加佩特拉教区》1967年版自序。

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发表了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黑手党和政治题材系列小说：《白天的猫头鹰》（1961）、《各得其所》（1966）、《前因后果》（1971）、《千方百计》（1974）等。这些小说都以西西里为背景，用机锋犀利的笔墨，揭发黑手党在其巢穴西西里的猖狂肆虐，统治阶级的恣睢腐败以及同黑手党的狼狈为奸，从而准确地捕捉和深刻地展现了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

《白天的猫头鹰》是夏侠黑手党题材系列小说的第一部。

小说以宪兵上尉贝洛迪受命侦查黑手党杀害一名不愿对他们俯首听命的建筑合作社经理的案件为贯串全书的情节线索。贝洛迪曾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当过游击队员。他为人正直、刚毅，还透出几分机敏。经过周密的侦查，案情终于水落石出，凶手是某个马尔吉卡。贝洛迪打破了从凶杀案发生的那一刻起罪犯们便精心建立的攻守同盟，获取了凶手及唆使者的供词、罪证。然而，在他返回家乡帕尔玛休假时，黑手党组织反扑，阴险地制造了罪犯不在犯罪现场等种种伪证，使形势急转直下，贝洛迪前功尽弃。

案件出乎意外的结局似乎在向人们提示：代表司法力量的贝洛迪上尉失败了。顽恶战胜了善良，黑手党的法压倒了国家的法、社会的法。贝洛迪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马尔吉卡或者几个唆使者；他面对的是知情人和周围的人的恐惧和冷漠，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全都闭上了；他面对的是黑手党同政界的沆瀣一气。这一切，组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横亘在他的面前。他孤军作战，同这铜墙铁壁撞击，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宪兵上尉贝洛迪的形象，极富说服力地表明，比西西里的物质贫困更严重、更可怕的，是西西里精神、道德的贫困。贝洛迪与其说是在侦查一件凶杀案，毋宁说是为着疗救西西里精神、道德的贫困而行动。

小说结尾，宪兵上尉贝洛迪毅然决然地表示，他热爱西西里，纵然他不是西西里人，他将义无反顾地返回西西里。他大声说道：“我宁愿在那儿碰得头破血流。”这是掷地有声的誓言，表达了作家和一切正直者的信念，诚然上尉清楚意识到，在西西里，等待他的绝不是胜利，但这无关紧要。

《白天的猫头鹰》问世后五年，夏侠推出另一部黑手党题材的力作《各得其所》。

一位名叫拉乌腊纳的中学教员，无意中发现一起黑手党谋杀案的线索，出于好奇心，也出于正义感，不知不觉地去追踪案件的底细，结果惨遭黑手党的杀害。

夏侠在这部小说中有意识地超越侦查和破案的情节范畴。诚然，他的主人公拉乌腊纳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凶杀案的调查；然而，作家更多地关注的是主人公在侦查中同社会生活发生的关系，而不是侦查本身；换句话说，夏侠是借主人公进行社会调查。夏侠仅仅以简峭、凝炼的笔触交代情节纠葛的发展，而倾其全力进行社会深层的探究。

夏侠选择他的家乡阿格里琴托地区的故事展开的舞台。透过精细入微地予以描绘的各个情节场面，读者分别看到了黑手党及其利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情景。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又似乎都在改变。但夏侠小说的鞭辟入里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西西里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是表象，一切都没有改变才是本相。这不由令人想起另一位著名西西里作家兰佩杜萨在历史小说《豹》中，揭露十九世纪下半叶封建贵族为了对付民族复兴运动的革命高潮所采取的策略：“一切都改变，为的是什么都不改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黑手党，继承了一个世纪前老祖宗的衣钵，也祭起了“以万变应不变”的法宝。可不，如今西西里在经济、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似乎开始发生了最初的变革，而骨子里，所有

的人和物都继续禁锢于不可动摇的成规之中。西西里继续从其传统的面貌凸现于读者的眼前。邪恶与阴谋，愚昧与沉默，编织成一张古老的、密不透风的、可怕的罗网。拉乌腊纳便是自投罗网。

拉乌腊纳是一座古典中学的意大利语和历史教员。他生活孤独，性格执拗。他半好奇半打抱不平地卷入了这宗案件。夏侠把调查凶案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教员，而不是国家司法机关的代表。读者在小说中看不到司法机关的运作，而只见一个像当年的夏侠一样的中学语文教员，一个知识分子在履行这项职责。个中缘由不言而喻。在夏侠看来，司法机关在西西里的较量中失败了，因为司法机关竭力维护西西里的封闭落后和沉疴恶疾。

拉乌腊纳并不是一般侦探小说中习见的私人侦探。他要去解决司法机关无力也不愿去解决的难题。他天真而又坚定地扮演着执法官的角色，单枪匹马地向扑朔迷离的案件挑战。拉乌腊纳从意大利文学和诗歌中获得的聪明才智，是他唯一掌握着的斗争武器，何况他又太过单纯圣洁。而黑手党分子则完全隐去了他们一贯的耀武扬威的模样，退居幕后，成为一种幽灵，在暴行和恐怖的掩护下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拉乌腊纳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他显然是不自量力，这便注定了他的失败。

夏侠赋予了这个人物一切只有职业警官才应具有的特征，因此，拉乌腊纳的原本个人的、偶然的行为，便具有了典型的意义。他成了黑手党的罪恶与司法机关的无能的替罪羊。他的下场比《白天的猫头鹰》中慨然表示“我宁愿在那儿碰得头破血流”的贝洛迪上尉更加悲惨。他无法理解这个与他异己的世界。周围的人几乎打凶案发生之时起就明白了一切，或保持沉默，或订立攻守同盟。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是个糊涂虫”，仍然执迷不悟地去调查，去追究。这沉默实际上是默许和纵容黑手党及其

罪恶活动。拉乌腊纳自然无力打破沉默、阴谋和攻守同盟的坚冰，反倒被这坚冰压垮了。堂卢易吉在小说结尾说的那句话：“他是个白痴……”，似乎成了他的墓志铭。他的横卧在一座报废的硫矿渣滓堆上的尸体，因而具有了涵蕴极深的象征意义。

拉乌腊纳的调查未能触动黑手党的一根毫毛，然而，它触及了黑手党赖以滋长、猖獗的社会。这个人物形象的价值，不在于他作为一个业余侦探的行为和遭遇，而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个人同国家，个人行为同政治，历史遗留的邪恶同新的社会矛盾等种种根本性的冲突。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是，拉乌腊纳的死使当地上流社会和教区恢复了一度失去的平静，使因凶杀案而解体的家庭重新组合。

夏侠写作《各得其所》的时候，怀着比写作《白天的猫头鹰》更其强烈的内心激动，更其深沉的愤慨。他充分认识到在西西里进行任何革新和改造的无比艰难。因此，他在《各得其所》中力图着重揭示这种变革同旧势力之间的巨大反差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对当时某些势力因经济、技术的进步而制造出来的美化现实的神话，表示不安与谴责。还在写作《各得其所》的时候，夏侠接受一家杂志的采访，指出：

“我坚持认为，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仍然异常严峻地存在着。我们断然不可予以美化。”

在夏侠看来，西西里的环境及其邪恶，犹如长春藤的根，盘根错节，顽固不化，欲想改变它，全然是徒劳的。永恒的悲剧和痛苦的土地上绵绵不绝地滋生的痼疾顽症，又一次沉重地叩击着读者的心灵。读罢《各得其所》，小说中一位叫贝尼托的人物的话语，仍犹如警钟在耳边回响：

“西西里岛如同一艘海盗船，船只正在沉没，我的朋友，正在沉没”。

在《各得其所面世之后，夏侠陆续写了十余篇短篇小说(结集为《葡萄酒色的大海》，1973年出版)，随后，夏侠又返回长篇小说创作，于1975年发表了《千方百计》。

《千方百计》，原文为Todo modo，语出耶稣会创始人依纳蒂·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原意系指顺应天主圣意的最好方式。夏侠用来作为书名，其涵义是表明，他利用与借助既往的历史材料，尽可能深地开挖他所处的时代的现实。

在西西里一座豪华神秘的旅馆里，聚集了一批形形色色的头面人物：执政党的部长、议员、企业家、文化界名流、大主教、红衣主教等。他们汇聚在这儿，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进行“静省”，即集中一段时间按照宗教礼仪进行默想、反省。不料，这些显要人物“静省”的结果，却是接连发生三桩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画家，四十来岁。他外出度假，很偶然来到这座旅馆，小住数日，从而成为在那儿不幸发生的一切的目睹者。画家来到旅馆，正是某种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事件行将发生的时候。他纯粹受一种特殊的、职业的好奇心所驱使，把目睹这儿发生的一切，当作一种饶有兴味的消遣，他绝对没有对事件追根究底的愿望。他同那些政界、财界、宗教界的显要们不同，他冷眼旁观他们，客观地评估他们。他以艺术家敏锐的目光，起初以愉悦的心情，继而满怀惊慌不安，对发生的一切作了记录。

豪华旅馆里的那些神秘客人，手里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聚敛着权力和金钱。他们在这儿“静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进行秘密的政治交易，进行权力的再分配，或者说，每一方都力图尽可能更多地、更有利地瓜分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种种阴谋诡计，而正是这些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打破了一潭死水，掀起了汹涌波涛，引爆了一向用妥协、勾结包装起来的火药桶。

一系列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终于酿成了一桩桩凶杀案，撕下了上层人物进行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的黑幕。

夏侠以极其明晰的、理性的剖析，把社会现实和统治阶层的种种龌龊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揭示出国家和社会的衰败，人们习惯地依赖准则、公众机构，在万花筒般的变幻以后，最终也腐败了，就像皮兰德娄笔下的人物惊悚地发现，他们的人格、完整性丧失了，自我也可悲地肢解了。

书中的堂加埃塔诺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他精通西方文化，从启蒙主义到实证主义，无所不晓，不愧为富有教养的神甫。他沉稳、老道，因为他善于借助他的渊博学识和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手腕来掩盖他的老谋深算。广闻博学使他获得了一层文化人的保护色，老谋深算则使他得心应手地进入上流社会。他既真诚可爱，又厚颜无耻，他既从内心深处鄙夷那些上层人物，又巧妙地同他们周旋。

我们不由得想起神甫的那段自白：我们的肉眼无法瞧见奶酪上的蛆的爪子，但这并不是说蛆不存在；而我就是奶酪上的一条蛆，所以别的蛆的爪子我看得一清二楚。这自白坦率得可爱，真切得可信，真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堂加埃塔的猝死意味深长。他是最后一个牺牲者。其实，归根结蒂，在这场神秘莫测的政治游戏中，很难说有真正的胜利者。堂加埃塔的死仅仅能够证明，胜利属于神秘和沉默。

在这部小说中，行为发生的空间与时间高度浓缩了，夏侠似乎返回到古典主义，遵循它的行为、地点、时间一致的三一律。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限定和制约了艺术虚构和创造性所需要的空间和自由度，然而，却突出了小说中叙述的事件的可信性，赋予了读者回归现实和直接投入的契机，而这，正是同作家一贯的创作旨趣吻合的。

《千方百计》中发生的事件，惊心动魄，骇人听闻，但一经夏侠借用画家的第一人称予以徐缓有致的叙述，便显得异常紧凑、敏捷，显得异常从容自如，不动声色，从而为作家的哲理性的、思辨性的探求提供了条件。画家的叙述又注意去除蔓枝繁叶，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洗炼，这样就借助这些事实本身把揭露的锋芒更明快地指向现实，用事实本身来让人震惊和彻骨。

三

夏侠步入文坛，声誉日隆之日，正是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精神所孕育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衰落之时。不过，在新现实主义熏陶下成长的夏侠，很明显地接受了它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历史的、同时代人的现实的执著的关注，对认识这一现实和让人们认识这一现实的渴求。而这，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真实主义文学，同西西里文化传统，又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认为，夏侠是西西里文化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西西里文化顽强地拒绝对现实作浪漫情调的、变形的选择，而始终不渝地遵循客观地表现现实与真实的道路。无论是真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曾着力表现南方贫苦农民、牧人同社会的对抗，南方同北方的对峙。随着时代的变化，夏侠的小说自然也采用了不同于真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题材、形式，然而，作为西西作家，夏侠虔诚地忠实于西西里大地哺育的真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作家们的诗学，他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他的小说对西西里现实的历史的、真实的表现，无不深深打上了西西里文化特有的印记。

夏侠是最典型的，同时又是最具独特的个性的西西里作家。他的小说不是建筑于无关宏旨的、短暂性的，因而是局限性很大的事件，而是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动态的事件。作家的叙事

材料虽然常常同别的南方作家相近或吻合，但夏侠独标一格，他始终不渝地、执著地在人物、环境的发展机制中，在它们的最具体的、以人为本的确定性中予以刻划。他笔下的主人公充分意识到时代的责任感，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社会义务的分量。西西里不再是遥远的、富有童话、传奇色彩的地域，而是处于运动之中的、具有双重个性的、充溢着活力的环境。这是多色调的、奇特的，然而真实可信的，混和着痛楚和荒唐，包含着深深的屈辱的西西里。作家不再是止于对不可捉摸的、同时又无法抗拒的命运的哀叹，而是运用强烈的对照和反差，展示西西里的社会和群体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分化，对西西里进行解剖，并让西西里自我解剖，探寻西西里悲剧产生的生存环境、历史根源和人们的心理基础。

夏侠曾申明，他对文学作品的体裁不感兴趣。他对“非纯粹的叙事”，即不拘泥于一种形态的叙事唯有独钟。因此，他的叙事技巧有点不拘一格，不守章法。道理很简单。他如饥似渴地追求现实与真实，这是他的全部创作活动的命脉和中心。对此，他曾作了这样明确的说明：

“我‘展示’某种东西，藉以表现构思的和虚拟的事件，而所谓的构思，其实是寻得的意思，即在历史和新闻中寻得的事实。”

当然，夏侠更渴求引导读者去译解现实，揭示真实。这就是他选择叙事形态的出发点。

夏侠以为，资产者社会竭力切断读者认识西西里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只有采用某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的艺术形态，才能使读者摆脱资产者社会的封锁和阻挠。为此，夏侠让读者直面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阴谋，让他们亲眼目睹这些矛盾和阴谋像榴弹一样砰然爆炸。于是，夏侠便选择侦探小说这一体裁，作为传达他这一思想的外在载体。

事实上，他的小说也确有点像常见的侦探小说一样，情节曲折，悬念丛生，但作家绝不是故弄玄虚。夏侠借鉴侦探小说的体裁，不仅仅因为可以用生活原本就是这样来解释，而且是因为这种结构形态同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取得了和谐的一致。夏侠把风土人情、政治、文学、哲理、荒诞，统统包容了进去，从而建构了多层面的、充满暗示性和揭露性，富有诱惑力的叙事结构。而这种借取侦探小说为外在载体，以历史的真实性和哲理的思辨性为内核的创作，既同一般商业化的侦探小说划清了界限，又是对文学传统的一种挑战。

在传统的侦探小说中，必然有一位依靠公认的法则，在国家权力范畴内进行侦查活动，并且永远正确无误的侦探。此类小说有一套固定的模式：侦探奔赴凶案现场，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寻觅和筛选线索，惊险的、一波三折的侦查，知情人的告发，最终真相大白，凶手落网。而夏侠的兴趣点并不在于一起起血案，他的小说也不像一般的侦探小说那样有着破案的结局，这于他是无关紧要的。夏侠生活于黑手党和教会势力猖獗的社会，在那儿，法律和国家机器无法提供生存的保证，出卖法律和理想的力量朋比为奸。法律显得那么遥远、抽象，甚至戏弄人们。不妨引用夏侠讲过的一段话：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小说家。我仅仅是个诉状作者，这对于我已意味着很多了。”

好一个“诉状作者”！这意味着，作家夏侠自觉地扮演着原告的角色，小说于他便是一份控告社会的状子，便是向黑暗势力奋然掷去的投枪。他要揭露令人痛苦和愤懑的现实，追究正义正在消亡的严峻现实。小说中描写的案件所涉及的历史社会环境，为作家提供了揭发和追究这个现实的契机。探案因此具有了政治的、社会的和形而上的特征。这样，在西西里岛发生的事件、血

案，便成为各种政治交易的罪证，成为社会堕落和国家政权渎职的写照。这样，作家对西西里生存环境的不安与反思，压倒了对案件的侦查，案件不可避免地退居次要的地位。毫不奇怪，注意一下夏侠小说的结局，常常是案件不了了之，或者罪犯业已暴露，但照旧逍遥法外，得不到惩治。透过夏侠小说的非同寻常的结局，我们依稀看到了夏侠对理性的坚强信仰，信仰的不断失败，从而又导致不得不依然失望地信仰理性。夏侠小说的结局，就其思想底蕴而言不管是向世人宣告：失望与责任令人痛楚地共存着。

夏侠的叙述语言非常讲究，既反对浮华无味的文风，具有尖锐、辛辣、诙谐、生动的特色，又注重暗示，忌讳直白，笔触淡漠，摒弃主观感情成分，从而造成一种生疏奇异的艺术效果。主人公们充满哲理的对话、反思，关于善与恶的争论，幽深警峭，剴切中肯，读来并不觉得枯燥，反而让人在细细的咀嚼和鉴赏中获得无穷的回味。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在《白天的猫头鹰》、《各得其所》、《千方百计》等作品里，夏侠借鉴侦探小说的叙事形态和手法，把具有典型意义的日常生活，冷峻深邃的哲理剖析，融汇于曲折有致的叙述结构，通过西西里这面镜子，突出表现了意大利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作者怀着饱满的、甚至悲愤的激情，带着读者一同走进生活的激流，去认识和探究这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

夏侠是位勤于开拓的作家。除了具有侦探小说特色的社会政治小说，他还力求运用多种文学样式，多姿多色的风格，来反映尖锐的现实问题，显示了多方面的文学才华。《埃及卷宗》(1963)、《检查官之死》(1964)，都是借古喻今的历史小说。

《议员》(1965)、《黑手党徒》(1976),系抨击黑手党和统治集团的政治剧。《马约拉纳的失踪》(1975)、《刺客》(1976)分别对一位原子能专家失踪的真实根源、司法机构同行恶的当权者的微妙关系,进行严肃的追究。《莫罗事件》(1978)与其说是文学作品,毋宁说更近于战斗檄文,或调查报告,它对红色族谋杀意大利前总统莫罗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作了详尽的记叙。《康迪多》(1977)令读者联想到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天真汉》。在《记忆的戏剧》中,皮兰德娄哲学思想的印记清晰可辨。

勤勉笔耕三十余载,夏侠的成果累累。除上述作品外,他还著有反映西西里生活的短篇小说集《葡萄酒色的大海》(1973)、文艺批评集《皮兰德娄和皮兰德娄主义》(1953)、《皮兰德娄和西西里》(1965)、《魔绳》(1970),札记《黑纸上的黑字》(1979)和研究西西里古老习俗的著作《西西里的宗教节日》(1965),等等。现今,夏侠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世界数十种语言。许多小说和短篇小说被改编为话剧,或摄制成影片,搬上电视屏幕,他的剧作已成为不少剧院时常公演的保留剧目。

夏侠又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先后当选欧洲议会议员、意大利众议员、西西里大区议员,在意大利政界深孚众望。从意大利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夏侠便是它的成员。他在解释他为什么接受这项崇高而危险的使命时,这样说道:“统治阶级无力审判自己,更无力宣判自己有罪。”

目 录

探究光怪陆离的西西里吕同六

千方百计.....〔意大利〕莱·夏侠 著 李 国 庆 译 1

各得其所〔意大利〕莱·夏侠 著 吕 同 六 译 113

千 方 百 计

李 国 庆 译

这个中篇小说的作者莱奥纳多·夏侠是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1921年生于西西里岛阿格里琴托城。起初担任小学教师，后来致力于文学创作活动。1956年发表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莱格佩特拉教区》，使他一举成名。

夏侠的作品多以西西里岛为背景，但他反映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对“黑手党”的揭露，远远超越了西西里岛的界限，是整个意大利的缩影。夏侠十分注意研究社会问题，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因而对社会的揭露深刻、有力。

夏侠善于采用侦探小说的技巧，他的不少作品带有侦探小说的特色。意大利文艺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具有“侦探小说的幻想和真实素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特点。

他的主要作品有：《西西里大叔》(1960)，《白天的猫头鹰》(1961)，《各得其所》(1960)，《对抗》(1971)，《酒色的海洋》(1973)，以及文艺评论集《疯狂的绳索》(1970)等。

这里发表的《千方百计》于1974年出版。作品通过一个画家的一段经历，对意大利上层人物的丑行和教会当权者的伪善，作了揭露。情节并不复杂，然而结构严谨，语言尖锐、辛辣、诙谐而生动。某些讲哲理和天主教教义的段落，很明显地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看法，因此并不觉得枯燥，反而使人感到回味无穷。意大利的社会情况是个什么样子，意大利当代文学是个什么样子，这个中篇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意大利最伟大的文艺评论家说：“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康德的宇宙，是凌驾于自由行为之上的一系列偶然现象的锁链；依此类推，可以把皮兰德娄^①所描写的世界，归结为凌驾于无限音乐（即孤独的人那种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欢乐）之上的、无音乐世界中的永恒的奴隶状态。”

每当我回首往事时，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那些令人神往的、音乐般的欢乐时刻，重新浏览那条偶然现象的锁链。儿时，每逢夏天，我一人在乡下，宛如漂泊在一个遥远的、无人可及的、郁郁葱葱的水乡。我整个的一生——那短暂的过去和漫长的未来，都音乐般地融合在自由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降生于人世，生长在皮兰德娄的世界，生活在皮兰德娄的人物中间，并带着皮兰德娄的创伤（在我的记忆和感情中，皮兰德娄所描写的世界和我的青少年时代是相似的）；同样，也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位评论家的话（我这样写是无人监督的）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掌握了无限音乐的语言和主题。起码，我自认为如此。

说得简单一点，我既无社会使命，也不受感情的驱使，既无计划，也无目标（到了开饭的时间或者睡觉的时间，则是另一回事），我独来独往。除了生活路途中一直伴随着我的忧烦的阴影，我无忧无虑，潇洒豪放。无羁的生活给我播下了忧烦不安的种

① 皮兰德娄（1867—1939），意大利著名作家和剧作家。1929年起为意大利科学院院士。193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其戏剧主要反映人追求自由的本性，以及社会、艺术和思想意识对它的限制两者的冲突。皮兰德娄的戏剧，成为人类痛苦地寻觅真理而又无法得到真理的代名词。

子，它已经发芽生长，长出第一批娇嫩的绿叶。我犹如站立在四面镶满镜子的大厅里，那闪闪发亮的镜面，反射出我走过的道路和度过的时光。

我有一辆小汽车，但我厌恶它，很少使用它，只有当我需要自由的时候才会想起它。我开着车慢慢地行驶，坐在车上，时常精神恍惚，心烦意乱。用这样的速度爬行，即便在我神志恍惚的当口，也不会出事。开车时，我喜欢悠闲地东张西望，欣赏着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和谐的美。这种开慢车和喜欢东张西望的习惯，使我有机会遇上了一件难以忘却的事情。有一天，我出外游玩，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偶然发现了一块黄色的招牌，牌子上写着几个墨黑的字：“扎菲尔修道院，三号”。烦恼忧闷的我一看见这块招牌，就像贪食的鱼见到鱼饵，不分青红皂白地便往下吞。我急忙煞住车，然后开倒车，一直退到招牌的跟前。招牌上的“修道院”、“扎菲尔”和“三号”对我都有极大的诱惑力，但三者的诱惑力又各有其特点。“三”对我的吸引力最大：我已漫游了三天，这也是个偶然的巧合（说实话，三位一体使我感染上了容易激动的毛病，虽然不重，也十分顽固。但它究竟是怎么染上的？我全然不知道）。人们都说，“修道院”是个孤寂的地方。这不是人们常说的在乡下过的那种幽静、安逸的田园生活，而是离群索居，避开“俗务”，沉思默想，甚至达到疯疯癫癫、不知人间烟火的境地。“扎菲尔”呢？究竟是伊斯兰教圣人还是基督教圣人？从这里到修道院足足有六里路。我迅速把车开到柏油路上（这条柏油路使我提心吊胆，前瞻后顾），然后加大油门爬坡。路两旁长满了葱茏的橡树和栗树，绿树掩映，宛如艺术大师灵巧的双手苦心雕刻的翡翠般的长廊。沿途金雀花香味扑鼻。突然，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宽阔的广场，上面也铺着乌黑发亮的柏油，一端被一座高大的楼房断了去路。楼房是钢筋水泥的，窗子窄而

高，阴森森的，活像有人在墙上挖的几个大窟窿。难道修道院就是这样的一座怪物吗？我停住车，失望使我发怒。这很可能是一座旅馆。我踌躇了：是连车都不下，扭头便走，还是下车仔细看看，问问清楚：到底是谁盖了这座大楼，又是为什么盖的？好奇心战胜了我，失望并没有使我气馁。我想，虽然里面死一样的寂静，也可能没有人生，但也许能找到个把人吧。本来我找的是修道院，如今却看见了一座旅馆，这使我怒不可遏。我渴望找到一个人可以发泄一下。我跳下车，顺手把车门锁上。死一样的寂静给我一种神秘而不祥的预感。这座楼的正面有一扇高大的玻璃门，门敞开着。一进门，便是旅馆的前厅。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神父，神父的身后是一个钥匙立柜。神父看上去挺年轻，棕色的皮肤，留着长发。他正在读《里努斯》^①杂志。他看见我走进来，一种厌烦的情绪使他的眼睛顿时变得暗淡无光。我走上前去向他问好，他的两片嘴唇微微地一动，算是对我问候的答复。

“请原谅，这里是修道院，还是旅馆？”我粗鲁而嘲讽地问道。

“既是修道院，又是旅馆。”

“叫扎菲尔修道院吗？”

“扎菲尔修道院，一点不错。”

“那么，旅馆呢？”

“什么旅馆？”他不耐烦地反问。

“旅馆叫什么名字？”

“扎菲尔，”为使这个名字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他先说了这三个字，然后又说，“扎菲尔旅馆。”

“扎菲尔修道院，扎菲尔旅馆……好吧，那么，扎菲尔是什么人？”

“如果这里曾经是修道院，当然是个隐士。”

^① 《里努斯》：一种儿童读物。

“曾经是个修道院？”我强调了“曾经”这两个字。

“现在是。”

“您说的是‘曾经是’……总之，扎菲尔是一位伊斯兰隐士吧？”

“什么伊斯兰隐士，您以为至今我们还信伊斯兰教吗？”

“为什么不呢？公爵会议上……”

“这跟公爵会议毫不相干。扎菲尔是伊斯兰教徒，后来皈依正教的。”

“皈依正教？但‘扎菲尔’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名词。”我故意这么说。

“也许。”神父回答说。他又把视线转向《里努斯》杂志，不再看我，为的是让我知道：我叫他讨厌，叫他不愉快。

“如果我没打扰您的话，”我说这句客套话，是故意找他的麻烦，“我想了解一下扎菲尔其人，以及这家旅馆的情况。”

“您是记者？”

“不。您为什么问这个？”

“如果您是记者，那您是在白白浪费时间，这里已经出过丑啦。”

“出了什么丑？”

“还不是为旅馆的事。他们说什么，不应办这家旅馆，这家旅馆很糟……这还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我不是记者。我想了解点什么，即便是丑闻也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我无事可做。依我看，你也是这样。”

他贪婪地看了《里努斯》杂志一眼，说：“我可是有事干嘛！”

“您有什么事可干？”我粗鲁而且有点挑衅地问道。

“噢……”说着，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有大量的事做，似乎多年以来他一直被杂乱无章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调剂一下，他才读这本《里努斯》杂志的。

我说出了他想说的话，他略感震惊，就变得殷勤多了。

“您想让我说什么呢？想了解那件丑闻吗？也就是说，某些报纸和政客是如何报道我们的情况的吗？我了解得很少……曾经有过那么回事就是了……这里原来是个破旧的修道院，一个年久失修的小教堂。三年前，堂卡埃塔诺在这里建起了一座旅馆。我知道，意大利共和国保护自然环境，那是因为堂卡埃塔诺在保护共和国……事情总是如此。”说着，他的嘴唇挂上了一丝苦涩的微笑，不知他究竟是对堂卡埃塔诺不满，还是对共和国不满。

“堂卡埃塔诺是谁？”

“难道您还不知道堂卡埃塔诺是谁？”他惊奇而又怀疑地问道。

“不知道。难道我早就应当知道吗？”

“应当如此。”他得意洋洋地回答。

“为什么？”

“为了他所完成的事业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事业。”

“噢，他盖了一座旅馆。他的事业就是盖旅馆？”

“可以说，这座旅馆么，是他用左手盖起来的。”

“那他的右手干了些什么呢？”

“学校，办学校。他办了几十所学校。不，甚至几百所。小学、中学、甚至还有大学。”

“噢，几百所学校和一座旅馆。”

“三座旅馆。”

“啊，三座旅馆。都是拆掉修道院盖起来的？”

“不是拆修道院，而是使它变得更加完善。譬如说，这个扎菲尔修道院就是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只不过，它是在地下室。”

“可以进去看看吗？”

“可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显得很疲倦，一声不响地等着，希望我开口要求参观修道院。

我没有这样做。我问：“堂卡埃塔诺呢？”

“他怎么啦？”

“可以见见他吗？”

“当然可以。他就在这里。整个夏天他都在这里避暑。在他所有的旅馆中，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座。”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也可能，这里可以引起他对童年的美好的回忆。也许，为了盖这座旅馆，他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不管怎么说，他是胜利者。”

“不言而喻，他当然是胜利者。”

“是的，他是理所当然的胜利者。”他满意地喃喃说着，声音中充满了自豪，但缺乏应有的尊敬。

我在大厅里转了一圈。

“这里真安静，也挺舒适。”我说。

“这座旅馆舒服极啦！”

“我想在这里住几天。”

“不行。”

“客满了吗？”我戏谑地问道。因为我发现旅馆里空无一人。

“今天，连侍者在内，这里只有二十一个人。但是后天，所有的房间一下子就会占满。”

“也就是说，旅客都是像听到紧急集合命令那样，同时到达的？”

“这里的旅客可不是一般的旅客。”他停顿了片刻，像告诉我一件秘密似地说：“是来避静^①的。”

“啊，来避静的。”我竭力装出由于他赐予我莫大的信任而感到惊诧的样子。说实话，我确实也有点惊讶。我已多年听不到

① 天主教的一种宗教活动，按照教规，在一定时期内，避开“俗务”，进行宗教静修，称为避静。

避静的事了，我还以为现在没有人避静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逢保罗传教团一到我们镇上，镇上的人总是谈论避静。只有培蒂托·达普里莱歌剧团和道里利亚·帕尔米剧团的到来，对镇上的人来说，才是件大事，而且，他们总是按时到达的。保罗传教团来了，只为大家讲道，少数人避静。结束时，他们在郊区竖一座铁十字架作为纪念，然后就走了。我最后一次听到避静，是在战后第一次大选前夕，多明我会^①的一个神父来到我们镇上，在教员和职员中间讲道，为的是拉选票。避静总是在一个富有的、热心的教徒的别墅里举行，足足搞一个礼拜。共济会^②也搞避静，避静结束时，人们一个个清瘦漂亮，灵魂纯洁。

“是啊，是来避静的。”神父肯定地说，“每年，每当六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这里开始避静，一批教徒完了，再来一批，轮流进行。”

“一轮需要多少时间？”

“一个礼拜。”

“共有几轮？”

“三到四轮。过去，每年三轮，今年四批。”

“教徒增多了？”

“当然。”神父敷衍地答道。嘴里这么说，心里却连自己的话都不相信。沉默了一会，他自信地说：“最重要的是第一轮。”

“这是为什么？”

“来避静的都是些大人物。他压低了声音，显得十分自信，
“其中有部长、议员、主席、银行的经理、工业巨头……还有三

① 十三世纪初西班牙人多明我所创教派。该会成立不久，即受罗马教皇委派，主持异端裁判所，残酷迫害“异端”，竭力维护天主教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

② 起源于中古时代的秘密结社，一直延续到今天，遍及欧洲许多国家，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会员互相帮助。

家报纸的总编，还有……”

“那当然重要啦。”我说，“所以，当他们在这一里避静的时候，我更想留在这里。”

“这可不行。”

“这我懂。可您不是说，今明两天他们还不来吗？我住两天还不行？”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

“实际上又如何呢？”

实际上，只要堂卡埃塔诺同意就可以。另外，需要将就一下，因为缺少服务人员，伙食也不好……”

“这就是说，我是唯一的一个需要付款的人了？”

“不止您一个，还有五个。”他不满而又神秘地说，“五个女人。”

“年轻的外国妇女？”

“不。既不年老，也不是外国人。”

“就她们五个，没有陪伴？”我问道。他的眼睛狡诈地、不怀好意地闪烁着。为了表明他与此事无关，他又说：“来时，没人陪她们。”

“看来，是否有人陪伴，您对此有所怀疑。”

“不，不。”他故作姿态地反驳道，“她们是单独来的，现在都成了伙伴了。”

“那么，我算是第六个了。”

“这得听听堂卡埃塔诺的意见。”

“好吧，就听听他的意见。”

“现在不是时候。待会儿，他吃完点心后再找他。他正在下面的小教堂里静思，别打扰他。”他用食指指了指地板。

“在扎尔菲修道院？”我问道。

“完全正确。那么，现在您就随便转转，看看，里面，外面

都可以。”他又贪婪地读起那本《里努斯》杂志来了。我们的谈话就这样无可挽回地结束了。

我走出旅馆，穿过空旷地带，钻进树林。我缓慢地走着，离旅馆越远，树木长得越稠密；空气清爽，飘来一阵阵松脂的清香。隐遁此地，确实妙不可言！透过树林，我隐隐约约地看见远处有个闪闪发光的水池，池上五彩缤纷，犹如一群翩翩起舞的彩蝶。大自然使我陶醉。我小心翼翼地向它走去。原来是一块空地，几个穿游泳衣的女人正在晒太阳。毫无疑问，这就是神父所说的那几个女人。我数了数，整整五个。我悄悄地向她们走去，四个女人静静地躺在花花绿绿的海绵垫上，另一个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读书，周围静悄悄的。我犹如进入神奇、奥妙、神话般的仙境。我站在幽暗的树荫下，想象着她们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一动不动地躺在阳光下，身下是五颜六色的彩带。这一切，宛如名画家德尔沃笔下的画（我的画不这样，我从未在传奇般的仙境中看见过女人，既没想过，也不追求）。这幅画是按照德尔沃的布局 and 透视法构思而成的，与我的画迥然不同。此时此刻，我也知道画面上没有的事情：她们无人陪伴地住在神父经营的旅馆里。我又偷偷地看了一会，她们的身材都很标致。四个金发女郎，另一个长着一头褐色的头发。宽大的太阳镜遮住了她们的眼睛，使我无法判断她们是否都长得漂亮。再说，距离太远，虽然我是远视眼，也帮不了多大的忙。

老实说，我喜欢冒险，刚才一瞬间，当我想象着我也在她们中间时，我感到幸福。现在，一种极度孤独的感觉又向我袭来。于是我离开她们，向旅馆走去。

一进旅馆，我就看到了堂卡埃塔诺（这不可能是别人），他背靠柜台站着，看门的神父已经不读《里努斯》杂志了，换了一本

黑皮书。堂卡埃塔诺高高的身材，穿一身长长的黑色教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恍惚地看着远方。他左手戴着一只大颗粒的黑宝石戒指，而那只显得肥胖而又近乎有点透明的右手，则放在胸前。他向我走来，但似乎没看见我。他这种姿态使我好奇，又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我也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两个形象：一个是呆呆地冷冷地站在远方，要我把赶出旅馆；另一个则是殷勤、好客、热情、仁慈的神父。他走到我跟前，说了一声：“欢迎您到扎菲尔修道院来。”这不仅是一座修道院，而且是一家旅馆。我承认，这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你简直拿那些建筑师没办法，这些矜持、狂想、而又不易接近的工头，如果有一天……从建筑学的观点来看，这座楼是拙劣的，然而却十分舒适。当代有两个骗人的学科：一个是建筑学，另一个是社会学。如今，医学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它简直变成了骗人的巫术。堂卡埃塔诺不安地问我：“大概，您不是建筑师，也不是社会学家，更不是医生？”

“我是个画家。”我说。

“画家……对，好像我在哪儿见过您。等一等，请您不要说出您的姓名，让我想一想……三个月以前，您在电视上出现过。坦率地说，您可以画得更好，可是，我想您是故意的。您创作了一幅十分拙劣的画。您为这个丑陋的世界画了一幅极为丑陋的画，您为千百万个坐在荧光屏前的愚蠢的观众画了一幅愚蠢的画。”

“当时，您也坐在荧光屏前吧。”我气愤地说。

“不敢，不敢，也许我不配。我看电视看得太多了，不过，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对这种流行性的痴呆病，我已经有了免疫力。可是，正因为看得太多了，我迟早也会染上这种恶疾的，也许，我早已染上了。说实在的，我那愚蠢的静思，就是我的一种恶习。朱丽奥·切切莱·威尼尼也承认上帝是伟大的，但他总是静观大地，因而被当作异教徒，活活地烧死了。而另一些

人则静观天空……如果我能记起您的名字，那也是由于愚蠢，没有什么深奥莫测、高不可攀的东西。只是，不应静思得太久……噢，我记起来了，您叫……”于是，他说出了我的名字。

“老实说，我不喜欢您这种记起我名字的方法。”我诙谐而又不满地说。

“不。当我说我是愚蠢的时候，我脑中的一部分就开动起来了，它们在找您的名字，仔细地寻找着。啊，您想在这里住两天，也就是说今、明两天，是不是？我感到很荣幸，也许，这里的一切并不能使您满意。总之，在旅馆中，除几间房子已经有客人外，别的房间您可以任意挑选。”

“我想多住几天。我知道，将有人在这里避静。”

“您也想避静？”

“我想，我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避静的。”

“也就是说，是出于好奇心。”

“就算是吧。”

“那就糟了。想从别人避静中取乐、嘲弄别人，这是最坏不过的嗜好。”

“也许。”

“不能这么说。”

“什么？”

“没什么。您听说过避静，所以您想看看人们是如何避静的。您是想消遣消遣，想讥笑别人……也许，您这种想法来自‘自由行为’吧。”

“‘自由行为’再加上偶然性的锁链。”

他有趣地看了我一眼（这是他第一次正面看我），又说：“对，偶然性的锁链。”

他微微地点了点头，便消失了。

走廊上的电铃响了。它像火车站上的电铃，当火车到站时，发出长时间的、刺耳的响声。我走出房间。我想，大概开饭的时间到了。果然不错。

餐厅很宽敞，里面摆满了圆桌、方桌。但只有两张餐桌上摆了餐具，坐满了人。堂卡埃塔诺招呼我到他桌上就餐。我在他右侧坐下。在这张桌上就餐的，还有看门的神父和另外三个神父。五个女人坐在离我们较远的一张餐桌旁，但可以清楚地听到她们说话的声音。她们唧唧喳喳地讲个不停，发出的声音就像五个水泉同时向外喷水一样。当堂卡埃塔诺站起来祈祷、祝福的时候，她们安静下来了。他也为她们祝福，但他也作得极为得体，既保持了应有的尊严，又带着一种毫不在意的嘲弄的神色，好像一个人啃完肉，把剩下的骨头扔给了狗似的。五个女人痛心地划着十字，默默地念着祷词，又再三地在胸前划着十字。祈祷完毕，她们又喋喋不休地谈起来了。堂卡埃塔诺坐下来，先给我斟满了一杯酒，又给其他的人一一斟酒。他一面斟酒，一面像一个鉴定家那样不停地夸奖着。但他用的都是法语词汇，而现在，鉴定家根本不用这些词汇了。他又说，这酒是当地出产的，是用从海滩到山地之间的地带长出的葡萄酿成的。然后他又用希腊语朗诵了一首诗，据他说，这首诗正是为赞美这种酒而作的。除此以外，没谈别的话题。他津津有味地喝着酒，吃菜时却皱着眉头，因为菜做得平淡无味。为了填饱肚子，只好拼命往菜里加盐和胡椒面。饭后，堂卡埃塔诺表示抱歉，对我说，厨师第二天晚上就到，那时，准保我心满意足。

午餐和第二天的早餐仍是那一套。虽然堂卡埃塔诺讲了许多有趣的事，如：酒、阿尔诺比奥^①、圣阿戈斯蒂诺^②和萨尔特雷

① 阿尔诺比奥，公元五世纪基督教作家。

② 圣阿戈斯蒂诺，意大利费拉拉省中心，那里有名胜古迹。

的点金石等等，然而，使我感兴趣的是避静和那些不久要来避静的人。如果不是出于好奇，我早就走了。

第二天的午餐，比起前两天来，确实好多了。厨师下午刚到，也只能凑合着改变一下。但这种小小的改变，大家已经心满意足。人们津津有味地嚼着，面露喜色。正像堂卡埃塔诺说的：大家都很高兴。于是他开始祈祷，请求上帝宽恕那些贪吃不要命的蠢货，以及那些天生就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没教养，没文化的人。他夸奖着勇敢的贪食者瓦特尔称赞过的法国烹调，又把卡冬^①和瓦特尔相提并论。他说，虽然卡冬为自由而死，而瓦特尔因为没吃到鱼而自杀，但在上帝面前，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为某种欲望——自尊心而死。

“虽然都是自尊心，但是，”我反驳说，“我们总不能，上帝也不允许，把端到餐桌上的鱼和自由相提并论吧。”

“为什么不能？我们且不说上帝，因为上帝的意图，就我们所知，只不过是人们为了拯救自己而作出的选择罢了。依我看，您过于看重了拯救自己的愿望，而忽视了为拯救自己而作出的选择，我们先不谈上帝……假如自尊心是某种正确的选择，那么，瓦特尔比卡冬更能说明问题：最后，鱼还是端到餐桌上来了，但在端上来的前一个小时，他自杀了。而自由呢？”

我们的争论，一开始就把在座的四个神父搞得晕头转向。堂卡埃塔诺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观点，我也只管讲我的观点，全然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午餐结束时，这几个神父好像受到了奇耻大辱一般。

走出餐厅，堂卡埃塔诺问我是否已决定参加避静，我作了肯

① 卡冬，生于公元前九五年，古罗马政治家，竭力主张自由，是凯撒和庞贝的政敌。

定的回答。听了我的话，他似乎很高兴，但看得出，他是不怀好意的。他用他那只白胖的手在空中劈了一下。这是一个半开玩笑的指责和威胁，好像在说：“你这个没信仰的畜生，竟想到我们的巢穴和堡垒里来偷袭，你得放明白些！”于是，那只手在我面前一晃，他就消失了。（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我说堂卡埃塔诺“走了”的时候，总用“消失”二字，可能，下面我还要用这两个字，甚至还要用“消失”的一些同义词。这需要讲一讲小时候我们做的一种游戏：在纸上画一个圆圈，用墨把圆圈涂满，只在圆圈的中心留下一个白点。然后，盯着这个白点数六十个数。数完后，马上闭上眼睛或马上抬起头来望着天空。这时，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一个圆圈。这个圆圈是白色而透明的。堂卡埃塔诺也是这样，当他走了之后，他的形象仍然留在我脑海里，就像我闭上眼睛或仰望天空时仍然能看见他一样。我似乎永远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我的。另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刚见到他时，他在我面前呈现出双重的形象。跟他在一块，就好像在梦中一般，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

一种难以抑制的心情使我一夜没睡踏实。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就起床了。这一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一些显赫的人物将要来到这里，不吃斋、不守戒地避静一周。何况，那个著名的厨师已在头天到达，我能放过这个机会吗？可我起得太早了，虽然我并不后悔，但确实太早！我已二十多年没看见东方破晓的景色了，特别是像今天这样，从地平线上，透过窗子，观赏这神话般的奇景异色。我曾在飞机上看见过黎明，但与从地平面上观赏迥然不同。我站在窗前，沉浸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我的心激动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涌上心头。但是，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担心因为画笔笨拙反而破坏了大自然这种和谐的美。应当说，

这种创作欲只不过是一种庸俗的念头，一种书呆子气。当一个不会画画的人，或一个劣等画家看到美不胜收的风景，或看到令人陶醉的大自然，连声喝彩，叫道“应当画下来！”的时候，这是对大自然最平庸、最愚蠢的颂扬，也是对美术的贬低和亵渎。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是决不动笔的。这种创作欲是人为的，于是我放弃了。我这样做还有个原因：当时，我“双脚冰凉”，伏尔泰有句俏皮话，说只有你感到双脚热乎乎的时候，你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这是对英国画家——包括巴孔和萨瑟兰——说的）。自从我读了这句话后，我就照办了。当我双脚冰凉时，我画出的画都是劣等的；然而，评论家和收藏家们则认为是最优秀的。这样的画我画了不知多少。每当我感到自由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的创作摆脱了职业、市场、展览会、金钱、名誉的束缚的时候，我就喜欢画，越画越想画。当然，我喜欢自由还有一个原因：我已具备一切。我已有了很好的名声，大量的金钱，世界各地都举办过我的画展，我的画销路极广，而且，一天可以创作两三幅画。而那些在我双脚热乎乎的时候画出的画，则寥寥无几。我把它保存起来，准备以后再拿出来，以便得到一个恰当的评价。不过，说句良心话，我担心的是死亡；而名誉，对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我似乎觉得我已经摆脱了任何束缚，也摆脱了绘画的束缚。更确切一点说（读者们，我们正在交谈，所以，我不宜把话讲得太透彻），我的这种特殊的逃避现实的方法，这种对自由的幻想，只不过是一个停顿，一个间歇。照伏尔泰的说法，我必须在双脚热乎乎的时候才能从事创作。我也很少对自己说：当我双脚冰凉的时候，要多画；当我双脚感到温暖的时候，要少画。令人讨厌的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错综复杂的，我们越是想欺骗自己，到头来，越是欺骗不了。

总之，我站在窗前欣赏了美丽而和谐的大自然。然后，洗了个热水澡，以便暖暖脚。洗完澡，果然感到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我刮了胡子，梳了头，穿好衣服就下楼去了。

院子里乱哄哄的，侍者增加了许多，神父也多了。我数了数，新来了七个神父，他们像穿梭似地来回地忙碌着。这种混乱的场面使我晕眩，于是，我走到广场上。这里摆了许多躺椅，都是旧的，仍然保留着昔日客人们在上面歇息的痕迹，躺椅摆成圆形，宛如剧院里的池座。躺椅的木料和印着蓝色、红色花边的帆布衬托在一起，恰似一幅抽象派的图画，而我也成了画中的人物。有人从旅馆高高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张望。此时此刻，我成了一个被摒弃在椅子上的木偶（我理解别人的画，要比理解我自己的画更深刻；差别越大，理解得越深刻）。

广场很宽敞。除了躺椅占去的一部分外，还有一处停车和走车的地方。九点钟以后，汽车徐徐驶来。

头四辆几乎是同时到达的。当第一辆车到达时，堂卡埃塔诺已出现在旅馆大门口，也许，他早已在那里等候了。第一辆车上下来的是一位主教。其他三辆车上下来的也是主教。他们站在一起时，我才发现，其中有一个戴着一顶红帽，而其他三个则戴着堇色帽，我看出来了，原来第一个是红衣主教。我不喜欢红衣主教，也不尊敬他们。看到他，使我不由地记起了贝利的一句诗：“脱去黑帽，戴上红帽。”这句诗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队正在值勤的宪兵蜂拥般地冲向妓院，这时，他们发现自己的队长正迎面走来，表情“十分严肃”，就像一个严肃的神父脱去黑帽，戴上一顶红帽一样。红帽指的是红衣主教。意思是说，红衣主教就像那个宪兵队长一样。

既然一位红衣主教驾到，便有十几个骑摩托车的警察护卫。他们一只脚踏在踏板上，另一只脚脚尖着地。摩托车的马达轰轰

作响，使我听不清红衣主教、主教和堂卡埃塔诺在谈些什么。他们似乎在互相寒暄，说了些俏皮话。堂卡埃塔诺与往常一样，穿了一件长袍；其他四个人穿着铁灰色的上衣和裤子，胸前挂着银十字架，高竖的硬领闪闪发光；头上都戴着一顶小圆帽。在我看来，他们四个都没有自己的特点：两个人各长着一副农民的脸，另外两个人则各长着一副官僚的脸。红衣主教也有一副官僚的脸，他是那种手中掌权，表面上迂腐气很浓的人。如果把他们的圆帽摘掉，谁更像红衣主教呢？当然是堂卡埃塔诺。其他四人，有两个像农村的传教士，另外两个像城里的传教士。堂卡埃塔诺带着尊敬、虔诚、欢欣和愉快的神态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显示出某种冷漠和严肃的神情，这使我十分赞赏。红衣主教完全是另一种派头，俨然像一个教皇。

摩托车队走了，远处还传来一阵阵嘈杂的马达声，声音越来越远，终于消失。于是周围一片寂静。这时，我听到红衣主教夸奖旅馆设计得漂亮、宏伟。堂卡埃塔诺用一种讥讽而怜悯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说：这位可怜的红衣主教大人还未见过真正漂亮而又宏伟的旅馆呢。他说了一声：“阁下……”五个人便走进了旅馆。

当我全神贯注地在听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几乎没注意到其他汽车的到来。这些小汽车几乎都由穿制服的专职司机驾驶，可见，这是某些协会和机关的汽车。下车的当然都是部长、秘书长、总经理、主席、副主席之类的社会名流。还有几辆车，坐在驾驶盘前的是妇女；不难猜到，这是妻子们来送丈夫，等把丈夫送到旅馆，顺便把车开回去。其中，有一个女人使我陷入了幻想。她长得并不十分漂亮（我不爱漂亮的女人，只有一个例外，然而，我刚与她结婚，就离开了她），但身段窈窕而匀称。她有一种机智而滑稽的表情，在她的动作中，在她的微笑和闪闪发光的眼睛中，

流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急躁和烦扰；就像一个人因获得自由而想大喊大叫，因狂喜而想飞奔一般。在她丈夫打开行李箱取出行李的当口，她心不在焉地在谈着什么。从她的口气看来，与其说是对丈夫的叮咛，毋宁说是对他的命令。她让丈夫平时注意冷暖，免得着凉；吃饭时不要贪食；晚上要穿上毛衣；饭前饭后不要忘记吃药……同时，又好像在对我暗示（她已发现了我）：现在我就要摆脱这个蠢货，这个猪猡，这个强盗，在一个星期内，我将自由自在地生活……当我在揣摩她的吩咐时，她瞟了我一眼，疲惫的眼睛闪出欢乐的光芒。她的眼睛似乎在向我挑战，向我许愿，并且暗示：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当时，我真想立刻走到她身后，或当着她丈夫的面，请她把我带到城里去。丈夫的脸显得有些忧虑，似乎因离开妻子感到不安。如果他真的还想着他的妻子的话，这对他到这儿来避静是有裨益的。我一动不动地静静地看着她。她匆匆吻别了丈夫，又向我瞟了一眼。当她坐上车关门的时候，我看见了她那两条裸露的大腿。也许，有人正在等着她，所以她想：我把这头猪送到扎菲尔修道院去避静，我终于赢得了一个星期，这个星期是属于我的……我也去浇灌浇灌由于期待心上人而培育出来的甜蜜的幻想吧。

这时，广场上已堆满了汽车、行李和手提包。搬运伙喘着粗气，流着汗，一趟一趟地搬着行李。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些已经到达和正在到达的客人的职位高低，所以他们被某些客人叫到面前，严厉地训斥。这些客人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拿的是我的副主席的行李，而我是主席，即使我来得比他晚，你也得先把我的行李提到我房间里去。我们暂且不谈那些大人物如何在搬运伙身上撒气。他们的光临，带来了一种粗鲁而不拘小节的气氛：他们大喊大叫，热烈拥抱，拍打着肩膀，嘴里开着不干不净的玩笑。当一位部长驾到时，喧嚣的人群突然鸦雀无声。部长下车时，人们

就像水里的漩涡，静静地向部长流去；又像一堆铁屑，一碰到磁铁，一古脑地被吸了过去。不一会，又来了三四个身居要职的人物，我都不认识，他们受到了同部长一样的热烈欢迎。后来，当堂卡埃塔诺出现的时候，簇拥着部长和另外三四位要人的人群一齐向他涌来。在离他还有差不多一米远的地方停下来，自然而然地按职位高低排成一个半圆。我似乎觉得，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一个接一个地吻堂卡埃塔诺的手。堂卡埃塔诺熟识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一会儿问这个：工作是否顺利？一会儿那问个：家里的人可好？一会儿又问另一个：身体是否健康？这种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内容表示问候的方式，使众人皆大欢喜，他们为堂卡埃塔诺与自己如此亲热，熟悉而感到荣幸。但是我总觉得：在堂卡埃塔诺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讥讽的色彩。这一点，围着他转的这群绵羊是不可能发觉的，而我却发现了。为此，我感到格外高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别人无法察觉到的鄙视和厌烦，使我们俩结成了某种联盟，他那种比我更成熟、更机智、更敏锐的思想，正是我所渴望的。

突然，广场变得空无一人，又像早晨那样宁静了。也许，人们早已走进旅馆，而我，刚从沉思中苏醒过来，竟然没发现。

我走进旅馆，看门的神父变成了两个：一个是我刚到旅馆时坐在柜台后面看《里努斯》杂志的神父，另一个是当天在餐厅里吃饭时，在餐桌上认识的四个神父中的一个。

“怎么没人了？”我问道。

“客人们都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半小时之后，他们都下来做弥撒，仪式由红衣主教主持。最后，堂卡埃塔诺还要讲几句话。”

“就在下面的小教堂里？”

“是的，就在下面的小教堂里。”

“我可以参加吗？”

“我想是可以的。因为堂卡埃塔诺并不反对您在这里避静。我是这么想的。再说，避静是从做弥撒开始……”

我向他道谢之后就走了，但我却躊躇起来。这并不是因为我轻率地作出了做弥撒的决定；我留在这里，就是为了参加避静的。我耽心这种仪式会使我厌烦，并且，由于我这种轻率的决定，在做完弥撒之前，我没法离开小教堂。

我还是去了，并且经历了适度的烦恼。我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没做弥撒了（我用四分之一世纪而不用二十五年，这是我倚老卖老的嗜好），再说，这又是我第一次听到用意大利语做弥撒，于是我很快就沉湎于深思之中。我想到了教会，想到它的历史和命运，想到它光彩夺目的过去，想到它凄楚、冷落的今天，又想到它不可避免的悲惨结局。从美学的角度来讲，我在那无边无际、杂乱无章的沉思中，似乎感到了某种更遥远、更隐晦、更可怕的东西。一种忧烦的心情袭上心头，使我感到忐忑不安。犹如一个人刚走出门口，突然觉得忘掉了什么，或者丢失了什么，但又无论如何想不起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样。如果把这种心情描写得更具体一点或者夸张一点，那就是在此种气氛下，我茫然若失，不知所措。多年来，迷信、恐惧、宗教迫害以及拉丁语，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心头，如今，它像一抔黄土似的碎裂了。我十岁的时候，曾在做弥撒时当过辅祭，我还记得当时用拉丁语念经的情景。如今，又是怎样了呢？我用拉丁语祷词和缩简了的意大利译文作了比较，我发现，这根本不是翻译，而是“反译”。俗话说：“翻译者，叛徒也！”一点不假。这意大利译文简直是驴头不对马嘴，面目全非。请看这句话：“水和酒结合在一起^①意味着我们

① 《圣经》上说：“水”是指洗礼，“酒”代表耶稣的血，耶稣是借着“水”和“血”来到世界的。

同曾依附于人体的上帝结合在一起。”这些平淡无味的语言，使我联想到有人往酒中掺水。那些神秘深奥的意思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我想，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神奇玄妙的教条变成通俗易懂，人们易于接受的教义。就如同上演皮兰德娄的《六个角色》那出戏，宏伟壮观的场面，被粗犷、简陋的布景所代替；深刻、丰富的想象力，被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但是，皮兰德娄那种赤裸裸的表现方法是他创造的一种表现形式；他赋予它新的生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难道说，教堂里用意大利语，而不用拉丁语念经，也是为了寻求一种新颖的表现形式，赋予它新的生命吗？不，我不希望如此，我希望赶快结束这种局面。现在，它就要结束了。问题是，有许多东西，我们以为它已死亡，实际上，它仍然生活在凄楚、郁闷的梦谷之中。而理智，则永远清醒着。我们甚至可以尝试一下去唤醒它们，把它们从梦谷中拯救出来。但它们出来时，已变得软弱、憔悴而毫无生命力了。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多年以来，我的内心世界和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骗人的。我活着就是在不断地欺骗自己，同时也在不断地被别人所欺骗。只有付出的代价才是真实的，而代价，则是由痛苦凝结而成。现在我付出的代价只与银行有关，我所表达的感情、信仰、思想，没有一件不需要在支票上签字。譬如说，画的价格取决于署名的人，如同支票一样，只有签上字才有效。（总有一天，在举办我的画展时，我会拿出一些只签着我名字的画布，然后对画商们说：“你们画吧，一个名画家已签上名了。”）对于别人的痛苦也是如此（譬如说，我的亲戚朋友发生了不幸，或者生了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倒了楣向我求援，某些民族遭到了战火的洗劫人民在残酷的压榨下呻吟之类），只要我大笔一挥，签上个名，一切都解决了，我的痛苦也消失了，我也就从这些纠缠中摆脱出来。用这种

方法，我摆脱了许多烦恼。我能摆脱掉，是因为当我脱离了真理和现实生活的时候，什么痛苦，什么不幸和烦恼，都一概感觉不到了。

这时，一个滑稽的念头突然涌上我的心头：如果我这样沉思下去，这样忏悔下去，那么，做弥撒的人当中，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真正地静思了。因为那些来避静的人，到这里来不过是摆摆样子。他们对避静这一套十分厌烦。做弥撒的时候，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离得远的，则互相点头和微笑表示问候。他们是在这里度假，而且不是一般的度假；通过度假，可以建立各种有益的社会关系，可以策划阴谋，攫取政权，剥夺他人的财富，可以背信弃义，破坏他人的联盟，出卖，背叛……

“弥撒到此结束，可以走啦。”小教堂顿时沸腾起来，但立刻又平息下去，因为堂卡埃塔诺在唱经台后面出现了。那些离开自己的位置向外冲的人十分尴尬，他们默不作声，似乎有点后悔。堂卡埃塔诺的斥责声像冰雹一样劈头盖脸地向他们打去。他开始讲话了。他有气无力、慢条斯理地讲着，好像一个人因困倦而不断地打着呵欠一样令人难熬。开头，他埋怨人们不该这样做，然后，连声调也没变地转了话题。他讲到去年的避静和今年刚开始的避静对每个人的信仰意义有多么重要，又讲到举行这两次避静的必要性，还说，对整个社会来说，来避静的人都是各行各业的代表，他们也是教会在这些企业的代表，所以，在这一个星期的避静当中，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把属于上帝的东西都还给了上帝^①？

① 见《马太福音》：法利赛人问耶稣：“老师，我们知道你是大公无私的……那么，请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对不对呢？”耶稣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说：“属于凯撒的东西，应该给凯撒；属于上帝的东西，应该给上帝。”意思是说，世俗政权不应干预宗教；宗教也不干预世俗政权。

这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人低声对旁边的人说：“毫无疑问，他又想盖一座旅馆了。”说完，他不安地向周围望了望。他估计我听到了他的话，便会意地向我一笑。他以为我是他的支持者，以为我不会不知道，堂卡埃塔诺这位圣人，虽然有些严厉，还是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上帝的。但堂卡埃塔诺并没有谈及如何还给上帝（很明显，他把这句话的另一半忘记了：“凯撒的东西，应该给凯撒”）。于是，这个问题就让参加避静的人按照自己的权利大小、职位高低，凭着他们自己的良心去理解，得出自己的结论。

“现在，可以走啦！”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不过，在说“现在”两个字时加重了语气，再一次发泄了开始讲话时的那种不满情绪。

所有的人都庄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红衣主教和三个主教早已无影无踪，也许，他们早已离开了更衣室。小教堂里只剩下堂卡埃塔诺和我，因而显得大了一些。同平时一样，他似乎没看见我，但过了一会，他开始跟我谈话了。他终于醒悟过来了：我也在那里。“您还没有好好看看这个小教堂呢，也就是说，那个旧修道院的教堂……它遭受到最后几次破坏是在十七世纪……哎，那个扎菲尔修道院……关于它的历史，都是在上一世纪，由当地的一个学究编造出来的。传说这里曾经住着一个黑脸白胡子的隐士，当地一家药店的老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扎菲尔。我想，这位老板是这样把这个名字拼凑起来的：这个地方原来叫扎弗，在这之前，米开莱·阿马里翻译的伊本·扎菲尔的一本书刚好问世。鬼知道，也许，起初他把那经文当作是基督教的经文，后来又发现不对……反正似是而非……扎弗，扎菲尔，当然扎菲尔的发音更好听一些……你看，还有这个。”他用手指着一幅画说。在此以前，我还没发现这幅画：一个黑脸、白胡子的圣人，在他

面前有一本翻开的厚厚的书，还有一个相貌狡诈而令人发笑的魔鬼，头上长着两只角，鲜红鲜红的，活象刚剥下皮来的两块肉。更使我惊奇的是，魔鬼戴着一副黑框夹鼻眼镜。我好像在什么时候看到过类似的形象，但一时记不清是何时何地了。也许在童年，在梦中或幻想中看到过这种古怪而又可怕的魔鬼。“通过这幅画，”堂卡埃塔诺接着说，“药店老板编造了神话：圣人扎菲尔年老眼花，看不清东西，所以魔鬼要送他一副眼镜。这是一副有魔力的眼镜，戴上它，可以读《古兰经》。请注意，说的是《古兰经》，而不是《福音》。《古兰经》是用什么文字写的呢？用阿拉伯文，还是别的文字写的？这没有讨论的必要。其实，这位隐士根本不知道魔鬼就在他跟前……您是知道的，这幅画是马内蒂原作的粗糙复制品，他的原作在西耶那，圣阿戈斯蒂诺教堂里。我们且不管那位药店老板的幻想。我认为，这是一幅令人不安的画。一个戴眼睛的魔鬼！画家马内蒂在他的时代里画了这么一幅画，他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今天……”

“今天也一样，对你们，对你们的教会来说，无论哪种有助于视力的工具，都是魔鬼的功绩，要不就是魔鬼的施舍。”

“这是世俗的理解，过时的世俗观念，是乔尔达诺协会和弗兰切斯科·弗莱尔协会的解释。而我则认为：任何一种本质性的变化，都是魔鬼的创造，或是魔鬼的施舍。”

“这是萨德主义^①的解释。”

“可萨德也是个基督教徒。”他的眼睛离开了画惊讶地看着我。他因我不知此事而感到惊讶，也为至今没人告诉我此事而惊讶。

“这是您个人的见解。”我毫不掩饰地嘲弄地说道。

“这不是我个人的见解。”他也毫不客气地说。说完，便在

^① 萨德主义：性虐待狂，根据萨德侯爵的作品而得名。

小教堂里转起来了，好像我根本不在他跟前一样。转了一会，他又在画前停住。我想：我怎么说出那么一句平凡而又笨拙的话？这使我有点恼怒。我决定再说一句比较风趣而又巧妙的话。这时，他已登上了祭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眼镜，架在鼻子上，翘起脚，弯下身子，仔细地看画的右下角。当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这里有作者的署名，您过来看看”时，我顿时惊呆了：他戴的那副眼镜与魔鬼的眼睛一模一样。也许，他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他的神态似乎在警告我：老狐狸，就让你们这些蠢驴牢牢记住这副眼镜吧！可是，我很快就抑制了这种惊讶的表情；他更没有看出：我已从惊讶转为鄙视。我走到跟前，看画上的署名，艰难地读着那几个字母：“butasuoco，布塔苏奥科！”

“是布达弗奥科。”他纠正说，“您没看清第三个字母d，又把f读成s……是尼科罗·布达弗奥科，当地的一位画家。据两个世纪以前一位比药店老板更富有想象力的学者说，这个魔鬼是画家的自画像，包括犄角在内……有一天，他在画圣母玛丽亚的像，可是找来的模特儿是一个娼妓。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说：‘一旦玛丽亚显灵，我的头上就会长出犄角。’话音刚落，他的头上真长出了犄角。从此，玛丽亚就开始显灵，创造了无数的奇迹！由于他画了一副伤天害理的画，因而头上长出了犄角，这是罪有应得！”

他取下眼镜，重新放回口袋里。在说了这些使我目瞪口呆的话之后，他又恢复了那种恰如其分的冷漠。如同一只猫，在吃了黄雀之后，舔舔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他继续说：“布达弗奥科这个名字，不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幻想中，总与坏事联系在一起，起码与欺诈联系在一起。譬如说，这位画家把自己画成了一个魔鬼；薄伽丘的短篇小说《安德莱乌乔》^①中有一

^① 指《十日谈》中第二日的第五篇。

个布达弗奥科；在安若帝国的登记册中，人们还可以从西西里难民中找到一个布达弗奥科……”堂卡埃塔诺就这样海阔天空，无边无际地谈论着，挽着我离开小教堂，向餐厅走去。

我又被邀坐在他的身旁。头一天四个神父的座位上，坐着红衣主教和三个主教。餐桌旁又加了两把椅子，一把椅子上坐着那位部长，另一把上坐着一位工业家。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别扭。并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和部长、工业巨头以及宗教界高级神职人员一起吃过饭（恰恰相反，平时我就餐时，几乎每天都碰到几个显赫人物），而是天时、地利都不适合：这是一所神父经营的旅馆，又是在避静的时候。如果说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意外和惊奇，那么当堂卡埃塔诺给我们互相介绍时（他把我介绍给红衣主教主教和主教，尔后又把部长和工业家介绍给我），在坐的人则惊愕得目瞪口呆。也许，他们认为我改邪归正了，可是当红衣主教把手举到我跟前让我吻他的手的时候，我随便地握了握他的手，就抽回来了。红衣主教呆呆地望着堂卡埃塔诺，脸上流露出困惑不解的神情。所有的人都用一种询问的不安的眼光望着他。堂卡埃塔诺解释说，我是偶然来到此地，由于好奇，想在这里住几天，可以说，这是一次历险。

由于堂卡埃塔诺世故，老练，办事稳妥，经他一解释，疑虑顿时消失了。不一会，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夸奖起我的画来。几位高级神职人员曾在画展上或在收藏家那里看到过我的作品，因而赞不绝口。部长和工业家也滔滔不绝地恭维我，因为他们收藏了我的画（后来我才弄明白，他们买的都是在我双脚热乎乎的时候画的画）。就这样，我们的话题就转到美术上来了。尽管他们用世界上最华丽的词藻恭维我，最后我还是听懂了：四位神职人员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品在一个世纪以前就不复存在了，最后一个伟大的画家是尼科洛·巴拉比诺（这个名字使我回忆起，在我小时候，挂

在我母亲床头上的那幅圣玛利亚石印画。我刚会拿铅笔，就开始摹拟它。就这样，我摹拟了好几年。母亲看见了，总觉得不能理解，而我却总觉得能画好)。对部长和工业家来说，则要从经济、财政的角度来讲，如果绘画与投资无关，则美术作品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位部长和工业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四位神职人员的意见。部长和工业家坚持认为：就古画而言，无名画家的作品不好定价，而名画家的作品则是无价宝；现代画家的作品，虽然价钱不断上涨，但对名画家和无名画家来说，都是适当的。红衣主教反驳说：“当代根本没有杰出的画家。”但又立刻补充说：“当然，我们这位朋友除外。”说时，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的话。为了自卫，我随随便便地说了一个名画家古图佐^①的名字。红衣主教立刻说，他也不能算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话音刚落，堂卡埃塔诺就夸奖起古图佐的作品——《苦像》来了。他说，这幅画三十年前曾闹过大笑话，而现在，人们都说，梵蒂冈博物馆想买下它。“闹过什么笑话？”一位主教问道。“画上的人都光着屁股。”堂卡埃塔诺用嘲笑的口吻说。他嘲笑那些在三十年前认为画这幅画就是大逆不道的人。神职人员们解释说，把耶稣、玛利亚及其同情者画成裸体，是无辜的，因为他们的意图和效果都是虔诚的。相反，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位殉难者的亵渎是不胜枚举的。当一个主教把话题又重新转到古图佐身上，并说他是意共党员时，人们便列举了当代亵渎神圣的一系列事实。

“又有谁不是共产党员呢？”堂卡埃塔诺风趣地问道，“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称自己也是共产党员呢？”

不知堂卡埃塔诺这么说是当真还是开玩笑，所有的人都表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赞许，接着便是沉默。

^① 古图佐(1912—)，意大利印象派和立方派画家。

我打破了沉默，用一种轻微的但是充满嘲笑和戏弄的声调，小心翼翼地问道：“为什么保罗六世又拿出魔鬼来吓唬人呢？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何感想？”

“噢，您说的是魔鬼……”红衣主教讥讽地长长吐了一口气。但我立刻发现，他这种嘲讽的姿态并不只是冲我一个人来的。

“我怀着对教皇无限崇敬无限虔诚的心情，提出一个问题：现在谈论魔鬼是否合适？”部长说。他挑战似地看了我一眼，企图以此挑逗我在红衣主教、三个主教和一个机智、博学并握有实权的神父面前，向他这个大无畏的行为还击。

“为什么不合适？”堂卡埃塔诺说。

我想，这四个高级神职人员和两个虔诚的信徒的脑子都在紧张地思索着，重新布局，就好像一座刚落成的楼房，刚刚粉刷完毕，墙上便出现了裂缝。同样，在这几位大人物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中，也出现了裂缝。

“我不是说不合适呢，”红衣主教说道，“我是说采用的方式……我不清楚……也许……”话还没说完，他就中断了。他这种狡黠的沉默，显然是让别人继续说下去，而当别人讲到最高潮的时候，好让堂卡埃塔诺那雷鸣闪电般的回击落在他们的头上。但是，三位主教和两位虔诚的信徒并不比红衣主教蠢，他们避开了这个神学问题（这使我很失望），转而谈论保罗六世关于魔鬼问题的讲话。他们把它当作一份官方文件加以议论，就好像在评论某一个部的公文。至于教皇，当他们谈起他时，就好像在议论一个部长，而他的文告，可能是由于缺乏经验，有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再说，这篇讲话也是出自他手下的主教之手。要知道，教皇手下有形形色色的主教，有的忠实而无能；有的有才华而不忠实；有的，德才兼备，忠实而有才干；有的，既无才干又不忠诚。

“教皇很健康吧？”工业家问道。

“教皇，”堂卡埃塔诺说，“教皇永远是健康的。甚至可以说，不仅他们死时是健康的，而且还会因健康而死。当然，在这里，我指的是头脑健康。”他转向工业家又说，“因为我认为您提出的这个毫无恶意的问題，恰恰是指的这个……至于其他疾病，什么年老病痛，就不管它了。”

“对，”我说，“从来没有一个教皇因年迈或动脉硬化而胡说八道。我的意思是说，从来没听说过。”

“是的，从来没有过。”红衣主教说。

“从来没听说过。”我十分肯定地说。

“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存在！”堂卡埃塔诺说。

“我认为，有些事情我们并不知道，然而，它们是存在的。”我回敬了一句。

“对，我同意。但是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宗教，是教皇。”堂卡埃塔诺接着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看不见的权力。所有世俗的东西都是表面现象，都在掩盖、欺骗；而宗教及其代理人，则是人眼所不能看到的天国的具体体现。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对某些教皇的乖僻发生兴趣，也不反对对他们的气质，对他的衰老发表议论……比如说，教皇庇奥二世热衷于写他的《记事》……当一个教皇热衷于记述自己的经历时，就感情来讲，与其说他是一个教皇，毋宁说他是一个冒险家！”

红衣主教和主教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他的这番议论，但是，经过争论却露了底：他们根本就没读过《记事》。而堂卡埃塔诺，则可以背诵他所需要的段落。“我认为，”他继续说，“庇奥二世在口述《记事》时，并没有抑制住他那种由于登上了宝座而沾沾自喜的心情，这便超越了神的意旨。他急切希望向普天下宣告：你们看，我坐在彼得的宝座上，我就是《情侣传》中的年迈的埃

内亚·西尔维奥^①……在文学上，他好像斯汤达尔笔下的人物……”这时，红衣主教已忍无可忍，他愤怒地咳嗽了一声，以便让堂卡埃塔诺变得规矩一点。堂卡埃塔诺看出了他的心思，为平息他的怒气，马上说：“但他是一个伟大的教皇，阁下，极伟大的圣人！五个世纪以前就死了……我似乎记得，他死于公元1464年8月14日夜到8月15日之间，这一天刚好是第二轮避静收尾的时候。对，恰恰是这一天。我将要给避静的教友们讲讲庇奥二世的事。”

“这是个好主意。”红衣主教冷淡地说。

“好极了！”部长嚼着满嘴的菜，像神父洒圣水时挥舞刷子似地摇晃着刀叉，指着 he 面前的菜小声地说着，指的是那盘鸭子，香酥可口。

我只顾叙述他们的谈话，忘记描写这个热气腾腾、充满生气的餐厅和上菜的情况了。菜单印在一张折叠的硬纸上，封面画着一个魔鬼在引诱一位圣人。菜单上的菜名花样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无论是花色还是烹调技术，都令人赞不绝口。扎菲尔旅馆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餐厅里座无虚席，厨师们大显身手，侍者上菜神速而且礼貌周到。这里除了十几个侍者之外，还有一群年轻姑娘，虽说她们只是第三流的女侍，但不乏其打情卖俏、卖弄风骚的情趣。还有另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每一张桌上都放了一束盛开的鲜花；五个女人已不见踪影；饭前祈祷由红衣主教主持。在这种气氛下，我坐在这里极不相称。当他们站起来在胸前划十字，念祷词，并再次划十字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简直像教堂里的一只狗，说得体面一点，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狗。尽管如此，当他们站起来祈祷时，我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① 教皇庇奥二世的名字。

从餐厅出来，我遇见了那个头一天坐在柜台后面读《里努斯》杂志的留长发的神父。我问他，五个女人哪里去了？他脸色阴沉地回答说：“您说呢？会在什么地方？当然是在她们自己的房间里。”说完，便匆匆走开了。

下午，红衣主教主持了避静开幕式。他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心不在焉地听着，而教徒们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心，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红衣主教一面念着《新约全书》，一边用手指敲打着桌子。在他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道中，只字未提《福音》，只有两、三次提到耶稣的名字。

当他念完最后一页时，每一个人都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这声音汇合在一起，好像气球撒气时发出的响声。讲话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红衣主教满意地摆摆手，让人们安静下来。掌声一停，堂卡埃塔诺便宣布：“大家都到各自的房间里去静思一小时！”

一走出小教堂，我就发现，他们各有自己的打算，谁也无心静思。教友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的在谈论正在读的书籍，有的在谈论将要在这里建立的新关系，有的急着要写篇报道，有的要赶回房间里去打电话。我站在门口，一个教友凑到我身旁，用手指着一个离我较远的人说：“您瞧，他知道回房间去应该干什么。”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被指的那个人矮矮的个子，戴着一副宽大的眼镜，从他的神态看来，活像一个神学家。

“他是谁？”我问道。

“怎么，您还不知道他是谁？”他惊奇地问道，“他叫……”说出了我一个我所熟悉的名字。

“原来是他。可他到底在干什么？”

这位教友并没直接回答我。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意

思是说：那是一般人想象不出的天堂里的事情。可是脸上，却流露出贪婪、淫秽和嫉妒的神情。说完，他似乎觉得太不谨慎，失了言，便匆匆忙忙地、头也不回地走了。

不一会，广场上只剩下两个人在热烈地交谈着。他们谈的是有关修路和包工的事。堂卡埃塔诺从小教堂里出来，一眼便看见了，他用食指指着他们十分激动地嚷道，“律师，议员先生，你们至今还在谈生意，为此，我感到惊讶，赶快回房间去静思！”

两位先生犹如正在分赃的小偷，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他们一跳，便飞也似地跑进旅馆大楼里去了。堂卡埃塔诺微微地一笑，走到我跟前说：“我敢打赌，关于红衣主教的讲话，您想得要比别人多些。”

“您过奖了。”我说，“我确实在想，不过，我想的是刚才在小教堂门口听到的那句不怀好意的话，我在揣摩它的含意。刚才，您的一位教友告诉我，”我说出了他的名字，“他知道另一位教友在房间里干什么勾当。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指的女人！”

“他房间里还住着女人？”

“您说得不太准确，那女人有自己的房间。”

“我懂了。您指的是五个女人中的一个？”

“是的，五个当中的一个。现在，她们都在这儿，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但是，她们却不是为同一个男人来的。”

“您允许这样做？”

“我的朋友，我什么都允许，既然允许他们来，就允许他们做任何事情。”

“可是，这是避静。”

“我觉得您有点轻信，似乎您比我更相信他们。您是从字面上来理解这次避静的，至于他们是不是在避静，我比您清楚得多。

我认为，你们，也就是世俗人，过于崇拜宗教和神父，因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你们希望教会和神父积德行善，完美无缺，而你们自己，却舒舒服服地站在一旁，享受着人间的快乐。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请你们到这里来亲身体验一下：我们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总之，按照世俗人的理解，避静就是苦修……好啦，不说这些了。和那五个女人厮混的可怜虫都有妻室儿女，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朋友和敌人。敌人无时无刻不在窥视着他们，朋友和敌人都在监视着他们，甚至偷听电话……这五个人都有情妇，这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整整一年，他们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这一星期的到来。一到这里，便真的‘避’起‘静’来了。在这之前，他们先把自己的姘头托付给我，说是需要在这里休养。要知道，没有他们的委托，我是决不收留的。他们的家庭正在崩溃，他们过着痛苦的生活。所以想在这里，在这舒适安逸的宗教环境里，找到安宁和慰藉。我么，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欣然接受他们的委托。但我十分清楚，一年来，他们朝思暮想的这一周，正是在地狱里倍受煎熬的一周。那个对您说这件事的白痴，还以为这些贱货在享受人间的乐趣呢。您猜，这些通奸的狗男女在房间里干什么？他们在吵架！没完没了地吵，无缘无故地吵，吵得不可开交。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罪有应得！他们问心有愧，也承认自己是好色之徒，私通犯。如果您到他们门前偷听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正在吵架（现在，肯定有好多人在偷听）。他们吵得很凶，比真正的夫妻吵架还凶一百倍！不过，请您相信我，最好的消遣，莫过于娼妓献给您的一刹那的昙花一现的欢乐。”

“这话竟出自您的口……”

“这有什么？事情很简单。男女之间的云雨私情，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哪有什么爱情？只不过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就好像一个人渴了需要喝水。当您口渴时，喝了水就舒服了，就

这么简单。请您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感情、思想、习惯、全副精力都倾注在性欲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止渴’上，这难道也值得大惊小怪？难道是不可思议的？一旦口渴，就喝个饱……至于娼妓，您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里，哪里的水最甜？最解渴？当然是大街上的某个角落，或者乡下、路旁的水泉里。”

“您说的饮水止渴，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我说。

“您还记得吗？一个俄国的革命家曾谈到过水杯的问题，他说，他从不用别人用过的杯子喝水。这有点反动，您说是不是？”

“不，这是清教徒。所有的革命者都是清教徒。”

“假如您也说，您只用自己的杯子喝水，那么……”

“允许娼妓存在不是更反动吗？您说是不是？”

“我的革命性就像我的反动性一样，越革命，越反动。”

“咱们不谈这个问题了。”我厌恶地说。

“且慢。我劝您不要再读那些粗野地恶意中伤神父的文学作品了。虽然所有的意大利人，包括教徒在内，都受了这些小说的毒害，然而，我希望您变得更聪明更严肃些……我可以用中世纪一位编年史作者的话来形容我自己：‘他是个纯洁的人，他的贞洁来自他那颗霉烂发臭的心。’我之所以看破了爱，就是因为我懂得什么是贞洁。您不懂什么是贞洁，所以把爱复杂化了。当然，您初次接触到贞洁时，它显得阴森可怕……有时，您也会明白，这与您所从事的艺术有相似之处。你们的画都有局限性，有一定的框框，有一定的范围，而实际上，这些框框和范围都是不存在的。同样，贞洁只是爱所依附的某种形式，它把艺术变成现实。”

我说：“没有女人，没有女人给我带来的烦恼，我就无法生活。但是，我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像走马灯那样，丢掉一个，又去找另一个；有时，与第一个还没完事，又去搞第二个了。”

“可我敢跟你打赌，就她们的性格来讲，您追求的总是同一类型的女人。”

我想了片刻说：“您赢了。”

“您瞧，您也染上了一种恶习。这是人们的通病……人一到青春期，他的童年时代便告结束，而在性的问题上，童年时期的特点依然存在。我讲得更清楚一点：儿童心理学家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准确的术语我记不清了，就是儿童喜欢对某一事物无止境地重复。儿童总喜欢让大人一遍又一遍地讲同一个故事，喜欢没完没了地反复做同一种游戏，直到童年结束为止。堂璜的淫荡行为就是这一规律在青年和老年时期的延续，一直到返老还童为止，然后便是人生的终结——死亡。人们发现，所有的堂璜式的人物到了暮年，都会返老还童，一个也不例外。”

“即便我已染上了堂璜式的恶习或痼疾，恐怕也活不到返老还童的那一天了。”

“您染上了这种痼疾，您也能活到那一天。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青春和返老还童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线。”

“您是在用天主教性恐怖症这个破烂武器来对付我，是不是？您不说我将来要下地狱，而是说我将来要返老还童。”

“这您就大错特错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天主教性恐怖症。从历史上讲，天主教只是把爱变得更加丰富、更加高雅。而今天，我们倒是可以发现某种新的性恐怖症。至于谈到威胁，我对您没有任何威胁。如果您注意一下周围的事物，留心观察那些堂璜式的人物，您就会发现他们的暮年究竟是什么情景了。”

于是，他扔给我这样一个凄楚可怕的问题之后，就消失了。

过了一小时，广场上又挤满了人，那里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似乎教徒们都静思过了，正在热烈地交换着心得。你瞧，敌手们在互相讽刺挖苦，唇枪舌剑；朋友们在阿谀奉承，吹吹捧捧，随

声附和，亦步亦趋；有的正在做着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大多数人，三个一帮，两个一伙，在窃窃私语，犹如神学院的神父聚会时的情景。不难看出，在我跟前的两个人，正在商量如何对付站在对面的、离我较远的两个敌手……于是，广场变成了一架生产阴谋诡计、制造圈套的织布机，织布的梭子像箭那样飞快地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

我走到他们中间，企图听听他们交谈的内容。可是很失望，无论如何也听不清楚。有时听到几个单词，有时听到几个不完整的句子，偶尔也能听到几个前后连贯不起来的句子。人们说话的声音很低，何况，都在交头接耳，嘁嘁喳喳。从表情上看，他们都很认真，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犹豫不决。我徒劳地听了半天，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谈论那顿已经吃过的午餐和两小时之后就要到口的晚餐。有人说，已经没有食欲了；有人说，他盼望着丰富的晚餐；有人说，某个菜已吃过，不想再吃了；还有人说，他仍感到肚子饿，还想吃；有人说，某个名菜还没吃过，得想办法搞来尝尝；有人说，要想长寿得多吃饭；有人说，要节制食欲等等。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说的都是暗话、黑话。一种抑制不住的厌恶情绪涌上心头。我似乎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堆腐烂发臭的肉。于是，我急忙离开广场，向树林走去。

当我回到旅馆的时候，人们已在餐厅里就座了。

堂卡埃塔诺向我打了个手势，仍然让我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红衣主教和另外三个主教坐过的地方，坐着几个陌生人。堂卡埃塔诺向我一一作了介绍。在这之前，我既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的职务。我对堂卡埃塔诺说，我想第二天离开旅馆。

不管他们谈什么，我一直默不作声。只有堂卡埃塔诺发表议论时，我偶然听几句。他的思想机智、敏锐，像权威似地引经据典，然而却常常语无伦次。他的话多半是对我的恭维。尽管他海

阔天空地谈着，我却看得出，他神态恍惚，无精打采，两眼茫然地望着远方。他一直在揣摩我沉默不语的原因，并微微向我暗示：同我一样，他也厌恶这帮恶棍。他似乎在对我说：我知道您厌恶他们，可是您瞧，我只不过是在应付他们。可对我来说，他和他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都是一丘之貉。

饭后，人们陆续离开餐厅，向院子走去，簇拥在堂卡埃塔诺周围。我发现，这不是自发的，而是事先约定好的。我那烦闷、忧郁的心情，顿时被好奇心驱散了。

起初，人们围成一个圆圈，堂卡埃塔诺站在圆圈中心，不一会，可能人已到齐，圆圈变成方框，他便站在第一排的中间。排好队，人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一瞬间的寂静笼罩着广场。突然，堂卡埃塔诺的嗓音打破了寂静：“以主的名义，以圣子的名义，以圣灵的名义，阿门！”排成方框形的人群开始蠕动了。这时，周围的电灯已全部熄灭，广场本来就十分宽敞，在黝黑的夜幕下，显得更加开阔。人们先从旅馆门口向另一端移动，走到尽头，队形似乎有点混乱，然后他们一面向后转，一面整理着队形；这时，他们正在齐诵“我们的圣父！”整好队，便齐诵“福哉玛利亚！”一面诵经，一面向旅馆门口走去。借着从旅馆第一层窗子里射出来的微弱的光，我发现堂卡埃塔诺仍然站在原来的位置上，然而，他身边的几个人却不见了。当人们站在广场的另一端时，由于相距太远，我看不清楚，现在已走到跟前，我才发现，方框形的队伍走得十分整齐。刚走到旅馆门口，便自动停下来，然后向后转，于是，原来的第一排变成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变成第一排。同时，人们主动给堂卡埃塔诺让出一条道路，他从最末一排走到第一排，站在第一排中间。当然，在变换队形的时候，个别人难免一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人们齐诵《玫瑰经》的节奏，却清晰而准确。

我被这从未见过的场面所吸引。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向我走来，并坐在我的身旁，我都没发现。只是当听到有人在我身旁上气不接下气地哈哈大笑时，我扭过头去，才看到了他。他胳膊上戴着套袖，一块餐巾围在脖子上，另一只手拿着另一块餐巾，使劲地擦着头脸。他对我说：“我每年夏天都到这里来看他们诵经，即便工钱少，我也来。”“您瞧！”他双唇微微地动了动，嘴上挂着一丝轻蔑的微笑。说完，迅速地转过头去，就好像电影观众，为了不放过每一个镜头，赶快把视线集中在银幕上似的。

“我是厨师。”说完，他又沉溺在这富有吸引力的场面之中。

人们在黑暗的广场上一面诵经，一面有节奏地来回走着。但他们的步伐是急促的，就好像一个人害怕走黑路，急急忙忙朝灯光走去一样（事实也是这样，在旅馆门口，他们走得比较慢，而在广场的另一端，步子就加快了）。在齐诵“我们的圣父！”“福哉玛利亚！”和“至高无上的荣誉！”时，声音显得惶恐不安。堂卡埃塔诺领诵的声音，则显得干瘪、冷淡而遥远。当他领诵“神秘的使命！”“拯救之奥秘！”“魔鬼！”和“刺入灵魂之剑！”时，那种应有的神秘的气氛和深奥的喻意，被他无情地歪曲了。他不是在诵经，而是在为扎菲尔旅馆——人间和地狱交界之处——正在发生的残酷的现实，发出痛楚的哀鸣。无论我、厨师还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他们虚伪的假象后面看到某种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向黑暗走去时，口中念着祷词，却因恐惧而畏缩不前，由于罪孽深重，心惊胆战。表面上是在避静，实际上是在八层地狱里绝望地挣扎！想到这里，我便记起但丁《神曲》中强盗的灵魂在八层地狱遭受折磨的可怕情景。

第二天，堂卡埃塔诺一见到我，便问：“您喜欢我们诵《玫瑰经》吗？”

“非常喜欢。”

“我知道，您会喜欢的。”

“遗憾的是，当时只有两个观众：我和厨师。”

“啊，厨师……我认识他，他是个热情的观众，是个机灵人，一个能干的厨师。可惜，是一个易怒而固执的异教徒。但我不认为他是个共产党员或社会党员……您说只有两个观众？您又弄错了，我也饱尝了眼福。”

“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

“请。”

“您是个什么样的神父？”

“一个同其他神父一样的神父。”

“不，我不信。”

“您认识许多神父？”

“是的，我认识不少神父。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我们家乡有不少神父。其中有两三个好神父，十来个坏神父。哪几个好神父，从来不给人家出坏主意；在教徒举行婚礼，办丧事，或给孩子洗礼时，他们要钱不多，有时，也莫名其妙地把教堂美化一番，也就是对教堂作践一番。对他们，人们没有什么闲话。那些坏神父，既贪婪又吝啬，教堂的房顶塌下来他们也不管；他们整天播弄是非，离间夫妻；玛丽亚的女儿们——女修会的修女和那些富有、虔诚、热心的贵妇人是他们的座上客。然而，不管好神父还是坏神父，都是一群蠢驴。”

“我懂了。可是，您把我划到好神父一类，还是坏神父一类？不管怎么说，我非常坏。”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如果您想说我是个坏神父，还存在着一个小小的障碍，即我还不是个蠢驴，因为，‘我博览群

书’……不管怎么说，您已决定把我划到坏神父那一类去了。但是，您也可以排除这个障碍。我是个坏神父，我与其他坏神父的区别，就在于我读过许多书，我了解我们的时代……我想讲得更清楚一些，给您解开这个谜。我说自己是个坏神父，决不是因为谦虚，而是确实如此。原因很简单：好神父和坏神父都是一丘之貉。宗教之所以能存在下来，说得恰当一点，几千年来，宗教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那些坏神父，而不是那些好神父。亵渎圣德，甚至践踏圣德的神父，正是维护了圣德，他们高举圣德的大旗，并且维护这面旗帜。也就是说，在虚伪的崇高后面，隐藏着真正的崇高的思想……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真理，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化，也可以使它复杂化。”

“这么说，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皇莫过于亚历山大六世罗。”

“这是庸人之见。对不起，只有像厨师这样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想接着您的话题说下去。亚历山大六世是个伟大的教皇。但如果我问您：庇奥十世好，还是亚历山大六世好……”

“我说亚历山大六世好。”

“是啊。要知道，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些似是而非的话。如果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宗教是伟大的、崇高的、超脱的，就在于它的纯历史主义的特点，即它对于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社会各阶层中的每一个成员，对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每一次变迁，以及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必不可少的。”

“看来，您是个狂热的信徒。”

“您以为不是吗？您瞧瞧我穿的这身衣裳。很明显，如果您认为谁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就是狂热的信徒的话……不过，我这些观点和您对宗教所产生的怀疑一样，是有害的，有腐蚀性的……现在，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们可以回到那些似是而非的话

题上来。”

“不，最好不要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请您用简练而明确的语言直接地回答我：“什么是宗教？”

“您听我说，一个好神父会这样回答您：宗教是上帝组成的大家庭；但我是个坏神父，所以，我这样回答：宗教是一只木筏，一只正从梅杜萨^①身边渡过的木筏。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简单地称它为木筏。”

“我还记得热里科绘的一幅可怕的图画。虽然那本书我才读过几年，可惜我已记不清那只木筏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是件可怕的事，似乎有一句谚语……那只木筏上有几个人得救了吧？”

“一百四十九个人当中，有十五个人死里逃生。也许没有这么多……噢，不，不，我们现在不是在谈梅杜萨的事，而是有关教会的事……百分之十也太多了。”

“为了逃命，这十五个人都干了些什么事？”

“这我不感兴趣。因为梅杜萨和木筏都是神话传说，含有某种寓意。我感兴趣的是宗教。”

“如果木筏遇难，我宁愿死在木筏上。”

“不。如果木筏翻了，您会抓住它的残骸拚命地挣扎。因为那只木筏早已沉没了，所以您才这么说。”说着，他开心地笑了笑，“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仍然在想着木筏从梅杜萨身边摆渡时所发生的事情。我竭力想回忆起那些情景，边想边向我那辆小汽车走去。我没能回忆起来，但我读那本书时的那种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恐怖景象，又展现在我的面前：食人肉。“这是

① 希腊神话中的女妖，人看见她即变为石头。

我的肉体，这是我的血！”《拜物教和禁忌》是我接触到的弗洛伊德的第一部作品，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犹如一道光彩夺目的闪电。后来我才懂得，伟大的发现往往是从平凡的、司空见惯的、甚至人们所不注意的现象中总结出来的……如果木筏翻了，我决不抓住它的残骸不放，这决不是因为那只木筏早已沉没了。生活对我来说还是一艘平稳的军舰。（堂卡埃塔诺所说的：“我博览群书”，是从马拉美的《风雨飘摇》一诗中引用的半句诗，那句诗的原文是这样的：

悲惨的人生，
啊，我博览群书！
……

我默诵着它，木筏的不幸遭遇使我心慌意乱。）

我到城里去了。虽然城里热得像一个火炉，但我觉得轻松、愉快。这里是盛夏，而堂卡埃塔诺的修道院和旅馆那里，却微风拂面，凉爽宜人，两个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正午刚过，我就回到修道院，想在树林里找个地方睡一觉。起码，这是我的愿望。在林中空地，我又遇到了那五个女人，我陪她们玩了一会，那是一个愉快的下午。然而，我不想夸大其词。我同其中的一个女人聊的时间最长，也很投机，因为我无法掩饰对她的好感，再说，我已决定第二天就离开这里。我还要住上一夜，因为我还想看一看诵《玫瑰经》的场面。像厨师一样我也被迷住了。

但是，在偶然性的锁链上，又焊进了一个新的链环。

午餐像前两天一样，没什么新鲜玩艺儿。红衣主教和三个主教的座位上又换了四个陌生人。我恍然大悟：原来，堂卡埃塔诺

抓住部长和工业家不放，而另外四个座位则每天更换客人。至于他按照什么标准安排先后次序，以及他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就不得而知了。照例，他一一向我介绍新来的客人。对我来说，他们的名字并不陌生，同样，我的名字他们也早有所闻。这里面有一位是某个很大的国立协会的主席，由于他担任了这个职务，不久前被免除了参议员的职务。他的脸，长而尖，活像一只狡猾的狐狸。使我惊异的是，他对教文学^①和经院哲学颇有研究。在餐桌上，他和堂卡埃塔诺引经据典，你来我往，忙得不亦乐乎。

午餐快结束时，我对他们谈论的奥里泽杰内^②、伊雷内奥^③，也发生了兴趣，但我的理解绝不是正统的。至于保尔杰斯，我只是听听罢了。

饭后，同昨晚一样，人们蜂拥到广场上。厨师早已坐在那里，我就坐在他的身旁。

“您也喜欢看？”他像问候似的对我说。

“是啊，简直是一出绝妙的戏。”

“是啊，又是免费入场。不过，我还是要付出代价的，早晚要付出代价的，我会得肺炎。”他一面说，一面用餐巾揩着脸、脑袋、脖子和耳朵。

“您不知道，厨房简直是座地狱。我就这样跑出来了，院子里又有风……为了不耽误看戏，我急急忙忙就出来了。我的主，看着这群婊子养的一边走一边诵《玫瑰经》，多么开心……”

“不信教的人也能在宗教中找到乐趣啊！”我说。

“也许。不过，我对宗教不感兴趣。”

“那么您是怎么到这家神父办的旅馆里来当厨师的呢？”

① 基督教神学的一种，出现于罗马帝国后期及中世纪前期。

② 奥里泽杰内(183或185—253年)，意大利神学家。

③ 伊雷内奥，大约生于公元135年，死于200年。天主教圣人、教父。

“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朋友骗了我。他对我说：‘我不太舒服，你去替我干两天吧！’实际上，他早已找到了一个薪水更多的工作。后来让我知道了，我想甩手不干，可是堂卡埃塔诺……再说，又能看这出戏。可是，我对堂卡埃塔诺说过：‘迟早我要在汤里下个一斤毒药，让你们尝尝。’”

“堂卡埃塔诺怎么说呢？”

“您猜他说什么来着？这个婊子养的！”他带着惊奇而诚恳的表情说，“他说：‘我的孩子，你放毒的时候先通知我一声，到那时，我就不喝汤了……’您瞧，这个畜生……噢，开始啦！”说完，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表演开始了。人们排好队形，慢慢地蠕动着，堂卡埃塔诺的声音直冲云霄：“以主的名义，以圣子的名义，以圣灵的名义，阿门。”

“圣父派来的天使……”

“天上的主宰……”

“福哉玛丽亚。”

“光荣的主……”

“永存的天主……”

“天主在圣子受难之后……”

“我们的主……”

“福哉玛丽亚……”

“光荣的主……”

“圣母，祝您平安……”

一会儿是堂卡埃塔诺领诵，一会儿众人齐诵，此起彼伏，祈祷声在漆黑的夜空中荡漾。念着祷词的人们，那声音、那模样，就像徘徊在铁笼里的野兽，在广场上往返奔突：黑暗处是急促地行走，到昏暗的灯光下，则因惧怕黑暗而踟躇……这一切，在我

看来，恰似巫师领着一群乌合之众在大街上招魂。然而，他们极为矫揉造作，滑稽可笑。我坐在那里，就好像一个不信鬼神的人，目睹着招魂的把戏一般。

“神圣玛丽亚。”

“圣母。”

“童贞玛丽亚。”

“耶稣之母。”

“纯洁玛丽亚。”

这时，我脑海里突然飘来一段童年时代的回忆。记得在我小时候，每逢夏天，妇女们都坐在院子里诵《玫瑰经》；而在冬天，则围在炉子旁。她们念不准拉丁文，祷词出自她们的口，便变得十分可笑。其中有一段我还记忆犹新，当她们念“象牙塔”时，把eburnea念成burrea，于是，那段祷词就被歪曲成为“答应献给天堂抹上黄油的面包”。我小时候多么爱吃这种面包啊！

“象牙塔。”

“金房屋。”

“缔约之柜。”

“天门。”

当堂卡埃塔诺领诵的声音刚落，众人准备齐诵“请为我们祈祷”时，突然传来象开香槟酒瓶似的“砰”的一声。

那时，方框形的队伍恰好走在广场的另一端，这是离旅馆门口最远的地方。我和厨师正坐在门口。人们走到尽头，停下脚步，刚刚来了个“向后转”。突如其来的响声使祷词顿时中断。一刹那间，队形乱了，人们像受到离心力的作用，向四面八方逃开。

堂卡埃塔诺仍留在原地，在他身后十到十五米的地方有一个模糊不清的黑影。堂卡埃塔诺如同一座雕像，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凝视着旅馆，而黑影却像一个人倒了下去。他迅速地转过身，向

黑影走去。这一切，都是在大约半分钟的时间内发生的。堂卡埃塔诺弯下身去翻动着。我和厨师不约而同地跳起来，向黑影直奔而去。我们跑到跟前，堂卡埃塔诺左腿跪在地上，右腿支撑着身体，嘴里在说：“埃戈，我以天主和圣子的名义宽恕你！”他看了我一眼，站起来说：“他死了。”

死者就是那位已免去参议员职务的某个国立协会的主席。午餐时，他曾和堂卡埃塔诺引经据典地争论不休。死后，他那张瘦长的脸不再像狐狸，而像用某种易碎物质做成的模型。他似乎仍在痛苦地思索。我打着打火机，在颤动的光焰下仔细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堂卡埃塔诺和厨师：神父呆若木鸡，毫无表情；厨师却满头大汗，似乎比站在火炉旁还要热上十倍。

向四面逃窜的人群如今又陆续地围拢上来。他们急切而又谨慎，想问点什么，又怕听到别人的回答；想看看死者，又怕看到他已被杀死的残酷现实。他们一面互相询问，一面向我们走来。

“他是谁？”“他怎么啦？”“是被打死的？”“谁开的枪？”人们七嘴八舌地向我们提出各种问题，把我、厨师、堂卡埃塔诺和死者团团围住。我用胳膊肘捅了捅厨师，走出人群。厨师跟着我，也走了出来。堂卡埃塔诺大声地说：“马上通知警察局！”又说：“不要挪动死尸！”便走出人群，稳健地向旅馆大步走去。

我和厨师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我像一个观众，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议员被杀是突然出现的一个高潮，这一高潮又发生在诵《玫瑰经》的时候，于是，这出戏变得更加活跃，更加谐调，更加完整……厨师却完全是另一种神情：坐立不安、忧心忡忡。

“幸亏，我一直和您在一块。”他用颤抖的声音说。

“为什么？难道他们会怀疑我们？”

“不知道……他们总得怀疑一些人吧，总不会在自己人当中找嫌疑犯吧……您想，人们会怀疑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哥儿们？再说，当时他们正在诵《玫瑰经》呢。”

“就是说，警察局不会怀疑他们当中有人杀死了参议员？”

“您和我都这么说。可是，警察局会怎么想？他们首先怀疑旅馆里的佣人、伙伙、附近的农民，还有您和我。只有当他们认为我和您没有任何理由干掉这位老爷时，才会怀疑另一些老爷……走着瞧吧，也许，您是例外。”

“也许。”我开玩笑地说，“我从来没想用毒药毒死他们。”

“您可千万别提这件事，您在拿我开心。一但让警察局听到，他们决不会放过我的。我可知道警察局的那些人，我可知道……”

“警察局找过您的麻烦？”

“是啊。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而是他们故意找我的麻烦。那是一宗偷盗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偷了一只皮包，我把他放走了，然后去报案。您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贼喊捉贼。”

“一点不错。他们整整盘问了我一天，他们问我：结过婚吗？我说：结过。又问：与其他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吗？我说：没有。赌博吗？不。也没玩过彩票？没玩过。欠人家债吗？一个里拉也不欠。他们又问我皮包里有多少钱。我说可能有十万里拉。他们叫我说得准确一点。我说，说不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他们翻来覆去地问我皮包里有多少钱，最后把我问火了。我问警察局长：请告诉我，您钱包里有多少钱？他想了一会，因为他没料到，我竟然狗胆包天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十分冷淡地回答说：三万七千五百里拉。我呢，天真地说：那么让我看看。于是大难临头。警察把我老婆叫去，也不知对她说了些什么，我老婆怀疑我在外面乱搞女人，真是祸从天降，我成了贼！您想想，

如果他们知道我说过那句话……不过，堂卡埃塔诺了解我，如果有人说我坏话，他会替我说话的。”

“当然，当然。”我说。我后悔不应拿那句话跟他开玩笑。

堂卡埃塔诺又走了出来，站在门坎上，拍拍巴掌大声喊道：“都到这儿来！”

人们懒洋洋地凑过来。堂卡埃塔诺说：“警察局的人马上就到。他们不让动尸体，让我们离得远一点。谁也不得离开旅馆，也不能回房间睡觉，要不然，还会把你们从床上叫起来的……大家都坐到这儿来。我们都回想一下，在听到枪声之前和枪响的时候，每个人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回答得越简练、越清楚越好，事情了结得越快。”然后，他又朝站在旅馆里面发呆的侍者拍了拍手，说：“快拿出块床单来，把尸体盖上。把所有的灯全部打开！”

不一会，广场周围的电灯分三批全亮了。强烈的灯光，照得人睁不开眼。死者躺在广场另一端的尽头。看起来，他已萎缩、僵硬。两个侍者拿来一块白床单，盖在他身上。飞虫在灯光下乱舞，墙上的壁虎小心翼翼地向电灯爬去。它们的出现预示着更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一阵凉风迎面吹来，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从小就怕壁虎，一见到它便战栗不停。有人说，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来讲，它是有益的，因为它以食害虫为生。我想，假使自然界的生态不平衡，是由于只有壁虎而没有昆虫，或只有昆虫而没有壁虎造成，那么，最好是既没有昆虫，也没有壁虎）。

突然，部长开口了。他那自命不凡、傲气十足的神态，掩饰不住声音的颤抖：“堂卡埃塔诺，您对警察局讲过没有，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我们是谁？”堂卡埃塔诺冷冷地问道。

“我们……就是大伙……我，还有朋友们……”部长狼狈不

堪地回答。

“我说过，您在这儿。”堂卡埃塔诺说。但他的神态却好像在说：天哪，我是在跟这帮畜生作伴啊！对此，我很高兴，厨师也很高兴。他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

部长灰溜溜地走开了。人们坐在一边，就像坐在观众席上，看着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又是一阵沉默。堂卡埃塔诺又说话了：

“我决不认为，你们当中会有人干出这种事……”于是，所有的人都在想：他们当中有人杀死了那位协会主席，也就是说，杀人犯就在他们中间。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辨认出来，杀人犯就在他的身旁。“我想，”堂卡埃塔诺继续说，“也许是有人在树林里走了火。”

“这个婊子养的……”厨师低声对我说。这时，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喝采声。

喝采声未落，警察局的车队便在一片嘈杂声中赶到了旅馆。

警长向四周扫了一眼，看见在场的人都按他的吩咐坐在一边，现场保护得井井有条，便说：“很好，很好！”他走近堂卡埃塔诺，伸出手来。

“亲爱的警长。”堂卡埃塔诺握住他的手，向他致意。

“真不幸。”警长一边说，一边向死者走去。堂卡埃塔诺跟在他的身后。我本能地站起身来也走了过去，厨师跟着我。

警长揭开床单看了一眼，叹了口气，把床单盖上。

“这是谁？”他问堂卡埃塔诺。

“富拉斯协会主席，米凯洛齐议员……上次大选时被选为参议员，后因担任富拉斯协会主席，被免去参议员职务。是个好人，博学，热忱，忠厚……”

“那还用怀疑吗？”警长说，脸上却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

意思是说，“即使我不这么想，我能说出来吗？”

“当然啦。”堂卡埃塔诺回答道。

堂卡埃塔诺像一面镜子，警长嘲弄的表情像一束光线，一碰到镜面，立刻被反射回来。堂卡埃塔诺在回答警长时用了一种特殊的口气，似乎在说：亲爱的警长，我毫无办法，得靠您说话了。

“旅馆里的人呢？”警长问道。

厨师又用胳膊肘捅了捅我，正插在肋骨上，疼痛难忍。

“都在这儿。”堂卡埃塔诺说。“没什么可怀疑的。”

“这一地区的老百姓呢？我的意思是说，附近的农民是否与您或者与旅馆有关系……反正，我不清楚。”

“没什么人和我有关系。”堂卡埃塔诺没好气地说，“附近有些农民，但不多了。他们很会赚钱，比旅馆强得多。他们卖的鸡蛋、鸭蛋、奶酪、青菜都是从城里买来的。从这里路过的人，以为他们卖的蛋是自己的鸡下的，菜是自己种的，图新鲜，就买回家去了。”

“恐怕，偶尔这里也会有狂热的教徒……”

“您指的是我在修缮修道院的时候吧？不，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金钱能使鬼推磨，为发横财，人们可以放弃信仰，为谋求蝇头小利，可以不择手段。”

“但总该事出有因吧。就是说，我们先不谈宗教信仰，总有人开枪吧。要杀人，就得开枪，对不对？”他看看堂卡埃塔诺，又看看我和厨师，等待着回答。

“好像如此。”堂卡埃塔诺说。

“谁开的枪？”

“亲爱的警长，这大概得靠警察局来揭开这个谜了。”

“当然，当然。”警长听天由命似地叹了一口气说，“是的，

得靠警察局，当然得靠警察局……不过，凶手开枪时，警察局并不在场。”

“而我们却在这里，您想这么说，是不是？请您相信，我们同您差不多，当时我们正在诵《玫瑰经》。”

厨师又捅了我一下。

“凶手除外！”我情不自禁地说。

堂卡埃塔诺看了我一眼，像平时一样，他好像并没有看我，我的话使他诧异。也许，我的话打中了要害，也许，我的话给他带来了希望。

他问我：“您认为，是我同他们一块诵《玫瑰经》的时候，有人开枪打死了米凯洛齐议员？”说时，特意在“我”字上加重了语气。

“很遗憾，我是这么想的。”

“有什么根据？”

“有什么根据？首先，我是射手，喜欢玩手枪、步枪，我的耳朵很灵。当时，枪声显得沉闷，一点不清脆，就像有人把枪口堵在靶子上，也就是说，好像有人把枪口堵在人体上开的枪。我敢打赌，凶手一定是紧贴着被害者的身体开的枪。不信可以检查一下，在死者的衬衣上，弹孔一定是烧焦的。”

“现在不能检查，要等检察官和法医来了之后才能动手。”

“还有呢？”堂卡埃塔诺谦虚地问道。

他俨然像一个考场的总监，早已决定要刷掉所有的应试者。

“还有，不过这只是推理。我想，假如开枪的人离目标较远，譬如说，在树林的边缘，那么，他就不能只打一枪，也许得打两枪、三枪。那么多人，怎么能只打一枪？”

“假如有人在树林边缘打野兔或野羊，突然走火呢？”

“打猎？”我说，“打猎得在月光下，可今天没有月亮。再说，

打猎用猎枪，而我听到的是手枪的声音。”

“您听到的是手枪的声音？而我听到的也许是手枪，也许是猎枪，也许是香槟酒开瓶塞的声音！”堂卡埃塔诺争辩道。

“他可不是被香槟酒瓶塞打死的！”厨师说。

使我惊讶的是，厨师这种嘲笑的口吻并没引起他的任何反应。

他说着“是啊，是啊！”便消失了。

检察官到了。随后，法医也到了。看上去，检察官有些面熟，但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究竟在何时何地见过他。就好像遇上了这样一个熟人，刚认识他时，他是个胖子，而再次碰见他时，他却已经变瘦了，一时认不出来（不过，这位检察官既不瘦，也不胖）。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叫做认尸）。从他那双盯着我一动不动的眼睛，以及下意识地把手放到前额上思索的神情，我发现：他也觉得我面熟。不一会，当他听到厨师叫我的名字时，便惊叫起来，就像许多人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冥思苦索，谁也找不出答案，而他却突然想出来了一样。

“你还记得吗？在1941年……噢，也许是1942年。”

“1941年，是的……我记起来了，你是斯凯姆布里。”

“是斯卡拉姆布里。”他纠正道。

“是啊，斯卡拉姆布里……”

“已经三十年没见面了……我还以为会在别的地方见到你，能够马上认出你来。你瞧，竟在这儿碰上啦！”

“在这儿遇到我，使你感到惊奇，是不是？老实说，我也感到意外，竟在这儿碰到你……”

他亲切地挎起我的胳膊说：“告诉我，告诉我……”

我感到很不愉快。我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老同学见面，同样也避免与青年时代所爱过的女人会面。特别是在分别多年之后，

更不愿意重新见到他们。如今，我已三十年没见到过他了，何况，又是在这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老同学又肩负重任，而他又像旧友重逢那样亲切地对待我，这使我更感到不愉快。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他曾和我在一个教室里听了三个月的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他是好朋友。在中学里，我只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个与我一直有来往；另一个，自分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我们三人的学习成绩都不好，但我们读了许多与学校的课程无关的书籍。每天晚上，我们一块去看电影，相互倾吐爱情的欢乐和失恋的痛苦。我记得，斯卡拉姆布里是我们班上的高材生，但在考希腊文和拉丁文时，他拒绝让我们抄他的答案（拉丁文是我最头痛的一门课程，它使我倍受折磨）。

关于分别三十年的事，我没什么好告诉他的。我想和他谈谈这宗杀人案件，但我刚开口，他便避开了。他显得精神恍惚，心不在焉。也许，这是由于职业习惯和侦察制度的规定，所以他故作姿态；也许，半夜三更叫他来破案，又在神父和政界人物中间，因而更加需要小心谨慎地侦察、盘问、调查。这一切都使他十分烦恼（关于这方面的事，我了如指掌；他在中学时的情况，我记忆犹新）。这时，部长走到跟前，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斯卡拉姆布里认识他，他放开我的胳膊，转过身去，从此，就把我忘了。

部长彬彬有礼，我的老同学毕恭毕敬。

“检察官先生，”部长在极有礼貌地、挖空心思地向斯卡拉姆布里表示问候之后，说，“我想，您一定想听听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印象。因为，我想，无论谁，都只能说出自己的印象……可是，这里有这么多人，您瞧……请允许我提出一个要求，您能不能把审讯推迟到明天早晨随便什么您认为合适的时间？”

“当然，当然可以……”斯卡拉姆布里马上同意了。

“谢谢。”部长说。他站了一会，目不转睛地看着斯卡拉姆

布里的脸，就好像在一幅地图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熟悉的村庄似的。然后，他长吁了一口气，高声叹道：“真是糟透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斯卡拉姆布里谨慎地说，“除了警长刚才告诉我的一点情况：死者的身份，以及被枪打死……”

“死者是个讲信用的人，正直的人，善于与人共事的人。”

“是值得大家仿效的。”斯卡拉姆布里补充说。

“确实值得仿效。”部长说。似乎他不重复一下，别人就不相信斯卡拉姆布里，或者理解成为对死者的讽刺。

“正因为如此，”斯卡拉姆布里补充说，“这件事就像您刚才指出的那样，可能变得乱七八糟，毫无头绪。且不说找出作案的动机；我们怎能想象出这宗案件的作案动机呢？”

“是的，您说得对，既找不到，也想象不出……请允许我预先声明：没有任何动机！”

“动机总是有的，部长先生，总是有的。只不过是徒劳的，愚蠢的，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是难以想象的，但动机总是有的。”

“说得对，”部长说，“很对。但这种动机是愚蠢的，徒劳的……可怜的、亲爱的米凯洛齐竟然成了这种愚蠢行为的牺牲品！”当他说死者的名字时，声音都哽咽了。

“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斯卡拉姆布里说。他说这句话是为了向部长表示：同部长一样，他也感到悲痛。

“一个难能可贵的人。”部长随声附和道。部长的举动使我想起了科洛蒂童话中的猫，那只猫总是重复着狐狸的最后一句话。

“您想想，他情愿不要参议员的职务，而去担任富拉斯协会主席。”

“这是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斯卡拉姆布里说。

从他们一开始谈话，我就觉得是在看尤内斯库的喜剧。他们

演得太逼真了：犹如两个人在全神贯注地倾谈。这使我想起剧中的一个场面：一对情人坐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长凳上，紧紧地拥抱着，全然没听见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嘈杂的车马声。我小心翼翼地走开了。

当我找到厨师的时候，他还在恐慌不安。我劝他不必耽心，向他道过晚安，便回房间去了。一直到清晨三点钟，还听到嘈杂的喧嚣声，有时还掺杂着警察愤怒的喊叫声。

一觉醒来，已是早晨九点。起初，我朦朦胧胧地觉得昨晚发生的事是一场恶梦。但我很快就清醒过来，打开窗子，看见站在广场上的警察和停放在那里的蓝灰色警车。在昨晚米凯洛齐议员被枪杀的地方，警察用粉笔划了一个可怕的人形轮廓，在肺脏部位有一片暗红色的血迹。

除警察外，广场上一个客人也没有。像我一样，他们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还是继续在避静？

走出房间，走廊上一片寂静，我猛然想起，这是一座修道院。但当我走到电梯旁边时，楼下传来了嘈杂的喧哗声。

来避静的人都站在前厅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排成一个勉强可以辨认的“之”字形，宛如一条长蛇，懒洋洋地蠕动着。这情景使我想起了斯坦恩贝格^①的画。

我顺着“之”字形的人群从末尾走到前头，才弄明白，原来检察官正在堂卡埃塔诺办公室里调查案情。他要求昨晚和米凯洛齐议员站在同一行列的人先进去，可是谁也没去。检察官措词谨慎地表示了不满。人人都说他讲得有道理，愤愤不平地说：“怎么可能呢，如果可怜的米凯洛齐昨晚在某个人身旁，这人怎么能

^① 斯坦恩贝格，美国现代派画家。

记不起来呢？”就连那些昨晚确实站在米凯洛齐身边的人也这么说。或许，他们真的忘了，或许，想避开嫌疑；只有杀人犯别有企图：他这样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隐瞒。于是，检察官便按照他们姓氏字母的顺序，逐个审问，那些以字母“Z”开头的人也要在那里等着。这样下去，即使询问进行得十分顺利，也要等到夜晚才会被叫到。

在中学时，斯卡拉姆布里是我们班上数一数二的高材生，考法官时，很可能也是名列前茅，但是在侦察破案方面，却不具备山鹰一样的眼睛。他应该先从我和厨师问起，因为凶手作案时，我们俩是局外人。然后再让其他人重新排成方框形的队伍，以便帮助他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可他没这么做，而是毫不区分地把所有的人都叫到一起，于是，便把人们吓坏了。人人都想避开，谁也不愿卷进去。

我走近堂卡埃塔诺的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警察，他以为我想提前进去，便说：“请原谅，等检察官叫到您的名字时，您才能进去。”本来我不想进去，而他这么一说，我就非进去不可了。我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用斯坦恩贝格的画法画了一张草图，图上画着一群人，排成方框形的诵经，下面写上：“应当重新排成方框形。”我把它撕下来，交给警察。他说：“检察官一叫我，我就交给他。”

几分钟以后，警察被叫了进去。从堂卡埃塔诺办公室里走出来三个人：斯卡拉姆布里、警察和一个刚被询问过的人。被询问的人一出门，便像脱缰的马，转眼间便钻进同伙中间去了，仿佛为了避开斯卡拉姆布里，迅速逃到有保护色的环境中去似的。警察指着我给斯卡拉姆布里看，斯卡拉姆布里早已向我迎面走来，手里摇晃着那张草图，说：“你得给我签上名！”他这种大喊大叫的请求方式使人们目瞪口呆。由于一时摸不着头脑，人们顿时

安静下来，转过身子看着他。他们以为检察官手里拿的是一张支票，意外的是：他手里的只是一张草图。我也感到惊讶，只不过原因与别人不同，请求我签名的人太多了，我已感到厌倦。让我签名的，多半是侍者；每当我焦急地等一个迟迟不到的女人时，总是机械地、草率地在一张餐纸上或一张报纸上匆匆签上名。斯卡拉姆布里让我签名，我觉得既愚蠢而且荒谬。这使我不禁想起了毕加索的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姑娘请毕加索在刚刚送给她的一幅画上签名。毕加索回答说：“啊，不，我亲爱的，这张画分文不值，而我的名字却值一百万法郎。”我本想照毕加索的口气回答他，但我抑制住了。我说：“不，这张画分文不值，不能算是我的作品，而更像斯坦恩贝格或弗洛拉的画，以后我规规矩矩地给您画一幅。”他觉得我的话很有风趣，便说：“规规矩矩的？看来，你很善于适应环境。”又说，“你说给我画一幅，是真的？”“真的。”“今天？”“今天。”当他确信我会送给他一幅画时，便把那张草图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他问我：“你的意思是说，应当让他们重新排成方框形，就像昨天晚上诵《玫瑰经》时那样？”

“是的。”

“你说得对。一个一个地审问什么也问不出来。我已问过六、七个人了，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记不清。”他转过身去，命令站岗的警察把警长叫来。然后拍拍巴掌，让大家注意听他讲话。众人静下来了。他说：“先生们，我想，一个一个地问你们是毫无益处的。所以，我想用另一种方法来唤起某些人的记忆，同时，也可以促使另一些人进行回忆……现在，我请你们都到外面去，像昨天晚上诵圣《玫瑰经》时那样排好队。”他在《玫瑰经》前特别加了个“圣”字。他这样做是想告诉这些显贵们：我是你们的人。而在我听来，这是对《玫瑰经》和诵《玫瑰经》的人的莫

大嘲弄。

接着就是一阵骚动，还掺杂着某些人拐弯抹角的抗议声。斯卡拉姆布里装做什么也没听见，不予理睬。而警长，既然在场，就得与警察一道执行检察官的命令。他们穿梭似地来回奔走，劝说，吆喝，俨然像牧羊人豢养的狗，在主人赶羊进圈时，一会儿跑到羊群前头，一会儿跑到后头，气喘吁吁，不停地狂吠。

人们终于被赶到广场上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堂卡埃塔诺突然出现，大家都围着他，形成一个圆圈。一切都像头天晚上那样。只是当圆圈变成方框时，没有头一天那么迅速而自然。

“我想，”斯卡拉姆布里小声对我说，“你是局外人，所以你是唯一能帮助我的人。”

“不，不止我一个，还有厨师，当时他坐在我身旁。”

“叫厨师来！”斯卡拉姆布里叫道。

警察把厨师带来，他吓得汗流浹背，面无血色。我后悔不该把他牵连进来。

斯卡拉姆布里站在旅馆门口的台阶上，就像乐队指挥站在指挥台上。他指着厨师和我说：“你们俩到昨晚坐的地方去！堂卡埃塔诺，”他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说，“请您帮忙想一想，当你们排好队开始走动时，和您站在第一排的有哪些人？”

“有部长阁下，这我记得很清楚。还有可怜的米凯洛齐议员。”

“米凯洛齐当时站在第一排。起码，我们终于搞清了这一点。”斯卡拉姆布里说。“请您再想一想，站在第一排的还有谁……”他转过身来问我和厨师：“第一排有多少人？”

“七、八个。”我说。

“有七、八个。”厨师也说。

“七、八个人。”斯卡拉姆布里重复了一遍。然后央求似地

对堂卡埃塔诺和部长说：“堂卡埃塔诺，部长阁下，请你们帮帮忙，回想一下。”

“让我们大伙一块来想想吧。我站在堂卡埃塔诺右边，我的右边是……谁在我的右边？”部长问道。

“我。”有人举着手大声应道。

“好。警长，记下来，阁下的右边是德尔·波波洛教授。波波洛教授，您右边是谁？”

“我的右边……上帝，谁在我右边？”

“我。”

“记下，弗拉季帕内议员在德尔·波波洛教授右边……弗拉季帕内议员，您右边是谁？”

“我右边是洛多维西工程师。”议员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我。”工程师举着手向前迈出一步说。

“您右边呢，洛多维西工程师？”

“我右边没人啦！”他庆幸地说。

“堂卡埃塔诺的左边是不幸的米凯洛齐议员。”在说米凯洛齐的名字之前，斯卡拉姆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既表达了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表达了对死者的哀悼，“那么，当时谁在他的左边呢？”

一阵不祥的沉默笼罩着人群。不一会，一个人摇晃着一只手，用颤抖的声音说：“可能……我不知道……我似乎觉得……”

“沃尔特拉诺律师！”斯卡拉姆布里一眼便认出了他。

“是我，可是……”律师说。

“当时，您在不在米凯洛齐左边？”

“在。可是……”

“什么可是不可是？”斯卡拉姆布里突然变得严厉而且粗暴。

“没什么，是这样，似乎我有个印象……”

“什么印象？”

“我似乎觉得，他并不是一直站在我身旁。”

“怎么可能呢？”斯卡拉姆布里恶狠狠地说。

也许，沃尔特拉诺律师确实是无辜的，于是他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印象是：他并不是自始至终都站在我的身旁。”

“啊？”斯卡拉姆布里用嘲笑和怀疑的口吻“啊”了一声。

“完全可能！”我不由自主地说。

斯卡拉姆布里看了我一眼。若不是看在老同学的面，若不是我已答应送他一幅画，他肯定会赶我滚蛋。

他沉思了一会，问我：“什么完全可能？你指的是什么？”

我站起来，走到他身旁，把他拉到一边说：“我说完全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要么，沃尔特拉诺开枪打死了米凯洛齐议员，但怕别人知道他当时站在米凯洛齐左边，因而编造假话，说有人曾挤在他俩中间；要么，这位律师确实是无辜的，他讲了实话。因为凶手完全可以制造假象，当走到比较暗的地方时，便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凑到米凯洛齐身边……。你问问另一排的人，是否也有人觉得：在诵经的过程中他身边的人不见了？这样，你就能抓住凶手。”

前面我已说过，斯卡拉姆布里是个聪明的人，听完我的话，就像在中学时那样，突然大叫起来：“你喜欢读侦探小说，还是你本身就是侦探小说作家？”说时，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

我一本正经地说：“我常写侦探小说，只不过用笔名发表罢了。”我这种一本正经的态度，使他一时摸不着头脑。

“不管怎么说，这可不是小说。”说完，他又审问去了。

话虽这么说，从此以后，他便按照我设计的方案去破案了。

整个上午，斯卡拉姆布里一直在盘问：谁在谁的右边，谁在谁的左边，左右两边的人是否发生过变化？除沃尔特拉诺律师和另外四个人外，其余的人都斩钉截铁地说：站在他们旁边的人没发生变化。当然，他们不能向天发誓，因为据他们说，从旅馆门口向广场另一端走去时，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诵《玫瑰经》，谁也不能想象，当他们虔诚地朗诵着祷词并为人间的罪孽感到痛苦时（这是基督教的慈悲），有人竟然会犯下偌大的罪过。所以，当检察官要求回忆当时的细节时，他们或是隐隐约约地记起一点，或是根本就回忆不起来。至于沃尔特拉诺律师和另外四个人，由于他们都怀疑在诵《玫瑰经》时站在他们旁边的人有所变化，因而都处在一种被怀疑的地位。据说，他们只有某种短暂的、模糊的印象，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明确地说出：在诵《玫瑰经》时，究竟是谁突然出现在他们身旁。

为此，斯卡拉姆布里十分气愤。按照我的建议，他手忙脚乱地摆布了四个多小时，人们才排成方框形（实际上不是方框，而是长方形）。斯卡拉姆布里的破案工作刚刚开始，还没有任何线索，哪怕一点证据不足的线索都没有，再加上这些正人君子在部长和堂卡埃塔诺面前狐假虎威，喋喋不休地说：那时他们正在虔诚地、全神贯注地向上帝祈祷，因而不可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使斯卡拉姆布里更加愤慨。

部长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不过，他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还能勉强听从斯卡拉姆布里的摆布。堂卡埃塔诺则不然，缄口不言，无论斯卡拉姆布里施展何种手段，他拒不开口。只是在进午餐时（他坐在检察官左边，我坐在检察官右边），在检察官的再三启发下，才说了几句话，但小心谨慎地避开杀人案件。斯卡拉姆布里几次想把话题拉到这上边来，都失败了。我认为，堂卡埃塔诺是了解内情的，起码，在凶手作案时，他是目击者。

斯卡拉姆布里也有同感。吃完饭，当我们离开餐桌时，他悄悄地对我说：“如果这个婊子养的开了口的话……”说时，由于气愤，几乎喘不过气来，就像条猎犬，想吃掉猎物，又不敢下口，急得喘着粗气团团转。

警长走到斯卡拉姆布里跟前说：“检察官先生，下一步该怎么办？”

“您说该怎么办？”斯卡拉姆布里说，“留在这里，在堂卡埃塔诺旅馆里作客。在这里也许会发现点什么线索，也许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只有留在这里观察、侦查。”

“我可以讲讲我的意见吗？”他问检察官，说时用眼睛瞟了我一眼，意思是问，我在这里，他俩讲话方便不方便。

“请讲吧！”

“我想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包括堂卡埃塔诺在内。”

“您在跟谁讲话？亲爱的警长，您在跟谁讲话……”他睡眼朦胧地说。

“因为，”警长急急忙忙地说，“因为他们是一帮无赖。当你宣判他们有罪时，他们就会说：‘我干了那么多事，从来没人过问；如今，我什么也没干，你们却判我有罪。’您说是不是这样？”

“我也这么想，亲爱的警长，我认为……”说着，他那双昏昏欲睡的眼睛突然睁开了，闪出一丝微弱的光。他踉跄了两步，又说：“哎，这酒有点不对头……我想……我想去睡觉。”说完，便跌跌撞撞地走了，把我和警长留在那里。

“连他也……”警长看着斯卡拉姆布里的背影不满地嘟哝着。他想说：现在正是需要保持头脑清醒、机智、果断的时候，他却喝得酩酊大醉。“连他也”应当抓起来，或者，“连他也”玩忽职守！这样，便把问题搞复杂化了。但他猛然想起：我和斯

卡拉姆布里是要好的朋友。为了缓和一下，他改口说：“连他，我的意思是说，和我一样，连他都有点醉了。俗话说，哪里有神父，哪里就有上等的酒窖。”

“堂卡埃塔诺是个品尝家。”为激怒他，我有意地说，“是个真正的品尝家。”

“不仅对酒如此，什么事他都是专家。”

“包括犯罪在内？”

“犯罪？我不知道。老实说，那些在阴暗角落里干的勾当，他是看见了的……我敢打赌，赌什么都可以。我敢说，他知道内情，起码知道一些事情。”

“我也这么想。”

警长突然变了腔调，他用审讯的口气问我：“您很了解他？”

“我想，这里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

“这就对了。”他扫兴地说。

“堂卡埃塔诺并非等闲之辈。”

“并非等闲之辈。”

“是个可怕的人物。”

“可怕的人物。”

“绝顶聪明。”

“绝顶聪明，不错。可怕的人物，非等闲之辈……可是您知道，如果他落在我手里，如果按照我的办法连续审问他二十四小时，那时，您瞧，不仅让他如实招供，而且，如果堂卡埃塔诺还有灵魂的话，我就让他灵魂出窍……不要以为我要虐待他，或者要动肉刑……我可不这么干，我只要他放下臭架子，要他知道：他和偷鸡摸狗的小偷一样，一文不值；我要让他明白：他就像个吸毒犯，口袋里装着海洛因，被警察追得屁滚尿流……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只要他一迈进警察局的门坎，只要听到让他解下鞋带、

腰带的命令，两腿就软了，亲爱的朋友，两腿就站不住了。那副丑态，您连想都想象不出来。”

“堂卡埃塔诺也会这样？”

“当然。不只他，就连教皇、上帝也是一样……您想想看：在警察局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就像我那间那样，加达^①描写的一股不平常的、令人终生难忘的气味，直往你鼻子里钻，人们把这种气味叫做警察局味。连我也闻到了这种气味，虽然多年来我已习惯。警长坐在审判桌后面，当你走进来时，他盯着你，连动也不动，甭说是问好，连个招呼也不打。值勤班长站在一边，冷冰冰地，更确切一点说，用藐视的口气对你说：‘蒙蒂尼先生，把鞋带、腰带都解下来！’一切都完了！亲爱的朋友，一切都完了！”

“警长先生，我更愿意想象一下，如果不是教皇，而是上帝在您面前，是个什么情景。”

“请想想看，请想想看……”他微笑着走了，但立刻又返回来，不安地说，“刚才，我是出于对您的信任，在您面前发了一通牢骚。因为，我知道，您想的跟我想的完全一致。”

我也满意地笑了。我开玩笑地问他：“我们俩到底怎么想的？”

“我们都在想，应当喀嚓，”他说着，用手在空中有力地劈了一下，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说完，便笑呵呵地走了。

多年来，当人们说“喀嚓”的时候，我从来不与砍头联系在一起，这种在我心目中早已消失了的观念，却在一个警长的头脑中滋长起来，即便是随便说说，也令人难以置信。我没注意到的事太多了。在我们周围发生了许多变化，新鲜事层出不穷，而我，

① 加达，1893年生于米兰，意大利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作家。

却视而不见。不仅我是如此，那些举目可见，与我的社会条件相似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部长、议员、教授、银行家、工业巨头……人们通常称他们为领导阶层，可是实际上，他们能领导谁呢？依我看，他们像蜘蛛，只能指挥借以生存的、岌岌可危的、悬在半空中的蜘蛛网；即使网丝是金的，也不过是个蜘蛛网。

我想着蜘蛛网，想着领导阶层借以生存的金丝蜘蛛网，一阵莫名的心酸涌袭心头。是的，只要一阵微风吹来，或把树枝摇晃一下，它就被扯得粉碎（核桃树上有个蜘蛛网，就在我面前，网丝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这与我们的金丝蜘蛛网所发出的光亮迥然不同。我把连着网丝的树枝弯下，又突然放开，树枝像弓弦一样弹射出去。闪闪发光的银丝乱成一团，蜘蛛吊在半空中……它一会儿沿着蛛丝向上爬，一会儿向下坠落）！我进入树林，向林间空地走去。前几天，五个女人曾在那里晒太阳，不知为什么，今天却不见了。我继续向前走，大约走了百十米，突然发现堂卡埃塔诺坐在一块巨大的圆石上。这可能是从前磨坊或油坊用过的磨石。他直瞪瞪地看着我，但和平时一样，似乎没看见我。我朝他走去。他那种好像没看见我或者不愿看见我的姿态使我闷闷不乐。我转过身去，背着他，以发泄我的愤懑。

“是不是有人向您认罪啦，或者有人揭发了凶手？”我没好气地问。

“请坐。”堂卡埃塔诺指着石磨说。磨石很光滑，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勉强坐稳。我顺口背诵了一句话：“有权势的人永远也搞不清，谁真心爱他。”磨石凉爽、潮湿，就像出了汗似的，湿漉漉的，一不小心，我朝他滑去。

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默。从远处传来一阵阵人的喊叫、马达的轰隆和狗的吠声，树林里显得更加寂静。似乎我们在比赛：看谁沉默的时间最长。我对自己说：“对面这个村庄使我想起了童

年，也想起小时常做的游戏。这些游戏中，有几种是比赛耐力的。譬如，重复地作某种动作，看谁坚持的时间最长；大家都闭上嘴不说话，看谁憋的时间最长；大家都板着脸，看谁笑的最晚；或者都闭上眼睛，看谁最后才睁开。我对自己说：“在这场比赛中，我会输的。”果然，不一会，我便开口问他：“依您看，我的朋友斯卡拉姆布里能不能破案？”

“啊，他是您的朋友？”

“就是那么回事。高中时，我们是同学，多年不见，谁知道，他竟干起这一行来了。您看，这案子能破吗？”

“您说呢？”

“在这么一伙人中间，就是可怜的耶稣下凡，也休想破案。”

“请您不要说‘可怜的耶稣’，可怜的耶稣只有一个，就是耶稣本人……他们不是人，如果您认为他们是聚集在这里的一伙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是放在竹篮里的一堆蛇，一堆毒蛇！”

“他们在互相咬？”

“难道您没看见？”

“我没有这种眼力……不管怎么说，看在可怜的斯卡拉姆布里的面上，他们不会再咬了吧。”

“谁知道？只要从篮子里把蛇拿出来看一看，您就会知道哪条蛇伤得轻，哪条蛇伤得重。”

“我想，伤得轻的就是凶手喽。”

“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管。”

“您呢？”

“我怎么啦？”

“您就不能助斯卡拉姆布里一臂之力？”

“这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也不应该是我的事。”

“那么，还有没有正义、罪恶、赎罪……”

“您说得不对！”他斩钉截铁地说。然后，像一个算命先生那样，用一种似乎从遥远的地方发出来的声音说：“您瞧，自古以来基督徒就犯了一个大错误，认为耶稣想制止人们作恶。‘上帝不存在，所以，他什么也不允许我们做’。这句著名的格言，从古至今，谁也没想推翻它，哪怕是最微小的、最一般的尝试都未曾有过。然而，除耶稣外，谁也不会这么说：‘上帝犹在，于是乎，他什么都允许我们做’。实际上，这便是基督教教规的真正含意，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做。您想，如果没有上帝，哪里还有什么犯罪、痛苦和死亡呢？”

“这就是说，邪恶胜利了，邪恶战胜了正义。”

“不是，不是邪恶胜利了。说这话是要杀头的……也许，我的意思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知道，您不懂什么叫做心领神会。那么，让我举个例子，看看古人在受到指控时，是怎样为自己辩护的。譬如泰尔图利安诺^①。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舆论一致谴责基督教徒是寄生虫，不劳而食，对社会有害无益。为此，他竭力为基督教辩护。可是结果怎样呢？徒劳无功。于是他说：‘好吧，我们也建立一个贸易中心，做生意，开澡堂，开商店，办旅馆，你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样，我们就能与你们世世代代共存下去……’说得何等好啊！不过，我们的世界，我们所说的‘世世代代’和你们的大不相同。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 and 周围的一切，都处在无底的深渊的边沿……无底的深渊，阴森可怕，使人不寒而栗！所以，你们惧怕我们是有道理的。泰尔图利安诺请求你们不要怕，想让你们放心，在这一点上，他是错误的。但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即在某种程度上，你们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但上帝会宽恕我们。”

① 泰尔图利安诺(160—250)，基督教辩护士，拉丁文作家。

“您说的‘你们’，是指谁？”

“就是那些受政治和贸易主宰的生活在世俗世界里的人。其实，你们的政治和贸易中心也是由上帝主宰的，只是你们不叫它上帝，而叫它别的名字而已。”

“我想跟您谈谈……在旅馆，在您的客人中间发生的那宗杀人案件。一个客人被杀，而凶手，很可能逃之夭夭，不受任何惩罚……对您来说，似乎无所谓，您说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不过，现在我很痛苦。”

“痛苦，为什么？”

“因为在我身上还有没被掩盖起来的一面，即袒露的一面，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叫做‘软弱’的一面。”

“假如我没理解错的话，对您来说，这并不是值得赞扬的一面。”

“您瞧，您又在说一些有区分褒贬意义的话。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叫错？什么叫对？什么叫白？什么叫黑？实际上，一切都是偶然的，就好像在梦中……”

他说的“在梦中”十分灵验，似乎林中的林木、空气，包括我在内，都是在梦境之中。

我坐在石磨上，突然麻木了，而我，还以为因困倦而睡着了，甚至还以为睡了不小一会呢。

我站起来，向旅馆走去。还未走到旅馆，就听到刺耳的尖叫声和一片混乱的脚步声。我立刻意识到：又出事了。

事情是这样的：人们都说沃尔特拉诺律师从窗口里摔下来了。他的房间在八层，他掉在一堆砖瓦上。他的窗子在大楼背面，厨房也设在背面。厨师躺在椅子上打盹，一件沉重的东西落在砖瓦上发出的巨大响声把他惊醒。起初，他仍然躺在那里，看不清

楚，后来，上面的砖瓦仍不停地向下滑，于是他站起来，猛然发现一个人面朝下趴在那里，穿着睡衣，艰难地挣扎着。厨师吓得魂不附体，失声大叫。凄厉的喊叫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连住在旅馆大楼另一边的人也听到了。酒后酣睡的斯卡拉姆布里也被吵醒，他发狂似的大喊大叫起来。

厨师的脸惨白得像一张纸，下巴不停地打颤。助手和厨房里的勤杂工迅速跑出来，围拢着他。一个助手端来一杯酒，厨师用两只颤抖的手费力地捧着酒杯，饮了一口，立刻还给了他。由于不停的颤动，他已无力用一只手端住酒杯。警长看见了，声嘶力竭地叫道：“你们是不是想把他灌醉？我需要他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时，厨师正在叽里咕噜地骂娘，骂天，骂地，骂圣母，骂他知道的一切圣灵。“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为什么要有清醒的头脑？这与我有啥关系？我知道什么？我在睡觉，被吵醒了，起来一看，这家伙身穿睡衣在砖堆里乱动，就像一条被砸烂了脑袋的蜥蜴在拼命地挣扎。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说完，又想伸手拿酒杯，但像触电一样，马上又缩回手来，嘴里不停地骂着上帝：“我连口酒都不能喝了！我……”

留长发的神父凑近我说：“他已神志不清。这可怜虫，我从未听说过他亵渎圣灵。”他是在为厨师和旅馆辩解。过了一会，他问我：“您认识不幸的沃尔特拉诺律师吗？”

“不认识。”

“他是个聪明、机智、有才华的人。无论在教会，在法院，还是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上，都表现了他的才干。最近几年，他一直在搞政治，很少出头露面，但人们知道他才气非凡，所以享有很高的威望。每年到这儿来，他总是说：‘请给我一个房间，我要住在最高一层。’我们总是满足他的要求。真可惜……”

“今年也是如此？”我进一步问道。

“是的，今年也是如此。”说完，他打了一个冷战。

“您不必为这件事后悔。即使他住在六层七层，同样会摔下来的，就是住在第一层，也逃脱不了。只不过，不会被人从窗口扔下来，而是采用另一种方式罢了。”

“您认为他是被人害死的？”

“难道您认为不是？”

“我的天哪，又是一个！”

“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

“这是犯罪！”

“正因为是犯罪，所以没法制止。”

“您看，还会有人被杀吗？”

“不。现在可能要收场了。我说没法制止，是因为凶手第一次作案时有破绽，事后出现了一些不利的情况，因而他必须第二次作案，杀人灭口，所以我说还会有人被杀。这次作案，凶手可能以为再无后顾之忧，可以逃之夭夭了。可是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无论你作得怎么巧妙，也不会天衣无缝，意外的事也可以使你周密思考的计划毁于一旦……这第二宗杀人案件不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吗？如果今天早上沃尔特拉诺律师没有表示任何怀疑，如果他没有说：在诵《玫瑰经》时米凯洛齐议员似乎并没有一直在他身边，那么现在他还可能活着。”

“您的意思是说，他被杀，是因为早上说了那些话？”

“或许是为了那些还没说出来的话。”

我们交谈的时候，警长正聚精会神地在思考一个问题：从沃尔特拉诺律师的窗户到这堆砖瓦之间起码有十来米远，他怎么能从窗口掉到砖瓦上呢（一个警察站在沃尔特拉诺的窗口，正在用一根线系着一块石子，放了下来）？也可能，这位警长的耳朵特别灵，我的话，他全听到了，便大声地对我说：“您说得完全对，

恰恰是为了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他是从平台上摔下来的！您瞧，根本不是从窗口里摔下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神父问我。

“亲爱的朋友，他是说，沃尔特拉诺律师是自己到平台上去的，因为他要和杀他的凶手会面。”

“警长，无论您有什么判断，都不要大叫大嚷，您我知道就行了！”斯卡拉姆布里十分严厉地说。

“请原谅，检察官先生。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当您的老朋友在叙述他的意见的时候，我，经过自己的调查，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现在我正在核实。物理学可不是判断，您瞧！”他用手指着窗口，警察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根长线，线下面系着石子，在离地面一米高的地方摆动着，离砖瓦堆还远着呢。”

“朋友，您还不知道，他常写侦探小说。”斯卡拉姆布里心平气和地、诙谐地对他说，“他不仅是驰名南北的画家……啊，可是画呢？你画的画呢？荷拉斯说过（用拉丁文）：‘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也许，这句话是特里鲁萨^①夸荷拉斯的话，说他作诗严肃、认真，讲信用？”

“不记得了，你知道，我的拉丁文……”

“我喜欢拉丁文，非常喜欢。”他说着，叹了一口气。他正在研究凯撒和卢克莱修斯，不幸的是，这两宗棘手的案件使他不得不终止研究工作。何况，罪犯又是在这群有权有势、狐疑而狡诈的显贵中间，所以他感慨万分。

“画呢？”他问道。

“今晚明晨我就给你，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你我谁也别想离开这儿。”

^① 特里鲁萨(1871—1950)，意大利诗人，以十四行诗著名。

“我们好像同处在一条搁浅的船上。”

“检察官先生，”警长打断了我们的话，“您能不能到平台上来？也许，在这里会发现点线索。”

“就来，就来！”斯卡拉姆布里应道。

出乎意料的是，他大发善心，对我说：“你也来！”他的这一行动使我受宠若惊。

电梯一直升到八层。爬上狭窄而陡峭的阶梯，我们登上了一个宽阔的平台。平台上铺着瓷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刺得我们睁不开眼。

栏杆近处有点滴血迹，沃尔特拉诺正是从这里摔下去的。

“好极啦！”警长搓着手，洋洋得意地说。“现在，我们该找凶器了。”他向四周扫了一眼，说，“就是那个婊子养的杀死沃尔特拉诺的凶器。”

“我想，”我胆怯地说，“凶手打伤了律师之后，可能把凶器扔下去了；他一发现律师被打昏，就把它扔了，不可能一手拿着凶器，另一手把他推下去。”

“也可能搁在一边。他怕律师醒过来；要是醒过来，好再给他一下。”警长反驳说。

“对。不过，是先扔掉凶器，后把律师推下去呢，还是先推下律师，后把凶器扔掉？”斯卡拉姆布里说。

“不管怎么说，您的意思是：凶手已经把凶器扔下去了……是啊，总不会把凶器带回房间去吧。”警长沉思了一会，又说，“我下去找找看。”

“请到离律师远一点的地方找去！”我十分自信地大声喊道。

我和斯卡拉姆布里站在平台上。似火的骄阳照射着大地，如果不是阵阵微风，定会晒得人头昏目眩。一个警察一动不动地站在楼梯旁，活像一头酣睡的骡子。我和斯卡拉姆布里从平台向下

张望，盼望着警长早点出现。斯卡拉姆布里用信任而和蔼的口气对我说：“这第二宗案件，对我来说，究竟凶手是用砖头还是用花瓶打伤沃尔特拉诺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沃尔特拉诺为什么被杀。这我清楚，他被杀，是因为他知道谁杀死了米凯洛齐，他想敲诈凶手。”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已经确认：凶手和沃尔特拉诺曾在平台上会面。假使凶手在律师房间里袭击了他，又把他从窗口里扔下去，你就不会作出这种判断了。”

“是的，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决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从今天早上起我就怀疑，律师知道的东西要比他讲的多得多。他不愿意说出来，是因为要向凶手敲诈。”

“相反，今天早上我却认为，他说的全是实话，他所知道的全讲出来了，其余的，他是记不清了。”

“你认为他糊涂了，再也回忆不起来了，再也讲不出什么来了……他是个骗子，连午饭时吃的什么菜，火车几点钟开这样一些最简单的事都不照实说，历来如此。他的那些话是讲给你听的，不是讲给我听的。此人是伪君子，善于弄虚作假。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吗？很可能，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那个莫名其妙的印象，是我让他们排成方框时临时编造出来的……刚才我对你说过，今天早上我还怀疑过：也许他了解点内情。我错了，他什么也不知道。当他意识到昨晚站在米凯洛齐左边时，便觉得有机可乘。他估计，如果他声称有人曾经钻到他和米凯洛齐中间，说他有这么个印象，凶手作贼心虚，就会千方百计堵住他的嘴，不惜任何代价，或者给他钱，或者给他别的好处。这是他的惯用手法……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轻而易举地杀死米凯洛齐的凶手，由于害怕败露，在惊恐之余又杀死了他。”

“似乎你很了解他。”

“是的，我非常了解他。他一个人给我带来的麻烦，比这伙人给我带来的麻烦加在一起还要多。他是个刁滑、狡诈、诡计多端的家伙，是个老狐狸。可最后，还是碰上了狼，让狼给吃了。”

“那就是说，今天早上他说那些话的时候，他是盲目地放下了鱼钩，可不知道上钩的是条什么样的鱼？”

“现在，我几乎是肯定无疑了。”

“可是在早上，你曾经认为他知道谁会上钩的……或者，不管他知道不知道谁会上钩，他总能跟踪他，寸步不离地监视着他……”

“警长是个白痴！我对他说过，我根本不相信沃尔特拉诺的话。在偶然的情况下，第二宗案件也许能帮我们找到凶手，但是破这两宗案件的关键在于第一宗案件。第二宗案件的作案动机很清楚，就是敲诈勒索。但是，一旦找出第一宗案件的作案动机，凶手就等于掌握在我们手里了……问题在于，促使这些人犯罪的原因太多了，有成千上万，而且，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又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如果不让他们在我们眼皮底下互相残杀，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么说，事情就难办了。”

“我没这么说……要知道，米凯洛齐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也是个盗窃犯，法官对他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不法行为一清二楚。如果在过去，我早在报纸上发表一千篇文章揭露他贪污、盗窃、侵吞公款的罪行了。但目前，社会舆论一般都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因为他盗窃的公款很少落入自己的腰包，也许，他分文未取。别人都有漂亮的住宅、别墅、现代化的农场，在大、中、小工厂里都有股份，多年来，一直把钱存入瑞士的银行，甚至有人存款已达几亿、几十亿里拉。而米凯洛齐，既无自己的住宅，又无一寸土地，就像个隐居的传教士或修女那样过着简朴的生

活。有人说，他还用自己的工资施舍穷人呢……至于他在什么地方找到的穷人，我就不清楚了。总之，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谁也不能利用他的贪污、盗窃敲诈勒索，因为所有的人，我说的是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都从他的犯罪中得到了好处。如果受贿者不想毁掉自己，就休想击败行贿者。”

“那就是说，谁也拿他没办法？”

“不。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如果某个权威人士出面的话……譬如说，堂卡埃塔诺。这些人都是受他控制和操纵的，就像他手中的木偶。假如堂卡埃塔诺指使米凯洛齐做一件有利于某人的事，比方说，就是这个不得不杀死两个人的凶手，或者不让他这么做……所以我说，不能指望堂卡埃塔诺……谁敢担保，在做这样一件残忍的、非同小可而又冒着生命危险的事情之前，凶手没有得到堂卡埃塔诺的指示？一句话，堂卡埃塔诺是最大的知情人。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

“你想就此罢休吗？”

“是啊，我知道很困难，但我应该再试一试。”

楼下的喊叫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警长发现了凶器！他手里摇晃着一块白色的餐巾，餐巾里包着一块粉红色的、像花瓣似的東西。

斯卡拉姆布里徒劳地盘问了近三个小时，一无所获；他已经疲惫不堪，束手无策。堂卡埃塔诺只字不提私下与我谈的事，回避斯卡拉姆布里提出来的每一个问题；要不，就用基督教的教义把话岔开。事后，斯卡拉姆布里对我说：“真是个好种！就像个毒气桶。我跟他谈话时，他不停地放毒，差点把我熏死……伪君子，罪犯……”然而他已精疲力竭，连发脾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在去餐厅之前，警长向他报告了一件新闻，他才振作起来。

警长说，在米凯洛齐被杀之前，有五个女人曾经住在旅馆里，米凯洛齐一死，她们就无影无踪了。

“怎么现在才告诉我？”斯卡拉姆布里不满地责备道。

“我刚知道，就向您报告了。”

“您早就应当知道。一到这里，就应当知道！”斯卡拉姆布里声色俱厉地说。

警长把双手一摊，脑袋向左一歪，摆出一副耶稣受难的苦相。

“这无关紧要。”我为警长解围说，“我认为，那几个女人与案情无关，如果她们走了，是打发走的，是怕我们看见。这只能说明堂卡埃塔诺怕丢丑，怕给教会丢丑，怕出像薄迦丘在《十日谈》里所描写的那种丑事。”

“一点不错。”斯卡拉姆布里带着强烈的报复心恶狠狠地说。

很明显，斯卡拉姆布里想利用这件事迫使堂卡埃塔诺吐出真情；也许，只是为了报复一下。他无法抑制这种兴奋的心情，在吃饭时透露了出来。堂卡埃塔诺是只老狐狸，一察觉斯卡拉姆布里已经知道此事，并想以此要挟他，便采取了应变的措施，摆出一副时刻准备应战的架势。

为了装出自好奇心，或者偶然想起来似的，斯卡拉姆布里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里是一家旅馆，还是某种特殊的修道院，或者……什么庇护所？”

“是旅馆。但是每年，在一定的时期，它就变成……正像您所说的，‘某种特殊的修道院’。”

“那么请问，你们是否按照管理旅馆的方式来管理它呢？”

“您说的‘管理旅馆的方式’是什么意思？”堂卡埃塔诺谨慎而有所戒备地问道。

“我是说，你们是否和其他非宗教团体所经营的旅馆那样，遵守法律所规定的条例和警察局所制定的规章制度？”

“无可奉告。”堂卡埃塔诺回答说。

“我想，总有人知道吧。”

“当然。”说着，堂卡埃塔诺拿起桌上的铃，摇了摇，摇完铃，又高声叫道：“奇莱斯特里神父！”

坐在那里吃饭的神父立刻站了起来。

“请坐，请坐下。”堂卡埃塔诺说，“请告诉检察官先生，我们旅馆接待过的客人是否都登记了？您能不能复制一份登记表送给警察局？”然后，转向斯卡拉姆布里低声地问道，“您是想知道这个吧？”

“都登记了。”奇莱斯特里神父说。

“谢谢。”堂卡埃塔诺说。然后又探身向斯卡拉姆布里说：“登记了。不过，我怀疑奇莱斯特里神父讲的是否实话。”

“为什么？”斯卡拉姆布里问道。

“为什么？”部长说，“因为，检察官先生，这个‘特殊的修道院’，就是您刚才起的极为恰当的名字，里面只有我们这些人。”

“特殊的修道院，但它不是修道院！”

“表面上不是，实际上是。每年我们都到这里来静思、祈祷。每年要有三、四轮哪……”部长说这些话时，两宗杀人案件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他把它忘得精光。此时此刻，有谁会提醒他呢？

警长挺直腰板，用眼睛扫了一圈。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话：有的胆小怕事，有的畏缩不前。于是他挺身而出，说：

“两宗杀人案件，阁下，两宗！”（后来，他对我说：“我豁出去了！反正两个月以后我就退休了。”）

部长气得满脸通红，但他还是抑制住自己，说：“您，警长先生，您可以保留您的意见，但您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线索可以驳倒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是：在这个餐厅里，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谁也没有犯罪！”

“您指的是在座的人中间？”斯卡拉姆布里插嘴说。

“一点不错。我指的是在座的人中间。”

“啊，在座的人中间。”斯卡拉姆布里故意重复了一遍。

“在座的人中间。”部长又重复了一遍。但是他有点犹豫，怕中了圈套，于是转向堂卡埃塔诺问道：“是不是有人不在这儿？”

“没有。”堂卡埃塔诺怒气冲冲地、斩钉截铁地说。他两眼直瞪瞪地、像照相机的镜头似地死盯着斯卡拉姆布里，镜头的焦距越变越小，他的目光越来越锐利，同时，他的右手张开又合上，活像一只猫，露出利爪又缩回去。

部长继续说：“正因为我们的人都在，我敢肯定，甚至敢签字画押：我们中间没有杀人犯！”

自从堂卡埃塔诺让奇莱斯特里神父回答问题以来，餐厅里的人都在静静地听斯卡拉姆布里和堂卡埃塔诺以及部长的对话。由于部长说话时嗓门提高了，便引起了一阵喝采。部长刚说完，便是一片“说得对！”“完全正确！”“讲得好！”的欢呼声，接着就是长时间的疯狂的掌声。

掌声一停息，部长便说：“我高兴地看到，你们的意见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左转九十度，向右转九十度，表示谢意。

“难道您认为有人会持不同的意见？”堂卡埃塔诺嘲笑般的问话，对部长来说，简直是劈头浇来一桶冷水。部长气得喘不过气来，打着手势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这时，堂卡埃塔诺话锋一转，又回到他和斯卡拉姆布里所谈的话题上来。他说：“是的，我担心奇莱斯特里神父从未向警察局呈报过顾客住宿登记表。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吗？”

“对无论哪家旅馆的管理人员来说，这都是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

“您的意思是说，我不算是旅馆的管理人员了？对此，我表示感谢。”

“这是阁下讲的。”斯卡拉姆布里指着部长说。

“是我说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不了解情况。尤其是，我不想干预别人的事……再说，我既不是内政部长，也不是司法部长，值得庆幸的是，我是另外一个部的部长。”

“反正他不想保护我们。”堂卡埃塔诺说，“最好，先不谈我们违法，或者我本人违法的事。现在，我渴望告诉您……就像在一个充满乐观气氛的宴会上那样，用亲切、真挚的态度禀告您；当您突然向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时，我在想些什么。我想，您会允许的。当时，我在想现存的、该死的法律程序……当某人被传讯出庭的时候……这种世世代代因袭下来的荣誉与我们的时代是不相称的。因为法律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自古以来都是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的，虽然它很繁琐，拖延的时间又很长，加上手法比较巧妙，把气氛冲淡了些，但它仍然是突然袭击……好吧，我把话题转回来。当您问我：‘这里是一家旅馆，还是某种特殊的修道院’时（我认为，把话改为：‘这里是一家旅馆，还是某种宗教团体’更为恰当），我马上想到……”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为的是要得到斯卡拉姆布里的允许再讲下去。这是一种何等谦虚又友好的姿态啊！

“请说下去。”斯卡拉姆布里不安地说。

“当时我想：我们同坐在一张餐桌前，分享同一块面包，共

饮同一瓶酒，然而，您不会忘记，您是审判官，是法官；我也不会忘记，我是神父。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多么可怕的使命！一方面，这使命是可怕的；另一方面，又必须这么做。正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是可怕的；正因为它是可怕的，所以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是正在埋葬一堆死尸的行尸走肉……上帝啊！”他两手抱着头，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蒙住眼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看见自己所肩负的可怕的使命。

他这一席话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应当承认，我的心也被打动了。只有警长无动于衷，他看看堂卡埃塔诺，又看看我们，觉得愚蠢而可笑。

堂卡埃塔诺抬起头来，两手摊开，宛如复活的耶稣。他又说：“当神父是可怕的，然而，法官更可怕。耶稣的话是无情的：‘尔在受审判前，先勿审判他人！’当然，他没有禁止人们去审判别人，然而，他把审判和被审判直接地理所当然地联系在一起了。还有句格言：‘先拔出你眼中的木桩，才能为你的兄弟拔出眼中的木屑。’很明显，审判者眼中有根粗大的木桩，而被审判者，眼中却只有一些木屑。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最坏的坏蛋才审判别人。由于自己的罪过，他们错选了这个职业。他们可以审判别人，但是，是否应在先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并得到人们的宽恕之后才能审判别人呢？”斯卡拉姆布里皱起眉头听着，心突突地跳。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堂卡埃塔诺如同猫玩弄耗子似地又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了。他说：“自从我读了——也许是听说的——‘拔出你眼中的木桩’之后，我总想起‘无人’刺瞎波吕裴摩斯^①的故事。从波吕裴

① 《俄底修斯的故事》中一个野蛮、凶恶的独眼巨人，在吞食俄底修斯几个同伴之后，被俄底修斯设计用美酒灌醉，然后用一根烧着了的、粗大的木桩刺瞎了眼睛。波吕裴摩斯曾问俄底修斯叫什么名字，俄底修斯回答说：“叫无人。”于是，波吕裴摩斯被刺瞎之后，大声呼救说：“‘无人’刺了我了！”“‘无人’欺骗我了！”

摩斯眼中拔出了一根正在冒烟的木桩……谁知道，耶稣是否也从游吟诗人口中或商人口中听到过‘无人’的故事？您想想，关于耶稣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多么少啊！就像我们一样，我当过司铎，您在司法部门工作，警长在警察局工作，这位教授，”他指着我说，曾在某一个时期举办过他的第一次画展，等等。可是，有多少人了解我们的过去？有几个见证人？我们的生命之所以还有点价值，就是因为我是神父，您是检察官，警长是警长，这位教授是画家。可是我们的幼年、童年、青少年，小时住过的地方，童年的伙伴和朋友，这些都有价值吗？还有，我们读过的书，经历的爱情，蒙受的欺骗，这一切，对我们的一生也都是有价值的吗？当然，也可以不管我们的童年时代，但是，从一岁到十岁这个阶段，对人的一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不了解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可以说，你对他就一无所知……当然，我们不能跟耶稣相比，对他来说，只要知道他生活中最光辉的年代、有记载的年代就够了。可是，我总是对他那些还没搞清楚的历史感到兴趣，那些没搞清楚的年代使我产生种种幻想。”说着，他探身向斯卡拉姆布里问道：“您的幼年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幸福的，还是痛苦的？我希望你的幼年痛苦的。因为幸福的幼年会给人的一生播下寂寞和忧愁的种子，会给人带来恶习……”说到这里，他仿佛责备自己似地说，“您不要以为我在向您提问题，也不必回答我。这是我的怪癖。当我对一个人感到兴趣的时候，总想了解他的幼年……此时此地，我不应当向您提问题，而应当您向我提问题。我说什么来着？”说到这里他又停住了，仿佛等着我们提示，似乎我们是他的理所当然的提词者。实际上，他根本不需要提示，他应谈什么，他心里很清楚。果然如此。他接着说：“刚才我说的是审判和审问问题。大概耶稣认为，只有最坏的人才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最劣等的人担任最重要的工作……”

可您千万不要误会，好像我是在影射什么人。关于您的事，我一点不知道！”说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斯卡拉姆布里，似乎斯卡拉姆布里的一切，他早已了如指掌。“另一方面，”他说，“我所用的贬义词和褒义词的含意都是《福音》中的意思，也就是说，最坏的人将变成最好的人，最好的人将变成最坏的人。”他轻轻地把手放在斯卡拉姆布里手上，脸上闪烁着慈祥而亲切的光辉。又说：“您的事，我一点不知道。”并特别在“一点”两字上加重了语气，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什么都知道。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喜欢您。”

斯卡拉姆布里离开餐桌时，摇摇晃晃，头重脚轻，站也站不稳，与开始向堂卡埃塔诺提出问题相比，前后判若两人。我搀着他，还觉得有点费力。警长凑到跟前，提醒他说：“检察官先生，那五个女人的事，是不是该办了？”斯卡拉姆布里怒气冲冲地说：“什么叫‘该办了’？难道您不知道，即便她们在这里住过，与这两宗案件也没什么关系。如果追踪她们，就会失掉线索。”他的声音太大了，餐厅里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他根本没发现，这些人都在竖着耳朵听他们的谈话呢。

“什么线索？”警长装出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问道。他觉得好笑。

“线索？就是……”斯卡拉姆布里低声地杂乱无章地说，“关于金钱，利益，干的坏事，敲诈勒索……这就是唯一的线索。”

“可是，我们还没掌握这方面的线索。”警长说。

“没掌握？好……”斯卡拉姆布里的声音病态似地颤抖着，“好，我们没掌握，但我们应想法找到它，抓住他……我已经布置好了，我对各地的同事讲过，他们正在调查。我没睡好觉，我……”说着，便拖着我向外走，把警长一人留在那里。我扭过头

去看看警长，他正站在那里冷笑。他向我眨眨眼睛，仿佛在说：您这位朋友可不怎么样啊！这时，斯卡拉姆布里又对我说：“警长这个蠢货，他想让那几个女人牵着我的鼻子走。鬼知道，她们是否真来过这儿？”

“来过。”

“啊，真的？不管怎么说，她们与案情无关……这两宗案件，我已胸有成竹，关于这一点，今天早上在平台上我好像对你讲过。所以我必须去掉假相，研究真相，把有可能引导我们走上歧途，或产生混乱的线索排除掉……警长这个家伙，鬼知道，也许他出于好心，可他是个白痴；也许，他对她们感兴趣，是个堕落的蠢货。他想让我拜倒在这几个女人脚下，让我跌跤子，我可不上他的当……得搞个水落石出，把凶手挖出来。”

为照顾他的面子，我没有说，在吃饭之前，正是他，而不是警长，认为五个女人的出现和失踪，对破案工作极其重要。

“依我看，虽然你没点出那五个女人的事，可是堂卡埃塔诺却大为震惊。你想，如果报纸上刊登出这样的消息：五个大人物在避静时带着情妇寻欢作乐，那将会轰动整个意大利。”

“要报道的不止一家报纸，不止一家！这些，暂且不去管他……你认为会轰动整个意大利吗？不，没有几个人会愤愤不平，多数人觉得好玩。也许，这五个女人当中，有人被特邀去演电影，说不定，片名就叫《避静》。在银幕上，她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上百个伪君子围着她转……而我呢？我的命运如何？会把我叫回去，我的顶头上司接过案子，而我则被调到外地，名义上给我晋升，实际上来个明升暗降。于是这两宗案件被搁在一边，成为‘无头案’。你说这值得吗？”

“这么说，你是指望着破案啦，你能找到凶手？”

“我想，会破案，会的。”他敷衍地说。

不一会，他好奇而又心怀鬼胎地问我：“那几个女人长得如何？年轻？漂亮？谁带她们来的？”

“相貌还可以，还算年轻。长得嘛，比较丰满，不太秀气，有点粗犷。反正，男人看到了，会喜欢她们的。世界上有两种女人：一种适合作妻室，娶她之后，可以生儿育女；另一种，则只可满足某种欲望。这几个女人，我一眼就看出来，属于第二种……至于谁带她们来的，我不清楚。”

“我想知道，起码我想知道这一点。”

“这对你有用处？”我用双关语气问他。

“不是有用处，我想了解一下。要不，我问问堂卡埃塔诺，或是一个一个地审问。”

“你不开口，堂卡埃塔诺会告诉你吗？”

“可不是么！”斯卡拉姆布里说。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走了。他找堂卡埃塔诺去了。

部长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便凑到我跟前，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这样，不一会，我的肩膀就挨了两次拍。他说了一声：“亲爱的朋友！”似乎在跟我打招呼，可看看他那副哭丧的脸，又在不停地、失望地摇着头，仿佛想对我说：这里就我们两人，我们的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跟案情无关，一样的清白无辜，然而，我们都被卷进来了，都得与罪犯、法官、警察打交道。按照他的逻辑，艺术是虚构的、超现实的。正是由于它这种超现实的特点，演员也变得洁白无瑕，于是他的这种笨拙的表演，也使他变成一个按基督教精神生活的人了。只有他的基督精神与众不同，因为他有特权。

我说出了他想说又没说出的话：“可怕啊！当我踏上通向修道院的道路时，就预见到，我堕入了可怕的魔窟。”

“您在说些什么？我每年都到这里来，我把这个地方当作休

养圣地，当作避开‘俗务’，铸炼灵魂的地方，我怎么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两宗杀人案件！我最亲密的两个朋友接连被杀，我们这些人都受了牵连。法官、记者和社会舆论都在怀疑我们……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们被牵连进去了，被怀疑定了。吃饭的时候，您没听见警长的话？就算这是他的职业偏见吧，可是，我的上帝，总得有点证据，总得有点……那怕是蛛丝马迹，才能这么说啊。他们不是根据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根据我们的社会地位来断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么，为什么对我们就不平等？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一下，我们出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才到这儿来的。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避静、祈祷……”最后，他说出了真正的用意：“我希望，您的朋友，即检察官，不要像警长那样钻牛角尖，带着偏见看问题。现在确实存在着偏见，思维方面的偏见，道德方面的偏见。”

“他是个不露声色的人。”

“什么？您说什么？”

“我是说，我的朋友，检察官是个不露声色的人。他对案情分析和判断都是准确无误的；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经过周密思考的。每当我问起案情时，他总是胸有成竹，对案情的发展有预见性，简直是个预言家！”

“所有的司法官都是预言家，都能未卜先知……不过，请您相信，他们永远也成不了预言家，因为，即便调查清楚了，他们也不会讲出来。他们都是些江湖骗子！”

“不过，也许斯卡拉姆布里已经掌握了案情，或许，已经找到了线索。”

“您相信？”他讥诮地问道。

“是的，我相信他掌握了案情，起码，有了一点线索。”

“案情，线索……”部长喃喃地说，脸上那种讥诮的表情顿

时消失了，“怎么能掌握了线索？怎么能……”

我又说：“我不认识死者，不了解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所作所为，更不知道他们的阴谋诡计，所以，我无法理解斯卡拉姆布里的预言。”

“那么，请举个例子让我听听。”他急不可耐地问道，希望能从我嘴里掏出点什么来。

“刚才我们在议论这两宗案件时他还说：‘任何人，如果只行其善，而不会作恶，是得不到人们的夸奖的’。”

“‘任何人，如果只行其善，而不会作恶，是得不到人们的夸奖的’。这是他的原话？”

“是的，是原话。”然后我又背诵了一个伦理学家的话：“慈善，乃是人的意志的脆弱和怠惰的表现。”

“这很像是巧克力糖中夹着的格言^①。‘任何人，如果只行其善，而不会作恶，是得不到人们的夸奖的’……我认为，这句格言十分荒谬，作恶者，恶人也。”于是，他劈头盖脑地批判了弗朗苏阿·德·拉·罗舍夫柯尔德^②之后，便把这句话与使他坐卧不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煞费苦心地猜测着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许他在影射米凯洛齐这个可怜虫；他当然是个善人……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他被杀，决不是因为行善。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人，我也这么说，我们差不多是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了。他为什么被杀？因为有人觉得，他活着，就是对别人的威胁，没有别的解释。”

“就是说，您也不相信，他被杀是出于偶然？”

“出于偶然？第二个又接着被杀，谁还相信这是出于偶然？”

“可是您却认为，你们当中谁也没有犯罪……”

① 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习惯：糖果里常常带有小纸片，上面写着祝福的话和格言。

② 罗舍夫柯尔德，德国作家，著有《格言》等书。文中两句格言即他的作品。

“不光是我们在这里，朋友，依我看，除我们之外，还有不下二三十个人每天在旅馆里出出进进。再说，那些人平时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你连看都看不见。”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厨师吓得魂不附体，是完全有道理的。

“可是，旅馆里的侍者，厨房里的伙伙，还有那些端菜的姑娘，他们为什么要杀死米凯洛齐？在杀死米凯洛齐后，又有什么理由再杀死沃尔特拉诺？”

“亲爱的朋友，难道您没听说过雇佣刺客的事？事情往往要比我们想象的简单得多。”他说着，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次，大概是出于怜悯心，然后转身向自己的同伙走去。同伙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正在议论着什么。部长急着要告诉他们罗舍夫柯尔德的格言。他还以为这是斯卡拉姆布里的话，其实那是我的话，我想逗逗他，故意说是斯卡拉姆布里的“格言”。

当我迈进旅馆大楼时，斯卡拉姆布里正从堂卡埃塔诺的办公室里出来。他洋洋得意，忘乎所以，从我身边走过，都没看见我。显然，堂卡埃塔诺对他讲了些什么。我也朝堂卡埃塔诺的办公室走去，敲敲门，把门推开。

堂卡埃塔诺坐在写字台前，埋头读着什么，抬起头来说了一声“请进”！一副无腿眼镜架在鼻子上，他从眼镜上面睁大眼睛盯着我。这一次，他的眼光不像往常那样冷漠、无情了。五颜六色的灯光给办公室带来一种奇特的气氛。写字台上摆着一个球形玻璃罩台灯，这种台灯原是从南希和维也纳进口的，后来，各地争相仿造，而质量却比原来粗糙得多了。灯罩上有几条彩带：蓝的、黄的、天蓝色的、藕荷色的，其中藕荷色的最多。五颜六色的光彩投到堂卡埃塔诺的眼镜片上，显得光怪陆离，富有生气，而堂卡埃塔诺的眼光，在它的衬托下，显得暗淡无神。

读者们，当你们读到这里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提出一个问

题：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详细描写堂卡埃塔诺的那副眼镜？是因为我第一次看见堂卡埃塔诺从口袋里拿出它来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是因为第一次见到它时印象不深，而到后来，当我回想起来或再次看见它时印象逐步加深？都不是。一见到那副眼镜，便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惊讶的是，它使我不得安宁，以致刚从小教堂回到房间，我就在纸上画了起来。一副、两副、三副……画出了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眼镜，就像瓜地里长的瓜，有大有小，参差不齐，品种俱全：有的只画出个轮廓，有的带镜片，有的不带镜片，有的在镜片后面还画上了堂卡埃塔诺那双暗淡无光的眼睛。我从来没有画过眼镜，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这是我为斯皮诺扎眼镜公司画的广告；或许有人以为是我读了《墨西哥占领史》之后的即兴创作，因为十八世纪出版的这本书的封面上，有堂安东尼奥·德·索里斯戴眼镜的头像；或许还有人以为，那是我专为阿拉伯——西西里诗人伊本·赫姆蒂斯描写眼镜的诗画的插图。就是现在，当我写到这里时，一想起那副眼镜，就使我不安。犹如在一个黄昏的夜晚，我站在斯皮诺扎眼镜店门前，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老板，又看见橱窗里那排列成行的眼镜。眼镜闪烁着，犹如湖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似乎我又清晰地记起了伊本·赫姆蒂斯的诗和堂安东尼奥的头像……但是，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在堂卡埃塔诺的眼镜里，是否有一种使人忧虑和恐慌的魔力？我几次想揭开这个谜，却又不敢明言。（这时，我想起了安娜·玛丽亚·奥尔泰泽所写的名叫《一副眼镜》的书，书中描写一个高度近视的女孩子的遭遇。最后，妈妈给她配了一副眼镜。书中也描写了那波里狭窄的胡同里发生的不幸。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悲惨的情景，便心惊肉跳，汗流浹背。）

堂卡埃塔诺的眼镜与魔鬼戴的眼镜一模一样，这使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有意，还是巧合？是存心，还是偶然？我几次想直

截了当地问他，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今晚，我就坐在他面前，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张写字台，我又想问，却又抑制住自己。

“我想，我这样冒昧，不会打扰您吧。”我说。

“谁也不会打扰我，永远不会！”他仔细地端详着我，但与平时一样，装作没看见。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您有事吗？也许，想离开这儿？”

“看来，眼下我是走不了啦，所以，索性奉陪到底，看看这案子如何了结。”

“不会了结；您这种好奇心是得不到满足的……啊，您有事吗？也就是说，您是否想问我点什么，或者想托我办点什么事？现在，这里的人，不管是谁，不管想问我什么，或者托我办什么事，我都为他效劳。”

“那么，我想问您一件事。”

“好，请问吧。”他把眼镜向上推了推，镜片盖在眼上，为的是表明：他不想清晰地看见我。

“今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准确时间我记不清了，您射出了一支箭，它射中了斯卡拉姆布里的肋部，至今还在那里颤动。”我说。

“丰富的想象力，有点诗意。”他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也许，他听了这句话很得意。他说：“箭，肋部……确实很有想象力。您说，您看见我射中了斯卡拉姆布里的肋部，至今还在颤动。我也可以说，我也看到了，只不过是，我根本没射箭。”

“你的意思是说，您射出去的箭太多了，所以，哪支箭中了靶子，您自己也不知道。”

他沉默了。

“可怜的斯卡拉姆布里！”过了一会，我说。我不知怎样才

能把话题继续下去，因为，究竟堂卡埃塔诺想听我说下去还是希望我走开，我一时还拿不准。

“人们往往不会恰当地运用‘可怜的’这个形容词。”

“我不认为我用得不恰当。向上帝保证，我看见他赤身裸体被人射了一箭，所以我说他是可怜的。‘给赤身裸体的人衣穿，去帮助病残者……’基督是这样说的，对吗？”

“‘向上帝保证……’这么说，您也像一个虔诚的教徒那样，说的是实话喽。”

“大概，我扮演了一个吹毛求疵的角色。”

“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有一次，我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很有趣……您记得不错，‘给赤身裸体的人衣穿，去帮助病残者……’您记得不错。可是，五分钟以前，斯卡拉姆布里也坐在这把椅子上，而他却衣冠楚楚，气势汹汹……竟来讹诈我。”

“真的？”我装作不相信的样子。

“别装蒜啦，您怎么能不知道。即便您不知道，听到这话，您也不会感到惊奇。”

“您说得对。不过，他真的向您讹诈来着？”

“也不完全是。他说，如果我说出内情，他就不提那五个女人的事。这叫作礼尚往来，如果不是开恩的话。”

“您呢？”

“我对他感恩戴德。”

“那么，不止礼尚往来啦！”

“在这里，他从随便哪个人的口里都可以打听到那五个女人的名字。我讲的，要比那五个女人的丑闻多得多。您的朋友听了，高兴得手舞足蹈。就像一条狗，当主人扔给它一块肉骨头时乐得摇头摆尾，丑态百出一样。”

“他不是我的朋友。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就不会像您那样

藐视他。”

“啊，您藐视他？我可不然，我毫无藐视之意。我和您的朋友，请原谅，我指的是检察官先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就如同这只表里的齿轮和发条一样，与我毫无关系。”他指指写字台上的表说。

“您和您的表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吧。”

“不见得。如果说有，那就是当我需要知道时间的时候，它却停住了，这只能使我恼怒。”

“斯卡拉姆布里和您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您想看看他是否停住了，而他却一直在动。我说‘一直在动’，意思是说，他的侦察活动有所进展。”

“您的意思，昨天已经讲过了，您想要我帮助斯卡拉姆布里把案情查明。可这不是我的事，这是他的事。”

“从职业上来讲，是这样的，但这只是从职业角度来讲而已。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如果我们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那么就没有必要制定法律；同样，斯卡拉姆布里也就没有必要遵照法律去调查案情，捉拿凶手了。您说是不是？”

“不过，话也可以这么说：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勾心斗角，互相残杀，人人都在犯罪。您说的‘制定法律’，实际上是人人都在犯罪。这有点扯远了，暂且不谈这些……我们不是与世隔绝的，也不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您的朋友斯卡拉姆布里就在这里，他掌握着破案的大权；为了破案，他也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这次我说斯卡拉姆布里是您的朋友，我不准备向您道歉，因为，虽然您藐视他，您却站在他一边；您不可能不站在他那一边。”

“是的，我不能不站在他一边。而您却……”

“我哪一边也不是。我希望早日破案。”

“换句话说，就是永远也破不了案。”

“在您看来，是的，永远也破不了案。但在我看来……您记不得《路加福音》？您读过吗？有这么一句话：‘我把火种带到人间，现在大火已熊熊燃烧，我有什么办法？现在我要洗礼，但我悲痛欲绝，以致洗礼无法进行。’”

“您需要什么样的洗礼？”

“痛苦，死亡，别无它求。”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要有那么多的奢望？您为什么要盖大楼，开旅馆？为什么还要经营那么多的企业？还有您的朋友们，他们如果不是在您的指使下，便是在您的保护下——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这次，我可要对您提出抗议了。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正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为此，我既藐视他们，又疼爱他们。‘大火已熊熊燃烧’，我有什么办法？”

“也就是说，一切都注定要毁灭？”

“没有别的出路，谁也不例外。毁灭，毁灭……我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那些统治过或自以为统治过耶稣创立的宗教的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把宗教和社会，宗教和社会秩序混为一谈。这个错误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简单地归纳一下：十八世纪，这一错误使我们失去了理智；二十世纪，我们会把失去的理智夺回来……我说什么来着？把失去的理智夺回来？但是，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那将是你们的末日。”

“按照您的观点，是的，它是末日……但是会出现一个崭新的时代，那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基督教的新时代……到那时，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朝圣，大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当中那些已失去理智、至今尚未清醒过来的人，那些视友为敌的人，也会改邪归正，浪子回头……科学、愚昧都将

伸出友谊之手；贫困、康乐都为我们高唱赞歌……科学，您想，我们与它进行了多么艰苦卓绝的斗争啊！让人们去研究细胞去吧，让人们去研究原子和星空去吧！让人们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吧！让他们去分解、爆炸、甚至把人送到月球上去度周末吧！这只能使巴斯噶^①在宇宙面前更加恐慌不安。”

“恰恰相反，科学的发展，绝不会使当代人感到惊慌失措！”

“当今，人们正为改变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而疲于奔命，就好像在一场大战结束后瓜分战败国一样。其实，还没有打仗的迹象，而产生恐惧的裂缝却已出现。宇宙给人类带来的恐惧和人类自身互相残杀所带来的恐惧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有一句话，您还记得吗？‘我一直与他斗争，直到我懂得，他是个不可理解的怪物，方肯罢休。’所以，上帝怎能不与我们作对呢？”

“那么，我们就避开上帝。”

“避开上帝？这是不可能的。想当初，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时，不是离上帝远了，而是向上帝靠近了一步。”他摘下眼镜，疲倦地闭上眼睛，似乎有点失望。他的脸显得憔悴，就好像监狱里的囚犯，终日靠幻想过日子，正在回忆他曾试图越狱的情景一般。

他仍然闭着眼睛，喃喃地说：“逃避……”突然他睁开眼睛，趴在写字台上，探身对我说，“有人说，伏尔泰的唯理论有深刻的神学基础，甚至连巴斯噶也不能比拟。我要补充一点，伏尔泰的《天真汉》的诚实，正是巴斯噶所恐惧的。只是这位天真汉最后还是回家种他的花园去了。今天，类似的书再也写不出来了，时代变了。当然，也可以写，就是说，得用伪造的钥匙或万能钥匙去打开奥秘的大门，再不然就用凿子……我说的是双关语。就

^① 巴斯噶(1623—1662)，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是这样，像《天真汉》这样的书已无法仿造。”

“但是可以阅读。”

“那您就读吧。”他做了一个毫不介意的手势，得意洋洋地说，“您应该读一读。这样，您就会知道，出路是没有的。”停了一会，他和颜悦色地问我：“可是，为什么您总把心中同情我们的一面隐藏起来？为什么您总和我们作对？”

“因为，您总与我为敌；因为，您的上帝与我为敌。我不是‘不可理解的怪物’。”

我站起来，愤怒和厌恶使我再也无法继续谈下去，我想走开。自从我们相识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晚安！”我说。

他坐在那里，没有理睬。

从堂卡埃塔诺的办公室出来，我一直向卧室走去。穿过走廊，来到前厅，在电梯旁等了一会，坐上电梯。从电梯出来，又走了好长一段走廊，开开门，打开灯，走进卧室。我详细地回忆了从离开堂卡埃塔诺的办公室到进入自己房间的过程。我认为我的回忆是准确的。在小桌上，在一堆画纸中间，我发现了一本书，墨黑的封面，按照所谓法国冉森派的方式装订的，封面和书脊上不印字。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巴斯噶的《思想》一书。堂卡埃塔诺怎么能在我们回到房间之前把这本书放到我的桌上呢？怎么回事？也许，我等电梯的时间比较长，而我自己没觉察？也只有这种解释。这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深深感到不安。

翻过封面，看见内封，书中有一条黑色丝绸带做的书签。翻开夹书签的一页，我马上注意到右边那一页上的号码四六〇。这不是页数，而是巴斯噶思想的编号（我想：难道每个人的思想，作品，写出来的，说出来的，或只是经过思考而未写出来的，都得

像庞大的、人眼看不见的计算机储存的数据那样编成号码符号吗?)。第四六〇条是这样写的：“既然它的本性已不复存在，那么，一切都成为它的本性；正如慈善一样，一旦慈善消失，一切都变成慈善。”我又读第四六一、四六二条……一直读到第四七七条。

书签为什么夹在这一页里？是偶然的，还是堂卡埃塔诺有意给我看的？

我不愿再想下去，也无心读下去。我合上书，把它放在一边，便开始给斯卡拉姆布里画画。我画了一幅极为淫秽的女人裸体画。我了解斯卡拉姆布里，他定会讨厌它，把它卖掉，而价钱之高是他所想象不到的，这样，他就会对我产生羡慕和崇敬之感。

对我来说，一旦确定了主题，画一幅画就是极为简单的事了。我的手和眼睛就像自动控制着的一样，下笔如神，准确无误。这使我几天来一直感到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我一边画，一边想着别的事情，越画，我的思路越清楚，越准确，更加合乎逻辑，我的头脑也变得更加清醒，更加敏锐。就这样，我一边画，一边想着这几天所发生的惨案。第一个人被杀之后，我曾对案情有一个分析，现在我又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地思考。我眼睛盯着纸，手在画，而我的思想，却早已飞出旅馆之外。旅馆前宽阔的广场，郁郁葱葱的小树林，树林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条弯曲的小径，都浮现在眼前。犹如在一个日光明朗，万里无云的早晨，我从楼上眺望那样的清晰，层次分明，令人难忘。思路一结束，画也完成了。裸体像画得很细腻，造型生动，色彩丰富。明天，我将把这幅画送给斯卡拉姆布里，看他到底会说什么。我脱衣上床，顿时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是警长。他坐在前厅的安乐椅上翻报纸，一看见我，便诙谐地说：“有线索了。”

他做了个手势，请我坐在他身旁。

“什么样的线索？”

“正是检察官要找的线索！这能说是线索吗？有成千上万条线索，只不过都缠在一起了……有这么一大捆呢。”说着，指了指身边的文件。那些文件堆在一起，足有从地面到膝盖那么高。

“这都是些支票和收据的影印件，都是米凯洛齐为特别基金或秘密开支而签署的……检察官急着要。”他戏谑地玩味着斯卡拉姆布里催促着要这些文件的意图。

“在这些来避静的人当中，是否有人从中得到了好处？”

“是否有人？所有的人都从中得到了好处，没有一个例外。”

“这能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凭这些支票，我们可以起诉一百次其中有贪污行贿、营私舞弊、侵吞公款……我们也可以向法院提出一次总的公诉。但是，就凭这些支票，无论如何也查不出这两宗案件的作案人。”

“我也这么想。”

“可是检查官认为，揭开第一起凶杀案件，还有第二起凶杀案件的关键，就是这些支票。我不是说他这种推理是荒谬可笑的，而是说，要证明他这种推理是正确的，未免太难了，以至于……他是这样分析的：米凯洛齐给他们钱，不是让他们吃喝嫖赌，也不是让他们存到瑞士银行里去，而是为了资助他们的党，资助党内的各种势力，收买某些集团和他们的追随者。可是有人把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也不是像平时那样只侵吞一部分，而是全部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米凯洛齐得知此事，或对此事有所怀疑，于是对他构成了威胁。”

“他们用什么威胁？总不会到法院去告他吧。”

“米凯洛齐会说，不给他们钱了。”

“他不给，人家还可以到别处去找么。”

“我也这么说。不过，检察官的推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的话……我想，如果米凯洛齐发现有人利用他盗窃的公款制造恐怖，收买杀人犯，或者，他起初是有意识地资助这种人，后来发现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想来个急煞车，从此洗手不干。”

“这种推理比较合乎逻辑。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人们都说，米凯洛齐爱同事胜过爱自己。”

“请原谅，您还不知道，那些天天到教堂祈祷的教徒，那些圣经不离手，口口声声说自己爱他人胜于爱自己的人，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再过两个月，几点钟我记不清了，我在警察局就干了整整三十个年头了。我的经验是：最残忍、最巧妙、最棘手的案件，还有那些最愚蠢的、最容易破的案件，都是由那些这样跪着忏悔的狗男女干出来的。”说着便做了一个忏悔的姿势，跪在那里，缩成一团，活像一个特大号的圆面包。“另外，还有些桃色案件……但是，请您相信，多数人是为了钱，几乎都是为了继承财产而作案的。”然后他站起来对我说：“我去看看，检察官在这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来了没有……要不要把报纸留给您？”

“不，谢谢。我到小树林去散散步。”

我走出旅馆，向树林走去，为的是重新理一理昨晚我作画时的思路。

吃早餐的时候，人们又聚在餐厅里。堂卡埃塔诺快快不乐，也许，他一生中从未忧愁过。是他装腔作势，强打精神，好像他已准备好要与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开玩笑，或者恶作剧，并且也已做好我们反击的准备。相反，斯卡拉姆布里却疲惫不堪，两眼红肿，默默地坐在那里。一清早，我就让侍者给他把画送去了。他

冷冷地向我表示感谢，显然，那幅画使他扫兴。警长用一种既幸灾乐祸又怜悯的眼光看着他，不时地转过头来看看我，好像要对我说：您瞧，为了解开那个毫无头绪的线团，他累成这个样子。部长的脸也有点阴沉，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后来我才知道，在米凯洛齐签署的支票中，有一张正记在他的大名之下。斯卡拉姆布里发现了它，并请阁下解释是怎么回事。与部长同席的是银行行长，他的脸拉得更长，米凯洛齐的支票，都是在他的银行里开的户头。斯卡拉姆布里和他谈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得到的只是行长对他的憎恨。

当斯卡拉姆布里向我道谢的时候，堂卡埃塔诺便打开了话匣子。他问斯卡拉姆布里：“画的什么？”

“裸体像，一个裸体女人。”

“啊！”堂卡埃塔诺“啊”了一声，仿佛想说：您还想要什么呢？

“非常难看的裸体。”我说。

“啊。”这次，堂卡埃塔诺的意思是：这才好哪。

“但画得很出色。”斯卡拉姆布里说，完全是恭维。

“这是不言而喻的。难道说，教授这样的年纪，又有丰富的经验，能画不好吗？他当然画得好，应当有成就，有造诣！”然后，堂卡埃塔诺又对我说，“我似乎记得，我已向您道过歉了。您的作品，我见到的不多，而且大部分是复制品。虽然我看到的不多，但我产生了好奇心。您是否创作过与我们宗教有关的作品？比方说，一张耶稣像，一张圣母像，某个圣人，或某个节日的场面，某个教堂……”

“几年前，我画过一个虔诚的妇女。”

“明白啦，一个虔诚的妇女……您是怎么画的？”

“就那么画的。”

“您先别着急，让我猜一猜……您大概画了一个已经隐退了
的娼妓，一个因年老而退休的女人，脸皮松弛，脸颊下陷，然而，
仍然油头粉面，娇揉造作……”

“您猜着了。”我没好气地说。

“我很高兴。这说明我对您多少已有点了解。”似乎我给了
他面子，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就可以得寸进尺，向我提出要求了。
他说：“您是否愿意为我们，为我们的小教堂画一幅耶稣像？大
家都听见了，我用的动词是‘愿意’。”

“我不愿意。”我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但我立刻发现，这种
不友好的态度却使堂卡埃塔诺十分高兴。于是，作为对他这种态
度的反映，我改变了战术，我说：“耶稣像，罗丹画过，鲁奥尔特^①
画过……我不愿意画了。”

“您说得对。”堂卡埃塔诺说。我想，他十分清楚：他这句
话会使我大发雷霆。他又说：“罗丹画过，鲁奥尔特画过，我们
不必追溯得太远，格吕内瓦尔特^②、乔万尼·贝里尼^③、安东内
罗^④都画过……依我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安东内罗那幅耶稣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今它收藏在皮埃勤察博物馆里。蒙受苦难
的耶稣在他笔下是那样的麻木……太可怕了！但就今天来讲，最
杰出的画家莫过于罗丹和鲁奥尔特了。鲁奥尔特的《天主啊，求
你怜悯我！》那幅画，简直是登峰造极；无与伦比！真是杰作！
看了以后，耶稣所受的苦难久久留在我的心里。有人认为，鲁奥
尔特的耶稣像是绘画艺术的顶峰，后人再也不可能像他那样把耶
稣的感情刻画得如此生动而逼真，这是人类耶稣学的最后一页，

① 鲁奥尔特(1871—1958)，法国画家。

② 格吕内瓦尔特(1470—1528)，德国画家。

③ 乔万尼·贝里尼(1429—1516)，意大利画家。

④ 安东内罗，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

是我们所能听到的最后一声叹息！可是罗丹呢，罗丹的耶稣像并不比安东内罗的差，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当然，我指的是他的《草图》画集第三册中的耶稣像。它给人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令人震惊！似乎罗丹亲眼见过耶稣，所以他才勾画出了耶稣的面庞，似乎耶稣的相貌就像他画的那样……千百年来，耶稣最先把真相显露给他……耶稣决不会在圣史作家面前显出本相，因为他们希望人们永远忘记他的真面貌。为什么圣泰莱萨·蒂阿维拉能画出耶稣的双手？为什么罗丹能画出他的面庞？为什么？教授，我在问您哪。因为，关于罗丹，您肯定比我知道的多。”

“我不知道，也许，罗丹从来不看裸体。”

“什么？”

“罗丹说过：‘我从来不看裸体。’”

“那是因为，他像X光那样，一下子就穿透了裸体。”

使我震惊的是，罗丹的耶稣像给我的印象与堂卡埃塔诺的印象十分相似。但我却故意说：“您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它说明不了问题，与其说这是某种神秘的启示，毋宁说，这是浮言失实。道理很简单，罗丹别出心裁，想画一幅别开生面的画。”

“可不是一般的不同，而且又那么深刻……对啦，您是否愿意为我们画一幅耶稣像？还是认为没必要？”

“我认为没必要，但我愿意画。”

“您愿意画？太好啦！就看您的啦。”

这时他才发现，他这冗长的谈话，人们听得都不耐烦了。于是他改变了话题。

“您累了吧，检察官先生？”

“是啊。”斯卡拉姆布里叹了一口气。

“您哪，警长先生，您休息得不错吧。”他不怀好意地说。

“当然啦。”斯卡拉姆布里恶狠狠地说。

“我不能理解，”堂卡埃塔诺对斯卡拉姆布里说，“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您感到烦恼，而警长却感到轻松愉快？警长他……”

“过两个月，”警长说，“警长就弃甲归田了，所以感到轻松愉快。”

“您要走？”

“离开警察局，退休，回家种地去。”

“真幸运！”部长说。

“为什么离开警察局就是幸运？”堂卡埃塔诺微笑着，用嘲弄的口吻问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十分尊敬我们的警察局，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他要回到乡下去。”

“回到乡下是件十分容易的事。特别对您、我、行长来说，更是如此。”行长打了一个寒颤，“警长还要等上两个月，而你们二位，马上可以走。”

部长和行长的脸，马上变得阴沉可怕。我想，他们可能认为，堂卡埃塔诺是在影射检察官已掌握了与他们有关的非法支票，为此，他们不得不辞职。于是，他们两人便异口同声地说：“巴不得马上回到乡下去！”

“有困难吗？难道不放你们走？”堂卡埃塔诺装出天真，不解的样子。

“我的上帝，并不十分困难。”部长说。

“当然啦。不过，想走也不那么容易。”行长补充说。

“特别是现在。”堂卡埃塔诺意味深长地说。言下之意是：或者马上赶你们滚蛋，或者在与你们算清杀害米凯洛齐的血债之前，谁也别想溜。他为自己说出这句刻薄的双关语而自鸣得意。

这时，部长对堂卡埃塔诺的话作出了另一番解释，他壮着胆子说：“当然，特别是现在，事情搞得很糟，又没搞出个头绪，

走就意味着临阵脱逃，意味着背叛！”

“是背叛！”堂卡埃塔诺冷嘲热讽地说。

“要说事情嘛，确实很糟。”警长插话了。

“也无需夸大。”部长说。

“无需夸大。”行长随声附和地说。

“没必要夸大！”斯卡拉姆布里说。

“请问，我们这里的事情到底怎么样？是很顺利，还是很糟？”堂卡埃塔诺问道。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部长说。

“那些把手插在自己口袋里的人，也就是说，与案情无关的人，都认为非常糟。”警长说。

马上又是一阵沉默。似乎在一群有教养的高雅的人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无教养的粗坯。过了一会儿，行长说：“问题不在于把手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还是放在别人的口袋里，问题在于……”

“可以训练训练嘛，那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别人口袋里拿走点什么。”我说。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可不是扒手掏腰包那样的区区小事！”部长气愤地说。

“对，决不是扒手所能干的。”行长以适度的愤慨重复说。

“先生们，”堂卡埃塔诺冲着部长和行长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说这里发生的事情，它使我痛苦。我已一大把年纪了，我信任你们，但你们这样说，我不能容忍。我现在十分安静，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部长和行长闪电般地交换着眼神，把堂卡埃塔诺的话作为笑谈，哈哈大笑起来。我们离开餐桌时，他俩仍在笑个不停。

下午我才回到旅馆。一进旅馆便直奔我的房间。我猛然想起曾经答应给堂卡埃塔诺画一幅耶稣像，准确一点说，我并没许诺，但我仍愿意当作诺言承担。

我画了近两个小时。我的手显得比平时有力，笔锋浑厚、泼辣，一笔一划都令人满意，速度也相当快。我的笔仿佛在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神秘的音乐的伴奏下有节奏地挥动着。虽然这种节奏不能变成这幅画的主题，但它与我画出的形象，与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思想，以及我的构思融合在一起了。

在我画耶稣像的时候，旅馆里静悄悄的，而现在，似乎某种声音正从前厅升起，冲到一层、二层，又钻进走廊里来。声音越来越大，随后便听到刺耳的喧嚣，混乱的敲门声和人们急促、杂沓的脚步声。我屏住呼吸，竖耳细听。声音像洪水般涌向前厅，在那里聚集，发出巨大的轰隆声，于是我走出了房间。

像米凯洛齐被杀后的第二天早晨那样，前厅里又挤满了人。人们歇斯底里地大声喊叫着。

“什么时候？”

“在哪儿？”

“什么事？”

堂卡埃塔诺死了。但死在什么地方，在房间里？在他办公室里？在小教堂里？还是在树林里？一时还弄不清楚。突然，有人在旅馆门口大声喊道：“在树林里！在石磨旁边！”人群像一股旋风，猛然冲向广场。起初，他们不知所措，但很快便挤到一块，成漏斗状，沿着通向石磨的小道跑去。

我跟在后面。看着这些年过半百的人沿着羊肠小道气喘吁吁地奔跑、颠簸，我觉得实在滑稽可笑。我一边走，一边听见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堂卡埃塔诺是被人杀死的，还是自然死亡？”好像堂卡埃塔诺应当告诉他们：人死，并不都是自然死亡。

堂卡埃塔诺是被枪杀的。他躺在石磨旁边。如今，石磨只剩下一块圆磨石了。他是从上面滑下来的，死后依然靠在圆石上。

死亡往往给人带来一种肃穆、庄重的气氛。堂卡埃塔诺的死也是如此。但是，他的死并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消失了，又好像被肢解了：他双腿分开，几乎成九十度。黑色长袍敞开着，他从磨石上滑下来时，长袍跑到头上去了。一双雪白的羊毛袜露在外面。黑长袍和白袜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凭他的穿戴是在过冬，而今天，却是盛夏。我的眼离开袜子，又落到那副眼镜上，一根丝线系在胸上，眼镜已滑到一条树根旁边。阳光透过树叶射进来，落在镜片上，又反射出去。这情景恰似小卡拉瓦焦^①的作品。我说“小”，是因为堂卡埃塔诺和他周围的一切都变小了，萎缩了，比他在世时更加顺从了。

离他左手不远的地方，有一支手枪，短短的，像一个小手鼓。手枪离他很近，以致站在我旁边的人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自杀？”

我说：“您认为是自杀？”

“我们都快要发疯啦！”另一个人赌气地说。

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人都扯在一块的说法，使我更加相信：堂卡埃塔诺的死，起码在此时此刻，降低了他的人格。

人们在离堂卡埃塔诺十来米远的地方围成一个半圆，斯卡拉姆布里和警长站在尸体两旁仔细地检查着，仿佛只要有一丝希望，也要把他唤醒似的。

我离开人群向斯卡拉姆布里走去。他脸上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似乎在说：堂卡埃塔诺的死，他早已预料到了，只是，这对他十分不利，会加重他的负担，使他更加疲惫不堪。他用拉

^① 卡拉瓦焦(1500—154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

丁字对我说：“您瞧，我多运气！”说完，感到不妥当，担心被人误解为他对堂卡埃塔诺的死幸灾乐祸，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于是他马上补充说：“我是说，真运气，又发生了件倒霉事！”但他仍然说了“运气”二字，还觉得不恰当，又说，“灾难啊，太可怕啦！”说完，又俯下身子去验尸。

“这玩艺儿对我有启发……”警长盯着手枪喃喃地说，说了一半就停住了。

“什么东西对您有启发？”斯卡拉姆布里不耐烦地问，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自己。他想说：您的想法，您的假设、分析、推断，还有您的怀疑，对我毫无帮助，只能制造混乱！

“手枪。”警长说。

“手枪里有什么？”他怒气冲冲地问道。

“手枪里？没什么。我是说，我们终于找到了手枪，既然找到了它，就可以顺藤摸瓜。它使我想到了些别的线索。”

“难道您认为，在众人面前说这些话是恰当的吗？”

“是啊，所以我没说。过一会儿我再回答您的问题。”

斯卡拉姆布里本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他没这样做。他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也许，不是突然的。他转身向围观的人群大声说道：“先生们，我请你们都回旅馆去整理行李，务必在天黑以前离开旅馆！”

回答他的是一阵不满的骚动和一片抗议声。

“我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这是我的责任。”

“说得对。”部长说，“也许，早就应该这么办了。”

斯卡拉姆布里毫不理睬，他愤怒地、斩钉截铁地说：“天黑以前把旅馆空出来，连一只猫也不许留。”

“旅馆里没有猫。”齐莱斯特里神父离开人群向斯卡拉姆布里走去。他说：“我们一直用耗子药……”他这么说，不知为了

让斯卡拉姆布里消消气，还是由于悲痛过度，一时没理解检查官的意思。

“我，还有其他的神父……”

“统统离开旅馆！”斯卡拉姆布里说，“所有的人都得离开！神父，我要关闭这座旅馆，贴上封条。”然后他用和蔼的口气说，

“先生们，回去准备行李吧，我们要在这里检查现场。”

先生们都走了，部长走在最前头。

只有摄影师在现场忙碌着。过了一会，法医也来了。接着又来了两个人，带着一副帆布担架。他们把堂卡埃塔诺放到担架上抬走了。堂卡埃塔诺的眼镜从担架上滑下来，随着抬担架人的步伐有节奏地摆动。

我跟在后面，一直送到停在旅馆门口的小卡车跟前，然后就上楼，到房间里去整理行李。

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只要锁上箱子就完事大吉。我犹豫了一会儿：把堂卡埃塔诺头天晚上送来的书带走呢，还是留在这儿？我决定留下它，把它放在我画的耶稣像旁边。

天还没黑下来，旅馆里早已灯火辉煌，灯光也照亮了门前的广场。似乎这灯光正在等待着黑暗尽快降临，好让夜幕把我们覆盖起来。几辆小汽车已经走了，斯卡拉姆布里和警长也准备离开这里。我朝他们走去。

“你收拾得真快。”斯卡拉姆布里看看我的箱子说。

“您没看见，天已晚了，该离开这个地狱了。”警长说。

“如果他们不走，”斯卡拉姆布里说，“就会像阿伽莎·克里斯蒂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一个接一个地都被杀死。那时，为了找到凶手，我们只好想法把他们一个一个唤醒，让他们出来作证。”

“找不到凶手，永远也找不到凶手！”警长不满地说。

“可是手枪呢？”我问道，“也许您从手枪上得到了什么启发？这与我的想法有点相似。”

“你有什么想法？”斯卡拉姆布里谦恭地问我。

“很简单。第一次作案之后，手枪不见了，如今，为什么又出现在堂卡埃塔诺的身旁？”

“完全正确，我正是这么想的。”警长说。

“如果，”我说，“杀死堂卡埃塔诺的凶手不是第一宗案件的作案人，那么他怎么找到了手枪？难道是偶然找到的？”

“上帝啊，”斯卡拉姆布里说，“为什么要把问题搞得这么复杂？问题已经够复杂了……枪杀米凯洛齐的手枪早已藏起来了，谁也找不到，不管是偶然的还是有意识的。再说，如果你和警长都认为另一个凶手找到了那支手枪，那么警长，您应当承认自己无能，玩忽职守，应该把你马上撤职。要知道，找到手枪是您的职责。您花了整整两天的工夫找手枪，您查遍了每个房间，每一个行李，搜遍了每一个贮藏室，每一寸土地……”他指着警长问道，“请问，杀死堂卡埃塔诺的凶手和杀死米凯洛齐的凶手是不是一个人？”

“我没什么想法，我……我是想，为什么凶手把手枪留在堂卡埃塔诺身边？我有点不能理解。”

“因为它再也没用处了。这不是一种解释，嗯？”

“也是。”警长敷衍地说，为的是赶快结束这种谈话。

“既然是一种解释，为什么还要挖空心思地去找更复杂的解释？那不是越搞越乱吗？”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想，堂卡埃塔诺被杀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大概只有我、你、警长、警察、厨师和侍者例外，再加上堂卡埃塔诺。所以，有嫌疑的人都在里面，在自己的房间里，起码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甚至可以发誓……站在电梯旁边的警察说：谁也

没进去，也没看见什么人进去没出来。站在后门口的警察也这么说。而警长却在这里，在躺椅上睡着了。他也说，没人出来，也没有人进去。那么……？”

谁也没回答他，他在自己问自己。于是他洋洋得意地说：“那么，我便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可能，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也许有两个，也许三个人全部离开了岗位，要不，干脆都睡着了。”

“我可没睡。”警长说。

“好，就算您没走开，也没睡觉，在电梯旁站岗的警察也没离开，也没睡觉。那么，在后门门口站岗的警察呢？请告诉我，当时您究竟在什么地方？”

“在那儿。”警长用手指指说。

“那么，您敢不敢在那个地方向天发誓，说您一直在那儿看守着大门和后门，没离开岗位，没在那里休息、睡觉？”

“我不发誓。”

“您瞧，当凶手悄悄地溜出去的时候，警察睡着了，而您，到别的地方去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解释。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如果我们都是老实人的话，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尽快了结这些案子，我们可以任意怀疑，甚至可以怀疑到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您说，您在这里睡着了，您是这么说的……”

“而你，”他对我说，“你说你出去了……你到哪里去了？”

“去杀堂卡埃塔诺去了！”我说。

“你瞧，如果毫无根据地怀疑下去，不就没完没了啦！”他得意洋洋地说，“这样搞下去，你、我、警长都成了嫌疑犯，与这些人一样，甚至还要糟。可作案动机呢？没有。所以我总是说，亲爱的警长，需要弄清动机，弄清作案的动机……”

各 得 其 所

吕 同 六 译

请别以为，我的旨趣是揭露一件秘密，
或者，是写一部小说。

爱伦·坡：《莫尔格街的谋杀案》

—

下午，药剂师收到一封信。像往常那样，邮递员先把一捆五颜六色的印刷品放在柜台上，尔后，小心翼翼地，仿佛是怕它会突然爆炸似的，递过信件：杏黄色的信封，上面贴了一张印着收信人地址的长方条白纸。

“我挺讨厌这封信。”邮递员说。

正在阅读报纸的药剂师抬起头来，摘下眼镜，冷淡而又好奇地问道：

“什么事儿？”

“我是说，我挺讨厌这封信。”邮递员伸出食指，把放在大理石面柜台上的信朝药剂师轻轻地推过去。

药剂师俯身打量来信，却不去触动它；随后，他站起身来，戴上眼镜，继续审视它。

“你干吗讨厌这封信？”

“这封信是昨儿晚上或者今天清晨在本地投寄的，信封上的地址，看得出来，是从印着您药店字号的印刷品上剪下来的。”

“不错。”药剂师证实。他眯起眼睛，谛视着迷惘不安的，

似乎正期待着某种解释或者决定的邮递员。

“这是一封匿名信。”邮递员说。

“一封匿名信。”药剂师机械地应声。他仍然没有触动它，可这封不吉祥的信件显然扰乱了他安宁的星期天生活。妻子在厨房里烤羊肉，预备晚餐；她说不上美丽，而且失去了青春年华的风韵，匿名信使她像受了电击一般，痴痴地站着发怔。

“这个地方历来有写匿名信的恶习。”邮递员说。他把邮袋搁到一张椅子上，胳膊肘支着柜台，等待药剂师拆开信封。他极其谨慎地把信送到这里，事先不曾开封，因为他对收信人的诚意和率直寄予希望：“如果信的内容是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他自然啥也不会对我说；假如是一封恫吓信，或者别的什么，那他肯定会让我知道的。”不弄个水落石出，看来邮递员无论如何是不打算离开了。反正他的时间绰绰有余。

“给我的匿名信？”沉吟了半晌，药剂师才开口。他的语气是惊愕、愤懑的，苍白的面孔透露出张皇恐惧的神情，目光呆滞，涔涔汗水顺着脸颊流淌到嘴唇边。充满好奇心的邮递员，也被他的惊愕和愤懑所感染了。这是个心地善良、平易近人的老实汉子，他开的药店给所有的人赊帐；他用妻子的嫁妆在乡间购置的地产给耕作的农民提供种种方便。邮递员也从来不曾听到关于他妻子的任何流言蜚语。

药剂师终于下了决心；他伸手一攫，抓过信件，拆开信封，把信纸摊开。情况果然不出邮递员所料：信是用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印刷字剪贴而成的。

药剂师一口气饮下苦酒。整封信只不过两行。

“你瞧，你瞧。”他几乎自我安慰地松了一口气。

“平安无事。”邮递员暗自思忖，问道：“怎么说？是恐吓吗？”

“恐吓。”药剂师把信递给他。邮递员急忙取过信来，大声念道：

鉴于你的败行劣迹，谨以此信郑重宣布，你将被处以死刑。

他把信塞回到信封里，放在柜台上。“这不过是一场恶作剧。”他说，心里也确实这么想。

“你当真以为是恶作剧吗？”药剂师有点疑惧地问。

“那还能是什么呢？恶作剧。有人无聊得发慌，便制造这种玩意儿。不是啥新鲜事了。还常常有人打恐吓电话呢。”

“噢，是的，”药剂师说，“我也曾经遇到过。半夜三更，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却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向我打听，我的看家狗可曾丢失，因为她遇上一条半是天蓝色、半是玫瑰色的叭儿狗，别人告诉她，这是我的。恶作剧。不过，这一回是用死亡来恐吓我啊。”

“反正是一样。”邮递员权威地断言，“您大可不必介意。”他拿起邮袋，说了这句仿佛是一道别的话，朝店门口走去。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药剂师回答的时候，邮递员已经跨出了门槛。但他的心仍在胸中怦怦乱跳。这个恶作剧可非同寻常啊。假若是开玩笑的话……不过，那又能是什么呢？他一生不曾遇到过麻烦，对政治素来漠不关心，遇到政治争论，总是退避三舍。他在大选中投谁的票，是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的秘密。在全国公民投票中，他把选票献给社会党，这是继承家庭的传统，也是对青年时代的纪念；在地方选举中，挚爱家乡的情感促使他站在天主教民主党一边，因为天民党在当地执政的时候，他的家乡获得了若干好处，还保住了受到左派政党威胁的家庭收益。他始终避免介入政治斗争；左派视他为右翼政党的信徒，右派则把他当作左翼分子。何况卷入政治的旋涡不啻是虚掷光阴，只有蝇营

狗苟之徒，或天生的愚昧无知者，才意识不到这一点。总而言之，他跟所有的人都和衷共济。或许，这正是招来匿名信的缘故。分明是要让这样一个眷恋于太平生活、八面玲珑、逍遥自在的人虚惊一场，破坏他宁静闲适的生活。

他是个狩猎迷。兴许应当从他这唯一的癖好中探寻他接得匿名信的另一个原因。狩猎者往往忌惮别人，这是尽人皆知的。倘若你得到一头剽悍的猎狗，一头上好的鼠狼，周围的狩猎者便都视你为冤家仇敌，即便是那些时常跟你做伴儿打猎，每天晚上到药店里来聊天的朋友也不例外。在这个小城，毒死猎狗的事件迭有发生。那些最出色的猎狗，只消主人略一疏忽，把它们放到外面去溜达溜达，便有误食马钱子做的药饵，倒毙街头的危险。谁晓得，很可能有人把马钱子跟药店联系了起来。这自然是冤枉的。在药剂师曼诺的心目中，狗如同至圣的天主一般被尊为圣物，尤其是那些威武地驰骋于狩猎场的猎狗，不管是他的还是他的朋友们的。至于说他的猎狗，全都在不受毒药威胁的环境里生活着。他豢养了十一头猎狗，多半是齐涅依卡^①种，个个健壮剽悍，享受贵宾般的待遇，有一座小花园专供它们起居和玩耍。看它们游戏，听它们吠叫，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乐趣。它们汪汪的吼叫，有时不免招来邻居的非议，可在药剂师听来，却比那优美的音乐更加悦耳动听。他能够辨别出每一头猎狗的声音，由此判断它心情愉快，还是闷闷不乐，或者得了鼻疽病。

是的，确实别无其他原因了。这么说来，是恶作剧，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有人想吓唬他，要他在照例休假的星期三放弃打猎。他是谦谦君子，不过，骁勇的猎狗，他的弹无虚发的射击，使得每个星期三都成为猎获野兔的节日。罗西奥大夫可以作

^① 西西里猎狗，四肢短粗，勇猛，敏捷。

为见证人。他的这位契友也练得一手好枪法，有两头上好的猎狗。于今，这封匿名信反倒成为他是个出众的猎手的证明，挑逗起他爱好虚荣的自负心。不错，狩猎季节即将开始了。不管狩猎季节开始的那天可恰好是星期三，药剂师历来像庆祝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似的度过这一天；现在，竟然有人企图剥夺他享受这份欢乐的权利。

匿名信的缘由和作者的身份已经昭然若揭，可药剂师仍然细细琢磨着；他把柳条安乐椅搬到药店外面，选了一处背阴的地方坐下。对面是梅尔库齐奥·斯帕诺的青铜雕像，这位多次出任邮电部副部长的法学家，在夕阳深沉的余晖中，把严峻的影子投照到地面，也仿佛坠入了沉思，正以法学权威和邮电部副部长的双重资格，推敲这位匿名信的奥秘。药剂师浮躁地凝视着青铜雕像，可是，一缕悲酸随即在心头涌起，淹没了浮躁的感觉；他蒙受了不公正的侮辱。如今他在别人奸诈的机谋中发现了自己高尚的仁慈心肠，他暗暗悔恨和责备自己，他对这种阴谋诡计竟然一窍不通。

梅尔库齐奥·斯帕诺的影子已经移到街心广场对面的基雅拉蒙特古堡的围墙上。药剂师陷入了如此凝神默思的状态，以致路易吉·科尔瓦亚以为他沉沉入睡了。

“醒一醒！”科尔瓦亚大声喊道。

药剂师蓦地打了个寒噤，站起身来，忙给科尔瓦亚端椅子。

“好热的天气。”科尔瓦亚吁了一口气，身子重重地落到椅子上。

“气温表上已经四十四度了。”药剂师说。

“现在稍稍风凉点了。你瞧，夜里睡觉准要盖毯子。”

“连这鬼天气也叫人摸不着头脑。”药剂师快快地说。他打算把这件事立即告诉科尔瓦亚，因为他已经决定让每一个上他家

里来的朋友都知道。“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他说。

“匿名信？”

“想吓唬我。”他站起身来去拿信。

“我的天主！”读完令人毛骨悚然的两行字，科尔瓦亚禁不住喊道。他停顿了片刻，说道：“想必这只是开玩笑罢了。”

药剂师同意他的判断，“不过，它也许暗藏着某种动机吧。”

“什么动机？”

“迫使我这个猎手洗手不干。”

“噢，是的，很可能。你们这些猎手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科尔瓦亚向来责备打猎是种徒然耗费钱财和精力的不明智的游戏，虽然鲜美的鹧鸪汤和糖醋兔肉是令他垂涎的佳肴。

“并非所有的狩猎者都是这样。”药剂师纠正说。

“当然，当然，任何规则都有例外，不过你可晓得，有的人竟会干出什么样的勾当：用捣和了马钱子的肉丸子喂猎狗；子弹射向朋友的猎狗，而不瞄准猎狗正在追逐的野兔……一群混帐货。猎狗犯了什么罪呢？不管怎么说，狗总是狗嘛。假如有胆量，把火气向主人发泄好了。”

“这是两码子事。”药剂师争辩说。某种歆羡别人猎狗的心情，他虽然也时常体味到，可是，谁都明白，这绝不至于达到平白无故地置它们于死地的程度。

“在我看来，却是一回事。天主曾说，谁胆敢冷酷无情地杀死一条狗，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一个基督徒。”科尔瓦亚又补充道，“我这么说，也许因为狩猎不是我的嗜好。”

围绕狩猎者的心理状态的争论，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随着每一位客人的光临，谈话又重新从匿名信开始，而以那些从事这一古老而高尚活动的狩猎者嫉妒、仇恨的阴暗心理告终。在场的客人自然不属于嫌疑者之列，可是路易吉·科尔瓦亚却暗自

怀疑药剂师的客人们跟毒死猎狗和匿名信有着牵连。事实上，在他那双布满鱼尾纹的眼皮底下，锐利的目光正巡扫着每一张面孔：罗西奥大夫、公证师佩科利拉、律师卢塞洛、中学教员拉乌腊纳，直至药剂师本人。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药剂师为了使自己成为令人敬畏的狩猎者，他不仅可能毒死自己的猎狗，而且可能是匿名信的作者。科尔瓦亚用他那训练有素，惯于跟欺骗、猜忌、奸诈打交道的头脑默默地思索着，随时准备认定他们其中的一个是这险恶阴谋的制作者。

所有的人终于都一致同意，匿名信其实是一场恶作剧，不管怎么说都是很狠毒的，假如它想迫使药剂师放弃参加狩猎季节开始日的盛大活动，那就更其卑鄙。当宪兵队长像往常那样照例前来聚会的时候，药剂师摆出了一副完全准备开玩笑的架势，他佯装垂头丧气和恐惧不安的样子，戏谑地抱怨，在队长大人管辖的地区，像他这样诚实、善良的公民，竟这般轻易地遭到死亡的威胁。

“出了什么事儿？”宪兵队长嬉皮笑脸地问道，等待宣布什么滑稽有趣的事情。可当他读到那封信，脸色顿时变得非常严肃起来。这很可能是个恶作剧，兴许确实确实是恶作剧，但毕竟已构成恐吓罪，自然需要报案。

“报什么案呀？”心情已经显得很轻松的药剂师问道。

“噢，不行，必须报案，按照法律办事。不过我可以免去你上宪兵队去的麻烦。我们就在这里写份材料，反正只是一分钟的事儿。”

他们走进店堂，药剂师扭亮柜台上的台灯，开始笔录宪兵队长的口述。

宪兵队长手里拿着摊开的匿名信，口述报告，台灯的光线投射在信纸上。中学教员拉乌腊纳尾随进来，他对报告的格式和语言

发生了兴趣；从匿名信的反面，他清晰地瞧见信纸上显出大写的 UNICUIQUE，然后是一行歪歪斜斜的小字：ordine naturale, menti obversantur, tempo, sede。他想揭开谜底，又走上前去，大声念道：umano……①

宪兵队长不愿意泄露现在仍然属于他的职权范围内的机密，不耐烦地说道：

“对不起，您没有瞧见，我正在口述一份报告吗？”

“我不过是从反面瞧瞧罢了。”拉乌腊纳抱歉地说。

队长索性把信折起来。

“或许，您最好也像我这样瞧一瞧。”中学教员有点儿不悦，快快地说。

“我们会做应当做的事情，请您放心。”宪兵队长一本正经地说，然后继续他的口述。

① 作案者为避免暴露，把报纸上的印刷字剪下来，拼贴成匿名信；拉乌腊纳从信的反面见到的字眼，实际是被剪贴的报纸的反面；UNICUIQUESUUM，拉丁文，为梵蒂冈机关报《罗马观察家》报头每天必登的一句话，意为“各得其所”，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其他词语既有拉丁文，也有意大利文，也是报纸文字的剪贴，没有内容上的联系。

二

1964年8月21日，是药剂师曼诺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个幸福日子。按照法医的检验，这幸福的时光一直持续到黄昏；另外，药剂师和罗西奥大夫两只行猎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战利品，十四只野兔，六只鹧鸪，足资证实法医诊断的正确。据行家们说，鉴于当地不是得到保护的狩猎场，野禽资源并不丰富，这些战利品恰好是猎手一天能够得到的收获。

药剂师和医生每次打猎非要弄到精疲力竭的地步方肯罢休，好像只有这样，方能领略个中乐趣，考验自己和猎狗的本领。他们俩总是形影相随，从来不要第三者为伴，这已是多年的习惯了。他们一起结束了这幸福的最后一天，药剂师背部中弹，医生胸口受到致命的袭击，双双栽倒在地，彼此相距大约十一米远。药剂师出发前留下一条害红眼睛的猎狗看守家门，随身带了十条猎狗；其中的一条，兴许因为勇猛地扑向凶手，也许由于凶手的狂热或残忍，遭到了杀害，陪伴它的主人去了永恒的虚无世界，或者追随他去了极乐世界狩猎。

药剂师的其他九条猎狗和医生的两条猎狗顿时明白了发生的一切。据当地人叙述，将及晚上九点钟，它们排成密集的队形，一路上没命地迅跑，发出神秘的嗥叫，窜回了小城。目睹这一情景和听到它们吠声的人，都不禁打了个寒颤，产生了不祥的预感。猎狗们簇拥着，狺狺地吠着，朝药剂师改作狗窝的仓库急急奔去，在仓库紧紧关闭的大门前，它们引颈长嗥，无疑是要把方才发生的惨剧告诉因害红眼睛而留家看守的同伙。猎犬们的行动哄动了

整个小城，不止一天，甚至以后每当谈到狗的品格时，人物都对天主造物的方式提出了异议：不让狗赋有言语的能力，是不完全公正的。不过，人们责怪造物主的时候却不曾想到，在那种情势下，要在宪兵队长跟前讲清楚凶杀的情况，猎狗即便能够言语，也实在是无能为力的。

将近午夜时分，已经上床就寝的宪兵队长接到了猎犬表现异常的报告。他和宪兵们，还有几名游手好闲者，用喷香的肉饼、温柔的抚摸和语言，在广场上诱导猎狗们领他去寻找它们的主人。天色破晓，猎狗们仍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太阳升高了，宪兵队长无奈去见药剂师妻子，打听得到那两个狩猎者可能去的地点，便立即出发侦查了。

经过一整天苦苦的搜索，直到晚祷钟敲响的时候，他才发现了尸体。他丝毫没有觉着意外，当他闻讯从床上一跃而起的时候，他已经料定，那封匿名信发出的威胁付诸实现了，诚然他和所有的人都曾以为那不过是恶作剧。

这是件涉及两条人命的老大难案子，两位正直的、受人尊敬和爱戴，颇有地位的人士在一次谋杀中丧生，宪兵队长在小城就任三年来还是头一回碰上这等棘手的案子。死者的亲属在当地都孚有声望，药剂师的妻子斯帕诺是青铜纪念碑上雕塑的那位斯帕诺的后裔，罗西奥大夫的父亲是眼科专家、大学教授，他的妻子出身于高贵的卢塞洛门第，是总司铎的侄女，卢塞洛律师的堂妹。

从大区首府火速赶来一位上校和警察局特派员兼刑警队长。据报界透露，特派员被授权在宪兵队长密切配合下指挥侦缉工作。那班吃过官司的人这回又灾难临头，特派员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下令把他们悉数拘留，为数不少的破产的商人和高利贷者除外。但二十四小时以后，所有被拘留者又统统释放回家了。这是

一个绝密的计划，暗中为宪兵队效劳的当地特务也参与其事。治丧的筹备工作在积极进行，死者和他们亲属的重要地位，案件激起的强烈反响，居民们的悲痛，注定葬礼将是空前规模的。警察局也有意把葬礼搞得格外隆重，并且暗中决定把它拍成电影，让那场面永远保留下来。拍摄电影是秘密进行的，每一个参加葬礼的人以后都将在银幕上逐一亮相，他们走到镜头跟前，仿佛向摄影师和审判官提出抗议：我知道你们是何许人，你们徒然浪费时光，请好生瞧瞧我吧，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无辜者，死难者的朋友。

死者的灵柩由他们最忠实、最健壮的顾主抬着，用坚实的胡桃木打就，镶了青铜的棺材像铅制的一般沉重。药剂师曼诺的生前友好在送殡的行列里谈论着匿名信，从药剂师的既往经历中搜索着疑点，他们对可怜的罗西奥大夫流露出满腔的同情，他是完全平白无故的，匿名信事件后，他仍然轻率地陪同药剂师去打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时此刻，恐吓已无情地转化为事实，除去对药剂师表示深深的敬意，应该承认，凶手们手里大约掌握了什么把柄，纵然这把柄可能是荒唐无稽的，甚至是基于死者早年的某一微不足道的、不为人们注意的行为或过错。而且，匿名信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鉴于你的败行劣迹，……你将被处以死刑。这么说来，药剂师可能犯了某种过错，毫无疑义，是某种轻微的、遥远岁月里的过错。从另一方面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行为，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而这一回，加上无辜的罗西奥大夫，竟杀了两个人。不错，在头脑发热的时候，片言只语，区区小事，都可能导致行凶杀人的。但这一谋杀却分明是深思熟虑地筹划的结果，是对蒙受的某种无法轻易忘却的凌辱的报复，流逝的岁月没有荡涤这一凌辱，反倒使它愈发伤害对方的尊严。是的，世上不乏丧失理智的疯人，他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某个人，认

定此人时时刻刻秘密地迫害他们。然而，这一次的谋杀难道能说是一个疯人的罪孽吗？首先，必须要有两名疯人；请再设想一下，两名疯人若要达成协议该是多么的困难。凶手必须是两个人，道理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敢冒险对两名全副武装，手执子弹上膛的枪支，反应敏捷，枪法精良，警惕地注视周围的人发动袭击的。说实在的，为什么要事先警告呢？倘若药剂师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假如他确有过错的话——，或者仅仅因为慑于匿名信的威胁，放弃打猎呢？谋杀的计划不就全盘告吹了吗？

“在情杀案件中，”公证人培科利拉说，“这类匿名信是屡见不鲜的。不管要冒多大风险，写信人一心雪耻复仇，决意要让药剂师从受到警告之日起便为自己的过错而偿付代价，去叩死亡的大门。”

“可药剂师丝毫没有末日来临的感觉。”中学教员拉乌腊纳说，“收到匿名信的那个晚上，他或许有点儿激动不安，但后来心情一直很平静，还跟人开玩笑哩。”

“不过，您怎能猜透别人竭力掩饰的心事呢？”公证人反问道。

“干吗要掩饰？相反，他还对匿名信的由来多少表示过怀疑，最明智的做法是……”

“……是向朋友们，甚至向宪兵队长报告这件事。”公证人讥刺地打断他。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我亲爱的朋友！”公证人流露出惊奇和责怪的神情，但仍然充满热情地说，“请您设想一下，我亲爱的朋友，药剂师曼诺，自然是位令人怀念的好人，但他也有软弱、轻率的时刻……我们都是男子汉，不是吗？”他巡视四周，寻找支持者，人们点头表示赞同。“光临药店的顾主，女人多于男子，人们又几乎把药剂

师尊为医生……总而言之，机会能使人变成贼。一名少女，一个妙龄女郎……请注意，我倒不是说，我们这位死者一定有这样的弱点，可是谁敢替他打保票呢？”

“谁也不敢。”路易吉·科尔瓦亚应声说。

“呸，听见了吗？”公证人继续说，“不妨再补充一点，假如这种怀疑是有某种事实作依据……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们这位已故者当年是出于利害关系才结婚的，只要瞧一瞧他那位可怜的夫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不错，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品德极其高尚；可是，这可怜的女人像个丑八怪似的，太难看了……”

“他出身清贫，”路易吉接过话碴，“像所有的穷光蛋那样，起先他很贪婪，吝啬，尤其是在青年时代……后来，结了婚，药店的生意很兴隆，他也就变了个样儿。当然仅仅表面上如此。”

“一点儿不错，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骨子里他是个冷漠无情、铁石心肠的人……好吧，还是言归正传：请想一想，当人们谈论女人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活像个哑巴似的，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路易吉敏捷地回答公证人提出的问题。

“应当坦率地说，我们沾染了谈论女人的恶习，但仅仅止于谈论而已，这是我们的态度。而他呢？你们可记得，有的时候，他的脸上泛出一丝笑容，仿佛说：‘你们尽磨嘴皮，我可是实干派。’话又说回来，应当承认，他是个相貌英俊的美男子。”

“你讲的这一切，亲爱的公证人，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拉乌腊纳反驳道，“即便确有其事吧，借用陈旧的通俗小说里的套话，譬如说，药剂师勾引了某个少女，或者对一位有夫之妇采取了非礼的行动……假若事情确实如此，那就有待揭开这样一个疑点：他接到匿名信以后，为什么不把他关于匿名信作者的猜疑告

诉宪兵队长。”

“因为在丧失家庭的宁静和获得永世的宁静这两者之间，一个人往往会选择后者，他自然就守口如瓶了。”泽里洛爵士接腔道，他脸上显露出因迄今未能作出同样的抉择而深感遗憾的表情。

“可是，宪兵队长很审慎地……”拉乌腊纳争辩说。

“别说蠢话了。”公证人打断他的话，尔后说，“请原谅，我过一会儿向您解释。”

送殡的队列到达了目的地，在公墓教堂前面将举行吊唁仪式，发表赞颂亡者的演讲，公证人受委托宣读哀悼药剂师的悼词。

中学教员拉乌腊纳并不需要公证人的解释。他确实说了一通蠢话。

前一天晚上，特派员找到药剂师的遗孀谈话，用委婉的暗示和微妙的诱导，请她回忆和考虑一下，像这人世上时时处处发生的那样，她可曾对丈夫——哪怕极其偶然地——产生过一丁点儿疑窦，当然，千万别以为丈夫跟别的女人发生了什么有伤风化的关系，也别误会丈夫曾在什么场合背弃她，看在天主份上！而是说，她是否隐隐约约记得，可曾有过什么女人，过于频繁地光顾药店，挑逗她的丈夫，迷惑她的丈夫；特派员踌躇满志地等待她的回答。曼诺太太却一迭声地坚决否认有这等事情。特派员毫不气馁，他派人把药剂师的女仆召来，以慈父般的温柔盘问她。六个小时以后，女仆终于开口说，是的，有一回，主人的家里确实发生过一起小小的纠纷，曼诺太太嚷道，有个女子不断地上药店来——药店在居室的楼下，只要曼诺太太乐意，她随时可以监视出入药店的人。

“那么，药剂师呢？”特派员追问。

“他不承认。”女仆回答。

“您怎样认为？”

“我？跟我有啥关系？”

“您跟曼诺太太一样怀疑吗？”

“太太并不怀疑，她只是觉得，那女子过分活泼，男人终究是男人。”

“唔，很活泼；而且很漂亮，不是吗？”

“依我看，算不上美人儿；不过，她确实是个活泼的女子。”

“很活泼，就是说，这是一个风流俊俏的女人，甚至卖弄风骚……您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这个女子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女仆的说法不断改变：“我不认识她。”“我从来不曾见过她。”“我只见过她一回。”“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询问从下午两点半持续到晚上七点一刻，女佣人的记忆霍然清晰起来，不仅回想起来了那女子的名字，而且讲出了她的年龄、住址、户籍号、祖宗三代以及种种别的情况。

晚上七点三十分，那姑娘出现在特派员面前，陪她来的父亲在大门外等候。九点钟，未来的婆婆在两名女人陪同下，闯进姑娘的家里，把一块手表、一串钥匙圈、一条领带、十二封信掷还给她，并要求马上把一只戒指、一对手镯、一条上教堂做弥撒时戴的纱巾和另外十二封信归还原主。她原本很快要当婆婆，现在也顾不得礼节，毫不客气地解除了儿子的婚约，并且恶狠狠地教训说：“您去找别的白痴吧。”她冷冷地说，她的儿子太不聪明，竟冒失地把自己的荣誉跟一个跟药剂师勾搭的女人联系在一起。老婆子的教谕激起姑娘的妈妈和闻讯赶来的亲友们的羞愧、愤怒

和痛苦。不等她们清醒过来向她反扑，她便在两名女人陪同下扬长而去了。刚走到大街上，她用故意让左邻右舍都听得见的声音嚷道：

“并非一切不幸都带来祸害，他们不是在我的儿子跟这个人家结亲以前把他宰了吗？”

老婆子显然是含沙射影地指药剂师，他一天当中第二次受到可悲的赞美。

三

特派员检查了医生开的一大堆处方和证明，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姑娘有个十一岁的弟弟，得了脑膜炎，至今仍留下了痴痴发呆、记忆模糊和语无伦次的后遗症；她频繁地出入药店，几乎完全是为着弟弟的治疗。她的父亲在乡村劳动，母亲从来深居简出，向医生请教治疗上的问题、上药店购买药品的任务，于是落到了她的头上，何况家庭里就数她最有文化教养，性格最开朗。特派员自然也传讯了她的父亲和原来的未婚夫，但这条破案线索终究就这样完结了。

特派员明白，姑娘还需要向整个小城，向它的七千名居民，向她的亲戚朋友，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可她刚被特派员放出来，亲友们一拥而上，硬是揪住了她，默默无语而又小心谨慎地揍了她一顿。

曼诺的遗孀黛莱莎·斯帕诺翻箱倒柜，把丈夫的全部照片找了出来，她想从中挑选一张作为制做镶嵌在墓碑上的青瓷肖像的样子。在每一张照片上，她都仿佛瞧见丈夫那张俊秀、宁静的脸庞具有了活力，嘴角流露出隐约可以觉察的冷笑，一双淡漠的、讥诮的眼睛熠熠放光。药剂师在这个家庭生活了十五年，向来以忠实的丈夫和模范的父亲著称，而今，他的模样变形了。黛莱莎在睡梦中也被猜忌所深深折磨，她眼前忽隐忽现地闪烁着无数面镜子，药剂师忽儿赤身裸体，像条蠕虫，忽儿缺腿断胳膊，像个木头模特儿，在镜子里显现。她猛然打了个寒颤，从睡梦中惊醒，赶忙下得床来，重新拿起照片，以疑惑的目光审视着丈夫的模样。

有时，她恍若听见凄然丧生的丈夫从死亡的国度回答她的问题，于是一切虚寂幻灭，失去了意义；但更多的时候，她却朦胧觉着，丈夫仍然健在人间，沉湎于寡廉鲜耻的生活。她的至亲好友，当初都谴责她跟药剂师相好，想方设法阻挠他们的婚事，如今自然是义愤填膺；相反，药剂师的亲朋好友对奢华的葬礼采取鄙夷不屑的态度，就像过去对他们这位朋友豪华富裕、怡然自得的生活敬而远之一样。他们喜欢用命运的观点来看待这场惨剧：你不是要改变地位，攫取财富和幸福吗？请看，痛苦、耻辱、死亡却迅雷闪电般先攫取了 you。

眼下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除去在谋杀现场寻觅到的一截香烟头——警方人士推测，这是凶手当中的一个，埋伏在那里久久地等候狩猎者时吸的卷烟，——但小城没有一个人不自以为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暗暗地揭开了或几乎揭开了谜底，或者自信掌握了解决这一疑案的钥匙。中学教员拉乌腊纳也掌握了一把钥匙：UNICUIQUE和他已经忘记的其他几个字，在曼诺的药店里，他借着侧面射来的台灯光，从匿名信的反面偶然地瞧见了这几个字。拉乌腊纳提醒宪兵队长也从反面念一念，但不知道他可曾这样做，或者，在侦查过程中，在警察局的实验室里，是否从各个方面好生研究了这封匿名信；在这一案件中，UNICUIQUE不能不是调研的关键。但他内心里并不相信他们会按照他提出的方式去研究匿名信，他们一旦研究以后也不会承认这一线索的重要性。某种虚荣心发生了作用，他几乎不希望别人去揭开如此显而易见的秘密；由于揭开这一秘密的道路上布满障碍，因此需要敏捷的、富有想象的思维。

这样，受虚荣心驱使，拉乌腊纳几乎违心地、不由自主地迈出了第一步。像每个晚上那样打报亭前经过的时候，他对卖报人说他要一份《罗马观察家》。卖报人不禁觉得奇怪，因为这位中

学教员是个远近驰名的——虽然未必名符其实——狂热的反教会主义者，另外，至少有二十年光景，从来不曾有人向他买这种报纸。他的回答不免使拉乌腊纳感到一阵窃喜：

“少说也有二十年了，我没有听说谁买《罗马观察家》。战争年代，有几个人读它，总共才来五份。后来，法西斯党支部书记上报亭来，威胁说，如果我不退掉《罗马观察家》，就要没收我的营业执照……谁发号施令，谁的话就是法律。您要处在这种地步，会怎么办呢？”

“像您所做的那样。”中学教员回答。

他暗自思忖，这么说来，压根儿不会有任何人上报亭来买《罗马观察家》，不过，宪兵队长也许已经掌握这一情况。需要向邮政局长或者邮递员打听。

邮政局长是个夸夸其谈、跟谁都乐意交朋友的人。从他嘴里探听消息实在不要花费什么气力。

“我眼下在写一篇关于曼佐尼^①的小东西。有人向我推荐半个月或许二十天以前《罗马观察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儿可有什么人订阅《罗马观察家》吗？”

当地人都知道中学教员常常写些评论文章，在杂志上发表，所以邮政局长不假思索，爽快地说——假若警察局已经派人来调查过此事，邮政局长肯定会吞吞吐吐或者满腹狐疑地回答问题——：

“总共才两家订户，一份是总司铎的，另外一份是圣安娜堂区神甫的。”

“天主教民主党支部订了吗？”

“没有。”

①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著名历史小说《约婚夫妇》的作者。

“它的书记呢？”

“也没有。总共才两份，您可放心。”邮政局长暗暗思量，这位教员如此追根究底，大概是缺乏跟神甫打交道的热情，便建议道，“您不妨上圣安娜堂区神甫那儿去，如果他有您需要的那期报纸，肯定会借给您的。”

拉乌腊纳欣然接受了邮政局长的指点。圣安娜教堂近在咫尺，教堂旁边是堂区神甫的宅邸。况且，他多少还算得上是神甫的知交，这位平日倜傥不羁的神甫，虽然不见容于他的上司，却深得民众的好感。

教员受到神甫的热情欢迎，向他说明了来访的用意，神甫很遗憾地表示，他的前任堂区神甫确实订了一份《罗马观察家》，他由于怠惰，也为了避免流言蜚语，一直没有退掉它，不过，至于说阅读这份报纸……

“我从来不读它，甚至从来不屑于翻一翻，我想，我的司铎每次都是原封不动地拿走的。您认识他吗？这是个年轻的司铎，长得骨瘦如柴，从来不正面瞧人一眼。一个白痴。而且是一名密探，他们安插在我身边，专门监视我的行动。他也许会读《罗马观察家》，甚至还可能保存着。如果您愿意，我给他挂个电话。”

“那太感谢您了。”

“请稍候片刻。”

堂区神甫随即拿起电话耳机，拨了号码。才交谈了几句，他忽然严厉地问道：

“你每天都给总司铎打小报告吗？”他向教员挤挤眼睛，傲慢地拨弄着听筒，从电话的另一头传来显然是表示否认的声音。

“可是，我都……不过，我现在不是为这件事打电话给你。你听着，你把我的《罗马观察家》偷去，派什么用场了？”电话里又传来一阵激烈的辩解的声音。教堂神甫猛然打断对方，“不，这

一次我是跟你开玩笑……告诉我，你怎么处理了？……都保存着吗？……太好了，太好了……稍等一下，我马上告诉你，我需要哪些天的；当然，我不需要，是我的一位朋友，中学教员……您需要哪几天的？”

“我很难准确地说出日期，只能说，我需要的文章在7月1日至8月15日之间的报纸上肯定可以找到。”

“好极了……你听着，7月1日至8月15日的报纸都保存着吗？……你需要查一查？好生检查一下，同时你留神注意在这些报纸当中可有关于曼佐尼的文章……仔细检查一遍，把结果打电话告诉我。”他放下电话筒，解释说，“让他去搜寻，如果他找到那篇文章，我会叫他明天上午送来。这样你可以避免跟他见面的不愉快。这家伙长得獐头鼠目，讨厌透了。”

“是吗？”

“请相信我，当你瞧见他站在你跟前的时候，需要一副强健的肠胃，才不至于呕吐。依我看来，他还是个奸淫狗盗之辈，您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我总是故意让他有机会到女孩子当中去厮混，从而得到嘲弄的乐趣……这可怜的家伙很不自在。他想报复。您晓得，我素来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对待生活……您听说过关于大主教调查司铎的年轻女佣人的笑话吗？没有？我这就叙述给您听，这一回，您可是从一个神甫那里听到关于别的神甫的笑话……好吧，言归正传：有一次，有人向大主教禀告，说小城有一个神甫不仅雇了一个比教区会议规定的年龄要年轻得多的女佣人——像曼佐尼所说，*lupus in fabula* ①——而且跟她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大主教听了当然勃然大怒，立即去找那神甫，先闯进他的住宅，果然瞧见了一个娇艳动人的年轻女佣人，又进入他的卧室，

① 拉丁语：意为童话里的狼。

瞧见一张比双人床还略大点的绣榻。他把神甫狠狠地教训了一番。神甫却若无其事地说：

“‘是的，大人，她睡在床的外侧，我瞧在床的里侧，可是，正如您现在亲眼见到的，在这张床正中，我做了两个枢轴，每个晚上睡觉以前，我就把这块又大又粗的木板安在枢轴上，好似筑起一道墙壁。’他把那厚木板指给大主教看。

“大主教顿时怒气全消，心中不觉对神甫纤尘不染的纯洁啧啧称赏。他回忆起中世纪的圣徒们，他们跟女人一起睡觉的时候，在床当中摆上一个十字架或者一柄佩剑。于是他和颜悦色地说：

“‘我的孩子，木板我是瞧见了，一点儿不假，这是谨慎的预防措施；不过，假如欲念，我是说罪恶的欲念，像狂风暴雨般侵袭你，像凶狠的恶魔俘虏了你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对待呢？’

“‘啊，大人’神甫回答道，‘那也不用费什么事，只消把木板掀掉就是了。’”

堂区神甫又讲了另外两个笑话，他的司铎这才打电话来，说他已经查了《罗马观察家》，从7月1日到8月15日都完整无缺，但没有找到关于曼佐尼的文章。

“很遗憾。”堂区神甫说，“很可能他没有仔细检查。我方才对您说过，这是个白痴。为了保险起见，或许还是您亲自走一趟。要不，我告诉他，让他把所有的报纸都送到这儿来？”

“不，谢谢，那太打扰您了。另外，这篇文章对于我也不是必要的。”

“我确信这一点，好几个世纪以来，必要的这个观念我们已经丧失殆尽……另外，关于曼佐尼，不难想象一个基督教徒关于曼佐尼会写些什么？今天只有一个自由主义者，名符其实的，按这个字眼的本来意义的自由主义者，方能理解和热爱曼佐尼。”

“但是，就曼佐尼而言，基督教徒写的某些文章，倒也不乏

启发价值。”

“我很熟悉这类文章，什么神明显示奇迹，赐福于人啦，什么小说的风景描写啦，把曼佐尼与维吉尔比较啦……嗨，提到这些，恕我直言，整个曼佐尼批评全被基督教徒垄断了。除去个别的批评家例外，说实话也不是什么才华过人的……您知道，当他们触及事情的本质，触及爱情问题，触及最棘手的问题时，就……算了，不谈这些……现在我想请您欣赏一件东西，因为我晓得，您是一位行家。”

他走到壁橱跟前，打开橱门，从里面取出一件约摸手掌那样高的圣洛科^①雕像。

“您瞧，栩栩如生的神态，精巧细致的镂刻……您可知道我怎么弄到手的吗？我的一个朋友，附近市镇的堂区神甫，把它当作一件废品扔在圣器室的墙旮旯里。我给他买了个崭新漂亮的圣洛科像，比这个大得多，是用硬板纸、树脂制做的。他把我当作见了古玩就头脑发热的狂人，以致在交换的时候他反倒犹豫不决了，生怕占了这么大的便宜。”

堂区神甫是个艺术品鉴赏家，一向以眼光敏锐、贪婪势利闻名；他时常同来自巴勒莫的某个古董商做着有利可图的交易，这也已不是一个秘密。他让拉乌腊纳从不同的侧面欣赏他的圣洛科像，说道：

“我已经给人看了，有人愿意出三十万里拉的高价；不过，眼下我想放在手头再稍许欣赏一番，反正它迟早要落入不知道哪一个国库的窃贼家里……您的看法呢？十六世纪上半叶的珍品，不是吗？”

“我看是的。”

① 意大利人免除瘟疫的庇护神。

“德·伦兹斯教授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是研究十五、十六世纪西西里雕塑的权威……只是他的意见，”堂区神甫忽然捧腹大笑，“总是跟我的意见一致，因为我付给他报酬。”

“您似乎对一切都不信赖。”拉乌腊纳说。

“噢，是的，但也信赖某些东西。韶华流逝，或许我寄予过多的信赖了。”

当地流传着一个也许确有其事的笑话，说堂区神甫有一次做弥撒，他正要打开圣体盒，偏偏钥匙卡在盒子的锁孔里了；他气急败坏地转动着钥匙，禁不住对圣体盒咒骂起来：“什么恶魔在里面捣鬼？”说实在的，他对于教会的事务总是临时抱佛脚，敷衍了事，而把时间都消耗在做买卖和走私上。

“请原谅，可是我不明白……”中学教员说道。

“为什么我要穿上这件黑长袍？……可以对您直说，我穿上它完全是违背我的本意。也许您已经知道我的身世：我的叔父，原先也是这里的堂区神甫，他靠着放高利贷，聚敛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他把全部家产遗留给了我，但有一个条件，我长大了也必须当神甫。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才年满三岁。十岁那年，我进了神学校，俨然觉得自己就是圣路易吉；到二十二岁离开神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成了撒旦的化身。我当时真恨不得把一切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可是那份遗产，还有我的母亲，捆住了我的手脚。如今叔父遗留给我的家业已无法打动我的心，我的母亲也已与世长辞；我可以飘然而去……”

“但宗教教规不允许。”

“就我的情况而言，手里有一份我叔父的遗嘱，宗教教规也奈何我不得：我完全是被迫当神甫的，他们会让我远走高飞，而不褫夺我的公民权利……不过问题在于，穿上这件黑长袍现在我倒觉得十分怡然自得，我在安乐与憎恶之间获得了平衡和至善，

获得了生活的全部价值……”

“那您会遇上什么风险吗？”

“不，绝对不会。假若他们胆敢动我一根毫毛，我便制造一起事端，闹他个不可开交，甚至连《真理报》特派记者也会闻风而来，至少呆在这里采访个把月。我说什么来了，一起事端？不，一连串事端，像烟火那样叫人头晕目眩……”

愉快的谈话几乎持续到深夜，拉乌腊纳这才起身告辞。他离开圣安娜堂区神甫宅邸的时候，心里油然而产生了对神甫的好感。

“西西里，或许整个意大利，有多少这等可爱的人啊，”他自言自语道，“可他们都注定要遭逢凶险。”

至于说UNICUIQUE，拉乌腊纳心里有了底，它不是来自圣安娜堂区神甫的那份报纸。事情已经多少有了眉目。

四

隆重的葬礼已经过去了三天，拉乌腊纳觉得现在去拜访总司铎卢塞洛，不再是失礼的行为；他需要向总司铎求借7月1日至8月15日间登载了评论曼佐尼文章的那份《罗马观察家》，这是进行下一步工作必不可少的。总司铎是罗西奥太太的伯父；他有过一个依靠庞大的不动产维持的大家庭，二十年以前，他的两个结了婚的弟弟带着他们的家眷跟他生活在一起，十二口人和衷共济，相敬如宾，外加总司铎，他们的家长和精神上的导师；罗西奥太太从小在这个家庭里长大，直到结婚方才离开，所以被总司铎视为掌上明珠。后来，死亡和婚嫁使大家庭成员减少了九名，只留下了四个人：总司铎、两位弟媳，一直过着独身生活的侄子——卢塞洛律师。

总司铎正在圣器室里脱下做弥撒穿的祭衣。他异常高兴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寒暄了十来分钟，便谈起那桩残暴的凶杀案，已故的罗西奥大夫温顺、高尚的品格，他的遗孀的无可慰藉的痛苦。

“可怕的凶杀。而且是如此诡秘，如此不可思议。”拉乌腊纳说道。

“倒也不尽然。”总司铎回答。他沉吟片刻，接着说，“您想一想，那可怜的药剂师有他不可告人的隐私；不错，别人都被蒙在鼓里。可他受到警告在先，遭到暗杀于后，这是复仇行动的典型做法。我的侄女婿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您这样认为吗？”

“岂能有别的缘故呢？业已调查证实，那个药剂师从来不曾出于私利跟谁闹翻过。除去风流韵事，实在没有别的什么原因了。某个父亲，某个兄弟，某个未婚夫，突然蒙受耻辱，自然怒火中烧，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不过，他们的愤怒是多么狂暴，竟然没有瞧见，这中间还夹了一个无辜者……”

“很可能是如此，但这未必是真实。”

“真实？亲爱的教师，天主才是唯一的真实，还有死亡。很清楚，毫无什么真实可言。不过接近真实的因素还是存在的。首先，匿名信警告，药剂师将因恶德败行而付出自己的生命；信中没有提及什么样的恶德败行，但写信人推想，尽管那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但它立即会在当事人的脑海里浮现出来，或者当事人会由远及近，把它跟眼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其次，正像您很清楚地知道的，因为有人告诉我，您当时也在场，假若药剂师不愿意向当局报案，那至少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告发会把对于他不很光彩的某些事情也一古脑儿抖落出来，至少怀疑他还有别的隐私。再说，在药剂师家里，夫妻生活并不完全是和睦安宁的。”

“我不晓得……但我想表示一点儿不同看法。首先，药剂师接到的是直言不讳、明目张胆的威胁，他怎么反应的呢？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出门去打猎，从而为他的敌人提供了把威胁变为事实的最好机缘。他没有认真看待匿名信的威胁，误以为它是一个恶作剧。这是真实的情况；显而易见，他的恶德败行，无论是过去的或者现在的，都无从谈起。或者更准确点儿说，鉴于威胁是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实现的，所以不妨认为，我们所说的过错是药剂师很久很久以前犯下的，它已经那么模糊，以至这一突如其来的、迟到的报复竟令人难以置信。还不妨认为，药剂师无意之中犯下了这一过失，某些言语、举止，总而言之，某些他未曾予

以重视的事情，却在一个病态的、忧伤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创伤。其次，大凡看到这封匿名信的人，谁都不曾觉得需要认真对待它。没有一个人！这是一个小城，任何私通，不管是多么秘密；任何恶行，不管是何等隐蔽，都很难逃过人们的耳目……至于说他不愿意告发，这是确实的，但这正是他和朋友们把匿名信视为恶作剧的结果。”

“您也许言之有理。”总司铎说。但他坚定的目光却让人明白，他仍然固执己见。尔后，他祈求道，“我的主，愿你的光辉昭示真理，赐予正义，免除复仇。”

“但愿如此。”拉乌腊纳用这句话代替“阿门”。他随后说明了登门打扰的原因。

“《罗马观察家》嘛，”总司铎欣喜地说，一个不信教的人居然需要这份报纸，他感到高兴。“是的，我有，也时常读它；至于说保存……通常我只保存《基督教文明》、《生活与思想》^①，报纸随意处理了……圣器看管人按时去取邮件，给我送到这儿来，然后我把私人信件和报纸带到家里。报纸经我读过之后，可以说便成了生活用品：《罗马观察家》、《人民报》^②……你瞧，”他从一堆邮件中拣出一份《罗马观察家》，“我现在带回家去，午饭以后读报，我的侄女们或者女仆晚上就把它拿走，去包什么东西或者点炉子。当然，教皇的通牒、讲话和通谕属于例外。”

“我明白了。”

“如果这一份，前天的，您需要的话……”总司铎把一张对折成八叠的报纸递过来，“我只要在这里浏览一下就够了……说实在的，我现在报纸也顾不上读，最近一个星期我忙得简直喘不

① 宗教杂志。

② 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机关报。

过气来……”

拉乌腊纳打开报纸，顿时被报头迷惑住了。那熟悉的UNICUIQUE几个大字赫然在目，跟他透过匿名信背面看见的一模一样。UNICUIQUE SUUM，各得其所。异常精致的印刷体，字母Q拖着一条优雅的新月形尾巴。还有两把交叉的钥匙、教皇三重冠和一行同样的字体：NON PRAEVALEBUNT^①。各得其所，莫非药剂师曼诺和罗西奥大夫就是各得其所。在UNICUIQUE后边，那双残害了两条生命的手，又剪取了什么字，贴在信纸上的呢？“处以”？“死亡”？很遗憾，他当时未能多瞧上一眼匿名信，如今它已收入法院的卷宗，成为秘密了。

“不必客气，”总司铎说，“如果这份报纸您用得着，就拿去吧。”

“您说？……啊，是的，谢谢。可是，不麻烦您了，我也用不着。”拉乌腊纳把报纸放在桌子上，站起身来。他神色激动不安，圣器室里破烂的木料、凋零的花朵和点燃的蜡烛散发出来的气味，蓦然使他心里起了一阵无法忍受的憎厌的感觉。“非常感谢您。”他说，一面伸出手来。

“再见。欢迎您时常光临。”总司铎以一种对待迷途者的慈爱紧握他的手。

“非常乐意。”拉乌腊纳回答。

他走出圣器室，穿过阒无声息的教堂。他慢吞吞地在没有一丝绿荫的广场上行走，不禁暗暗叹赏，呆在教堂和圣器室里是何等地舒适自在，他想起圣安娜堂区神甫和总司铎，歆羡又转化为讥诮。是的，他们的生活确实舒适自在，各得其所。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是大相径庭，其实骨子里却是一个样儿。他的思

^① 拉丁语，意为不可超越。

绪在脑子里翻滚，某种微妙的自尊心不自觉地支配着他的意识，阻止他去想失望和挫折。但失望和挫折是明摆着的：粘在匿名信上的UNICUIQUE这个字究竟是从哪份《罗马观察家》上剪下来的，它从总司铎家又落到了什么人的手里，看来是无法调查清楚了；因为，他不假思索地认定，总司铎、他的两个弟媳、侄儿、女仆，是压根儿不可能卷入这件事的。从这个家庭对总司铎读过的报纸的使用情况看，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就像圣安娜教堂的司铎一样，会去搜集它；很可能作为什么包装纸，那一期报纸，或它的一部分，落入了匿名信的作者即凶手手中。更不用说，在西西里首府，各个报亭和其他地方到处都有《罗马观察家》出售，匿名信作者出于明确的图谋或者偶然的机会，都可以买到。

这么说来，警方对UNICUIQUE这个字未予理会，是明智的做法了。经验发挥了作用，这是没什么可说的。大海捞针，而且是一枚没有针眼的针，它无法穿起调查的线索，这岂不是徒然耗费时间？而他却被这一细节迷住了心窍。整个小城只有两家订户的一份报纸，分明是一个确凿无疑的线索，通向调查破案的康庄大道，不料却把他引到了一条死胡同。

不过，此时正为在现场捡到的一根香烟头忙得团团转的警方，也没有碰到更好的运气。业已查明，这是一支布朗卡牌香烟；但小城只有市长秘书吸它，他自然是被排除一切嫌疑的，何况他是外地人，六个月以前才定居本地。

“《罗马观察家》跟布朗卡牌香烟一样棘手。”拉乌腊纳自言自语道，“让警察局去为那根香烟头绞尽脑汁吧，你就休再过问《罗马观察家》了。”回到家里，乘母亲给他准备午饭的时候，他在一张纸片上作了简单的笔记：

“匿名信作者从《罗马观察家》上剪下了他需要的字句：

a. 他出于深谋远虑，在巴勒莫购买了报纸，以求把调查引入歧

途；

b. 报纸是他极其偶然地获得的，他甚至没有注意这是一份什么报纸；

c. 他经常跟这份报纸打交道，以致把它视为一份普通的报纸，没有考虑到它的印刷特征和有限的、几乎是限于特定范围的发行。”

他放下笔，把笔记从头读了一遍，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纸片撕碎。

五

保罗·拉乌腊纳是巴勒莫一家高级中学的历史兼意大利语文教员。学生们一致公认，他举止怪僻，但精明能干；家长们却觉得，他精明能干，但举止怪僻。学生和家长们所说的举止怪僻，是指他阴沉、恬淡，几乎是清心寡欲的一种古怪性格，但尚未达到性子乖戾的地步。他的这种怪僻，大大减轻了他的才华在学生心目中的分量，妨碍家长们以恰当的方式发现他的公正无私，而不是为人宽厚的品格——他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考试落第的。他温文尔雅，甚至谦卑羞怯，说起话来几乎结结巴巴。当别人向他陈述意见的时候，他全神贯注，仿佛十分重视。如今人们才明白，他的温文尔雅掩盖着不可动摇的决心，顽固的主见；别人的意见从他的一只耳朵进去，随即从另一只耳朵出来。

整整一个学年，他的生活就是在首府和小城之间奔波：早晨七点钟，搭乘公共汽车离开，中午两点，搭乘另一班车返回。下午，是他读书和研究的时间；俱乐部和药店是他晚上光顾的场所，一直呆到将近八点钟回家。他不愿开设私人补习班，即使夏天也不例外，因为暑假里他更乐意埋头写作文学批评文章，然后在当地人谁也不阅读的什么杂志上发表。

他为人正派，但学究气十足，心情悒郁；很难说他才华过人，相反，他有时还显露出值得称许的愚钝；他晓得自己有焦躁不安和官能失调的毛病，并且暗暗责备自己；在学校里，他的良好教养和仁慈心肠使他觉得跟同事们处处难以合拍，文化人在这种环境里很容易洁身自好，离群索居，这就铸成了隐藏在他内心深处

的傲慢与自负，对于这一点，他是不乏自知之明的。在政治上，大家都把他当作共产党员，其实他并不是。至于他的个人生活，人们众口一词地说，他是母亲过分的宠爱和关心的牺牲品，这是千真万确的。快四十岁的男人了，他对某些女学生或女同事的好感和爱慕还只是闷在心底里，胡乱折腾自己，他钟爱的对象对此毫无察觉或者仅有极细微的察觉；只消某个姑娘或女同事对他的热望投之青睐，他立即惊慌失措起来，心头发凉。他一想到母亲，想到她可能说些什么，会对他选择的女人采取什么态度，想到她们两个人可能要生活在一起，其中的一个可能拒绝跟另外一个共处，他那情感的火焰瞬息之间也就熄灭了，于是他远远地躲开他追求的对象，仿佛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灾难之后，终于得到了解脱，心安理得了。假若他的母亲替他物色一个女子，他或许会闭上眼睛，驯服地跟她结婚，但他是如此天真未泯，对人世间的阴谋诡计如此不加防范，因此，在他母亲看来，时至今日，他还不可迈出人生道路上如此危险的一步。

这种性格，这种生活环境，自然使拉乌腊纳孤身只影。他有许多熟人，但没有一个知交。譬如说，他和罗西奥大夫是初中和高中时代的同学，大学毕业以后又都在这个小城工作，但不能说他们是知心朋友。他们在药店、俱乐部相遇，聊天，一起追忆中学时代的某个同窗或某件轶事。有时，他母亲偶染微恙或抑郁不舒，他便请大夫上家里来；罗西奥细心诊断老太太的病情，开好药方，尔后留下来喝一杯咖啡，回忆某些昔日的老师或同学，自从中学分手以后，这些老师与同学就杳无音信，如今身在何处，做什么工作，他们全不知道。罗西奥大夫替他母亲看病从来不取分文；但每年圣诞节拉乌腊纳都赠送他一本精致的书，因为罗西奥是多少读点书的人。不过，他们之间谈不上深情厚谊，仅仅有对往事的共同回忆，谈论起文学或政治事件来虽然观点不尽相同，却没

有令人不愉快的分歧；在当地，跟其他人是无法建立这种关系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包括那些自诩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员的人。因此，罗西奥大夫猝然身亡，使他特别感到震惊，尤其是瞧见他的尸体以后，一阵痛苦与落寞的感觉，不由涌上了心头。

死亡把硫磺似的惨淡的面具罩在罗西奥的脸上，在鲜花的芬芳、蜡烛的氤氲和蒸郁的汗味混杂的沉闷、污浊的空气中，这副面具慢慢地僵硬了。他似乎缓慢地化作了一具顽石，在石块的底下，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满怀凄怆的惊愕，他要挣脱这坚实的表层的悲愤的挣扎。相反，死亡赋予药剂师一种沉思的庄重的威严，这是任何人在他生前都未曾见到过的。死亡也会嘲弄人。

这些外界因素——一位相识者的猝然身亡，虽然他们更多地由习惯而非友谊联系在一起；头一回目睹令人毛骨悚然的凶杀现场，虽然他曾经见过许多尸体和其他形式的死亡；药店大门上举哀的黑色条幅，俨然是药店永远封闭的标记——压迫着他，使他体验到一种几乎是孤寂凄凉的心境，他不时地感觉到他的心一阵阵剧烈悸动或停止跳动的绞痛。但他不理睬这种心境，或者至少自信没有理会，他的纯系理智范围、并且被吹毛求疵的习性推动的窥探事物的好奇心，驱使他全神贯注于探索制造这起惨案的缘由和手段。他现在仿佛置身于一座客厅或一家俱乐部里，听到有人提出一道只有白痴才会提出——更糟糕的是，——才会去解决的难题，对于这班平庸的、无所事事的人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游戏，是虚掷光阴，然而，他觉得他有义务去解决它，他硬是发奋要去揭开这个谜底。

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解决这一难题，必然意味着向警方提供罪犯的确凿材料，这是毫无疑义的。他是一个颇有才智、富有教养的人，秉性善良，遵法守纪；假若他有自知之明，晓得他这样

行事实是在是掠人之美，侵犯警察局的职责，或者晓得他的所作所为是同警方的侦查工作进行竞争，那他会感到厌恶，从而心甘情愿地认输的。

这样，平时胆小羞怯，喜欢沉思默想，也许谈不上果敢坚强的拉乌腊纳，开始玩起了他的危险的牌。晚上，俱乐部里几乎座无虚席。人们像每个晚上一样，谈论着那件凶杀案。向来罕言寡语的拉乌腊纳突然开口说：

“那匿名信是把从《罗马观察家》上剪下来的字，粘在信纸上，拼凑起来的。”

七嘴八舌的争论停止了，众人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你听我讲！”稍停片刻，路易吉·科尔瓦亚说。他大吃一惊，倒不是由于受到方才揭露的线索的震动，而是因为揭发者过于天真无邪，竟自个儿去充当警方和凶手两面夹攻的目标。这实在是咄咄怪事。

“是真的吗？……可你，对不起，怎么会知道的呢？”罗西奥太太的堂兄卢塞洛律师问道。

“宪兵队长向药剂师口述报告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一点；你们兴许记得，我跟他们一起走进药店的。”

“您把这一发现告诉宪兵队长了吗？”公证人佩科利拉发问。

“是的，我对他说，请他仔细地研究一下信件……他回答说，他会这样做的。”

“不妨这样推测，他们并没有仔细研究，”路易吉接过话碴，他稍稍松了一口气，又有点儿扫兴，这一揭发还不至于构成对拉乌腊纳十分严重的危险。

“很奇怪，宪兵队长一点儿也没有向我透露。”卢塞洛说道：

“也许这是毫无价值的线索。”邮政局长插话。尔后，他脸上透出兴奋的光彩，对拉乌腊纳说，“莫非你就是为此目的向我

打听……？”

“不！”拉乌腊纳打断他的话。

退休上校萨尔瓦乔神色庄重地站起身来，朝卢塞洛走去；每当有人胆敢以某种方式对军队、宪兵、警察表示怀疑、批评，或者产生误解，他便立即气冲冲地跳起来。

“劳驾您给我解释一下，宪兵队长为什么应该把有关这个或其他线索的情况告诉您？”

“我是受害者之一的亲属，我的天哪！仅仅是亲属。”卢塞洛慌忙回答。

“嘿！”上校得意地哼了一声，他起先认为，卢塞洛是自持具有某种身份而要求知道宪兵队长的报告。但他又不完全满足，随即展开了新的攻势：“不过，我应该提醒您注意，即便是对于被害者的亲属，宪兵队长也不得泄露正在进行的侦查工作的秘密。他不能够也无权这样做；假若他如此行事了，那就是严重地，我说是严重地背弃他的基本职责……”

“我明白，”卢塞洛说，“我明白……我这么说，只是出于友情……”

“军人不讲友情。”上校几乎吼了起来。

“但宪兵队长是懂得友情的。”卢塞洛恼火了。

“宪兵队长是军人，上校们是军人，士兵们是军人……”上校像神经错乱似的说着呓语，他的脑袋开始颤动起来，俱乐部成员都很熟悉，这是他的老毛病发作的征兆。

卢塞洛站立起来，向拉乌腊纳做了个手势，表示有话要跟他谈；两个人一起走了。

“老不死的疯子！”刚走出俱乐部，卢塞洛律师便愤愤骂道。稍停片刻，他说：“请告诉我，关于《罗马观察家》的那个发现，到底是怎么回事？”

六

自从拉乌腊纳在俱乐部吐露了他发现的线索以后，一切都很平静。他并没有期待什么事情发生，他本来只希望观察一下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反应，不料杀出了个上校，把他的计划全都搅乱了。卢塞洛律师对他的调查活动表示出热情的关切，这是他此举的唯一收获。萨尔瓦乔上校假若知道这件事，肯定会大动肝火的；好在他的调查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进展，人们仍然怀疑药剂师暗地里搞的风流勾当是凶杀案的起因。

拉乌腊纳虽然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但他揣悟到，他需要从俱乐部的成员，尤其是那些经常光顾药店的人那里，揭开某些事情的底蕴。有一个事实是确凿无疑的：狩猎季节开始的那一天，猎人们为了捷足先登，垄断某片野禽资源丰富的狩猎地，通常无不对他们将要去的地点严加保密。这是当地的传统。唯有结伴去打猎的人才知道这个秘密；这么说来，在这一案件中，唯有药剂师曼诺和罗西奥大夫是这一秘密的知情者。只在极其希罕的情况下，才会把打猎的地点秘密地告诉第三者。而且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狩猎人故意把假情报透露出去。因此，即便有人从曼诺或罗西奥那里得到消息，也不敢肯定这不是通常使用的声东击西之计。心腹之交，而且不以狩猎为嗜好的朋友，也许是例外；或许，只有对一位正派、可靠、甘苦与共、对狩猎兴趣索然的朋友，他们两个人其中的一个才会告诉狩猎季节开始日他们去打猎的地点。

拉乌腊纳陪伴他的母亲登门拜访了药剂师和医生的遗孀，想

借此机会作一番小小的调查。他向两位寡妇分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您的丈夫可曾告诉您，狩猎季节开始那天他决定上哪儿去打猎？”

“临到出门的时候，他才告诉我，可能上卡纳泰洛去。”曼诺的妻子回答说。

“可能”两个字立即印入了拉乌腊纳的脑子，他觉得，直到出发的时候，药剂师还不愿意向妻子泄露秘密。

“他跟您谈及匿名信了吗？”

“没有。他在我面前避免谈这些事。”

“他不愿意您为此受惊。”

“是的。”寡妇以自我解嘲的沉思，生硬地说。

“另外，他认为这是个恶作剧，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一个恶作剧！”寡妇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这个恶作剧叫他丢掉了性命，让我丢尽了脸面。”

“是的，使他丢掉了性命，很遗憾……可您，跟您有什么相干？”

“跟我有什么相干？您没有听说街头巷尾都纷纷议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吗？”

“流言蜚语。”拉乌腊纳老太太说，“只要是有点仁慈心肠和理智的人，都不会理睬这些流言蜚语的。”可她也不是有着过分慈悲心肠的人。“不过，您可曾发现过您丈夫的形迹可疑之处？”

“没有，太太，从来没有……他们让我的女佣人编造了一通仿佛我跟一个女子争风吃醋，因此忌恨我的丈夫的鬼话，……其实那可怜的女子上药店来完全是为她的弟弟……，您知道，我的女佣人是个愚昧无知的糊涂虫，只要听到人家谈起宪兵，便浑身

直打哆嗦……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她逼供……罗西奥、卢塞洛家的那些人……还有那位圣人总司铎，他也……他们马上传播流言，说罗西奥大夫——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是我丈夫的罪过的牺牲品。仿佛这里的人都互不相识，都不清楚每个人的底细似的，其实，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他是否囤积居奇，是否巧取豪夺，是否……”她忽然用手掌捂住嘴唇，不让自己讲出更加尖锐的言词来。沉吟了片刻，她方叹了一口气，狡黠而审慎地说：“可怜的罗西奥大夫，他竟钻进了什么样的一个窝啊！”

“我倒没有觉得……”拉乌腊纳说。

“请相信我，我们彼此都很了解。”曼诺太太打断了他的话，“您，谁都知道，是个埋头钻研书本和学问的人。”她几乎表露了鄙视的神气，“您没有时间去过问某些事情，去了解某些事情，但我们，”她转向拉乌腊纳的母亲，好像征求同意似的，“我们是很清楚的……”

“是的，我们很清楚。”老太太表示赞同。

“而且，我跟罗西奥大夫的妻子露依莎还是寄宿学校的同学……真是个人物！”

眼下，这个人物——曼诺太太追忆了她在寄宿学校里的矫揉造作——就站在拉乌腊纳的面前，好似他敬重的一个修女。光线透过守孝的屋子里厚厚的窗幔，把昏暗的阴影投照到她的身上。处处都是服丧的标记，连穿衣镜也披上了黑纱，一幅跟人一般大的罗西奥遗像，愈发加重了室内的悲哀气氛。这幅遗像是由巴勒莫的一位摄影师放大的，又经他用阴暗的色彩加以修整，衣饰和领带都描成了黑色，因为依照摄影师的社会观和审美感，他放大的照片上的人物既然已经死去，就必须具有令人悲悯的特征，于是罗西奥的嘴角增添了凄苦的皱纹，眼睛里流露出倦乏的、哀求的神情，在遗像前面一盏小灯发出的幽光里，他好像是一个勾画

了脸谱、扮演幽灵角色的小丑。

“不知道，他从来不告诉我。”当拉乌腊纳询问她是否知道丈夫去打猎的地点时，露依莎·罗西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说实在话，我对他打猎的嗜好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挑选的同伴也不称我的心意……我并非一无所知，我的主！或许有一种预感，一种印象……不幸的是，厄运证实了我的敏感是正确的。”她满怀伤感地叹息，几乎像发出低低的呻吟，用手绢拭擦泪水。

“这是命运。人有什么办法来反抗命运呢？”拉乌腊纳老太太安慰说。

“噢，是的，命运……可您叫我怎么办呢？每当我思念起过去如此安宁、幸福的日子，无忧无虑，事事如意……我就，请主原谅我，我就悲痛欲绝……”她默默地掩面涕泣，几乎哽咽起来。

“不，不，不……”老太太忙不迭地连声劝慰她，“不要失望，您要奉行天主的意愿，把您的痛苦向天主倾诉……”

“事奉圣心，我的伯父总司铎也这么对我说的……您瞧，他给我带来了多好的圣心像！”她指着拉乌腊纳母亲身后的一幅画说。

老太太转过身来，赶紧挪开椅子，仿佛她刚才失礼了，又向圣像送去一个飞吻，嘴里念念有词地低语“耶稣圣心”，尔后说道：

“好，确实是极好的圣心像。您瞧他的眼神！”

“它给予我安慰。”

“所以说，天主给予了您安慰，不是吗？”老太太以温柔而得意的声调说，“另外，您现在和将来都会得到别的安慰，别的希望：您有一个女孩，您应该也念着孩子……”

“是的。请相信我，如果我不念着孩子，我不晓得我会变成什么样的疯子。”

“孩子都知道了吗？”老太太迟疑了片刻，问道。

“她什么也不知道，可怜的女儿，什么也不知道。我告诉她，爸爸出门旅行去了，很快要回来的……”

“可她看到您穿着一身黑衣服，没有问起什么缘故，也不想知道吗？”

“什么也没有问。相反，她对我说，我穿一身黑衣服反倒比平时漂亮了，最好我永远这样穿着……”她用右手攥着的一方镶了黑边的素白手绢掩住面颊，几乎号啕大哭起来，她的左手赶紧把裙子的褶边往下拉扯，但拉乌腊纳瞥见，裙子又马上缩到了大腿的上边。“是的，是这样，我只能永远穿一身黑衣服，永远……”她抽抽噎噎地说。

“那孩子说得有道理。”拉乌腊纳暗暗思忖。这是一个俏丽的女人，一身黑装使她出脱得愈发娇媚可人。她的身材很美，丰腴而不失苗条，她愈是做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便愈显出婀娜倩巧的慵怠之美。她的脸圆圆的，但与其说具有一个三十来岁女人的丰满，倒不如说透露着少女般的润泽，一双栗褐色的眼睛，泛出几乎金闪闪的光亮，宽宽的嘴唇里是两排洁白明亮的牙齿。

“我真想瞧见她微笑的神态。”在那样的气氛里，他的母亲又挑起了那样的话题，要期待这样的奇迹，看来是要失望的。可是当话题转到药剂师身上，谈及人们关于他的风流韵事的流言时，奇迹竟然出现了。

“您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可怜的曼诺夫人从来不是一个美人儿。我们一起在寄宿学校念过书，她当时也是貌不惊人，也许比现在还要难看。”她嫣然一笑，尔后，立即沉下脸色，说道，

“可我的丈夫跟这有什么相干呢？”她又用手绢掩面涕泣起来。

七

许多人如饥似渴地阅读的那些侦探小说，全都一致断言，一件谋杀案犹如一幅图画，假若对它的具体的、或者说所谓艺术的因素，进行细致入微的发掘和分析，调查人员便可从中获得追根究底的可靠保证。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事情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侦查工作的失误和罪犯逍遥法外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倒不是由于，或者说不仅仅由于或并非始终由于侦查人员智能低下的缘故，而是因为谋杀案件提供的因素，通常是绝对不充分的。不妨说，谋杀案的凶手或组织者处心积虑要把侦查工作引向失败的歧途。

导致案件侦破的种种因素，往往带有神秘的色彩，或者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意外收获，譬如暗中活动的所谓职业探子，匿名者的告密，偶然的机缘。仅仅在很微小的程度上归功于侦查者的敏捷才智。

对于拉乌腊纳来说，这偶然的机缘，终于在9月里，在巴勒莫突然出现了。

几天以前，拉乌腊纳到巴勒莫一所高级中学当监考员。在一家他经常光顾的餐厅里，他跟同窗多年的一位学友邂逅相遇。他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但拉乌腊纳一直远远地注视着他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这位同窗是共产党员，起先担任马多尼亚市镇的支部书记，后来当上了西西里大区议员，现在是国会议员。他们自然一起回忆了大学时代的生活，当话题转到可怜的罗西奥的时候，议员轻声叹息，说道：

“他逝世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因为就在半个月或二十天以

前他还来看过我呢。至少有十年光景我没有见到他了。他到罗马，上众议院找我。他的样子没有一丁点儿的变化，我立刻认出了他……是的，我们或许多少……后来，我揣测，他的死可能跟他上罗马找我有关系；可我听说，调查的结果证实，他遇害的真正原因是跟一个勾引少女的人厮混在一起。我也闹糊涂了……您可晓得，他为什么来找我吗？他想当面问问我，我可愿意在议会，在我们的党报上，在公众集会上，揭发你们小城的一个权势人物，他说，此人把偌大的一个省玩弄于股掌之上，讹诈敲索，收赃纳贿，经营走私，无所不为……”

“我们小城的人？当真？”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我觉得他并没有明确地对我说，此人是你们小城的，也许是他给我这样的暗示，也许这是我的印象……”

“一个权势人物，操纵着全省命运的要人？”

“是的，这一点我记得很确切，他正是这么告诉我的……我理所当然地回答他说，我将很乐意把此类寡廉鲜耻的事公之于世，揭露这样一桩丑闻；不过，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对于这等事情，我需要某种证据，需要确凿的材料……他告诉我，他掌握了全部必要的文字材料，准备给我送来……可他却从此离开了人世。”

“这是很自然的。”

“是的，很自然的，因为他就此断送了性命。”

“我很难说什么，但我想，你对他的罗马之行与他的遇害之间关系的怀疑……我记得，当时约摸有两天的时间没有见到他，过后他告诉我说，他上巴勒莫去找他的父亲了……罗西奥打算揭发什么人，而且还掌握了文字材料，我以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你确信他是罗西奥吗？”

“我的天哪！”议员慨然说道，“我方才跟你讲了，我立刻

认出了他，他的样子没有一丁点儿的变化……”

“是的，他确实没有变……不过，他可曾把他打算揭发的那个要人的名字告诉你？”

“没有，绝对没有。”

“连一点儿含蓄的提示或某些细节也没有对你说吗？”

“丝毫没有。相反，我曾经坚持要知道更多的情况，他回答说，这是一件极其微妙的事情，牵涉到私人的……”

“私人的？”

“牵涉到私人的……他要么把文字材料带来，向我和盘托出，要么就此收场……坦白地告诉你，当我听到他说，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是把全部真情告诉我呢，还是什么都不说，我真有点儿不痛快……我有这样的印象，他的罗马之行，他掌握的那些文件，都是正在玩弄的讹诈手段：假若事情进展顺利，那一切就此了结，假若遇到了麻烦，他便会携带全部材料，再来找我……”

“不对，他这个人不会搞讹诈的，绝对不会。”

“那你如何解释他的这种行为呢？”

“我说不上来，这件事蹊跷得很，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请原谅，同样蹊跷的是，你竟然不晓得他在筹划对某个人的控告，你不晓得他要指控谁，出于什么原因，你跟他过往很密切，对他也颇了解……你不觉得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暧昧的东西吗？”

“我和他过往也不算密切。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和朋友的关系从来不曾达到亲密无间的地步，所以我们从来不谈涉及私人的、秘密的事情；我们只谈论书籍、政治……”

“对于政治他的看法如何？”

“在他看来，从事政治即意味着背弃道德原则……”

“对政治采取鄙夷的态度。”议员吃吃地笑着。

“正是这样，我多少也是个鄙夷政治的人。”

“果真？”

“这倒不影响我投共产党的票。”

“很好。”议员赞赏地说。

“但我这样做的时候，是非常苦恼，非常不安的。”

“为什么？”议员问道，他的目光闪耀着戏谑、宽容的光彩，勾销了拉乌腊纳打算说明的理由。

“我们不谈这些吧，反正你无法说服我去投反对票。”

“反对谁？”

“反对共产党。”

“那敢情好啊。”议员格格地笑道。

“未必如此。”拉乌腊纳神色严肃地说。他又谈起罗西奥，这位大夫大约也投共产党的票，虽然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宣布。

“他需要尊重他的亲属，实际是尊重他妻子的亲属，他们都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以总司铎为首……”

“总司铎？”

“是的，总司铎卢塞洛，他妻子的伯父……因此，罗西奥为了尊重亲属，也许为了避免家庭里的冲突，他竭力回避采取明确的立场。应当说，最近一个时期，他对政界——我是指政府——的人与事发表意见的时候，变得更加尖刻了。”

“也许减少了薪俸，撤消了他的某些职务？”

“我不这样认为……他跟他不大相同，现在你不妨想象一下……他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他的家乡；晚间上俱乐部或药店，打猎，猎狗。我觉得，他也非常爱他的妻子，宠爱他的女儿……”

“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也蛮可以爱财如命，还有某种野心……”

“他有足够多的金钱，但没有野心。况且，对于一个深思熟虑之后决意一辈子定居家乡的人来说，还谈得上什么野心呢？”

“这么说来，他倒颇像一个旧时代的乡村医生：自食其力，给病人治病分文不取，甚至还向没有钱买药的穷苦病人布施散财……”

“大致上是这么回事。不过他的收入蛮不错的，他的医术高明，在附近市镇也享有声誉，许多病人专程从外地赶来请他治疗。另外，罗西奥的名字是很响亮的，老罗西奥是个名教授……顺便说一下，我打算去拜访这老头儿。”

“那么，在你看来，罗西奥之死跟他反对那位神秘的权势人物的立场是密切相关的吗？”

“不，毫不相干。相反，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怀疑是站不住脚的。罗西奥事先已经知道匿名信提出的威胁，可他仍然冒失地陪同药剂师曼诺去打猎，这就是迹象，是他丧生的原因。”

“可怜的罗西奥。”议员轻声地说。

八

罗西奥老教授大约二十年以前便从学术界引退，也不再行医，但他这个眼科医生的声誉至今在西西里西部仍然不减当年，甚至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彩。他已年逾九旬，由于命运的嘲弄，或者按照某种无稽之谈，因为当初他向造化挑战，让盲人重见光明，而今他满怀悲怆之情接受了造化的报复，他的双目差不多完全失明了。他跟另外一个儿子生活在巴勒莫，儿子继承了他的衣钵，兴许跟他一样是位出色的眼科医生，不过许多带有偏见的人断言，他是坐享父亲的名气。

拉乌腊纳挂了个电话，表示他想在教授方便的日子和时间登门拜访。教授听了女佣人的报告，亲自来接电话，回答说，请他立即就去。教授这么爽快地答应，并不是因为他从拉乌腊纳讲话的口气中回想起了儿子的这个老朋友，而是他如今生活于万般孤寂之中，渴望有人来做伴儿，以排遣他悒郁的情怀。

下午五点钟，教授在阳台上，坐在一张安乐椅里，旁边是一台电唱机，扬声器里传出一位著名演员朗诵《地狱》^①第三十歌的声音，忽儿高亢激越，忽而索索颤抖，忽而长吁短叹。

“您可瞧见我落到了什么地步？”教授向拉乌腊纳伸出手来。

“听此人朗诵《神曲》，倒不如让我十二岁的小孙子，要不让女佣人或者门房，来给我念上几段，可惜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教授直率地抱怨说，即便当着演员的面，看来他也会有足够的理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先驱但丁的长诗《神曲》的第一部。

由来表示轻蔑。

倚着阳台的栏杆放目远眺，东南风轻轻地吹拂着，巴勒莫城在淡淡的雾霭中闪烁。

“多美的景色，”教授说，他很有把握地向客人一一指点，“那是圣约翰隐士教堂，奥尔良宫，王宫。”他淡淡一笑，“十年以前，我们刚搬到这儿来住的时候，我的视力要稍许好些，可现在我至多只能模糊地看到太阳光了，就像远远的一团白色火光。幸运的是，巴勒莫的阳光充足极了……不过，我们还是撇开不谈个人的不幸遭遇……这么说来，您是我那可怜的儿子的好朋友罗。”

“起先我们一起在初中和高中念书，后来他考上了医学院，我进了文学院。”

“文学，您现在当教员，是吗？”

“是的，教意大利语言、文学和历史。”

“您可晓得，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去当语文教员？我现在至少还能背诵《神曲》。”

“真是偏执的妄想。”拉乌腊纳暗自思忖，然后说道，“您一生的经历跟朗诵和诠释《神曲》可是大相径庭啊。”

“依您看来，我从事的职业比您的工作更有价值吗？”

“不，我只是想说，我所做的工作，成千上万的人都能去做，而您的工作，却只有极少数的人，全世界也不过一二十人能够胜任。”

“夸大其词。”老教授说道。他仿佛昏昏欲睡，过了一会儿，突然发问，“出事前的最后几天，我儿子的情况怎样？”

“您是说？……”

“我想说，那几天他似乎心绪烦乱，闷闷不乐，有点儿神经过敏，是吗？”

“最初我不曾介意。不过，昨天我跟一个在罗马见到您儿子

的人谈话的时候，我倒回想起来，那几天他的表现确实有点儿异样，至少对待有些事情是如此。可您为什么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也觉得他跟平常有点儿异样……您方才说，有位先生在罗马跟他见过面？”

“是的，在罗马，那惨案发生前十五天或二十天。”

“奇怪……这位先生不会张冠李戴吧？”

“他不会认错人的。他是我们的朋友，中学里的同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又当了议员。您的儿子上罗马就是去见他的。”

“去见他？奇怪，真奇怪……我不相信我的儿子有什么事情需要去求他；虽说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执政党，可是请那些人帮忙总要更方便些。”他的手指向西西里大区政府的官邸奥尔良宫方向，“那些人还常上我儿子家里做客呢；据说，他们都是些很有势力的人物。”

“准确地说，您的儿子不是去央求人家帮忙。他想请我们那位朋友出面，在议会里公开揭露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贪赃枉法的行为。”

“我的儿子？”老头儿吃了一惊。

“是的，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确实变了。”老头儿喃喃自语，“确实变了。我说不清楚，这是打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我头一次发现他的举动有点儿古怪，对周围的一切抱着厌恶的态度；而且，发表议论的时候是那么刻薄，这一点使人想起他的母亲……我的妻子出身于征税人家庭，这种人大抵到了二十五六岁或三十岁便能摆脱命运之网，走上自食其力之路……不，我的妻子不爱她的亲人……也许更准确地说，她不理解她的亲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她去理解，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无能为力……噢，我们方才说

什么来啦？”

“谈您的儿子。”

“是的，谈我的儿子……他聪明过人，但又文质彬彬，性格温和。他为人极其诚实……对乡村，对土地特别眷恋，这或许是继承了我妻子的特点。仅仅继承了这一点，要知道他的外公，我妻子的父亲，在乡村就像个野蛮人一样如鱼得水，我的妻子也是这样；相反，我的儿子却要斯文得多，我觉得……他属于人们常常称之为天性纯朴的那种人，或者说那种青年，其实他却复杂得要命……他结婚以后便成了基督徒家庭的成员，这是我很不喜欢的……我称他们基督徒，只是借用一个习惯的称呼，我快要九十二岁了，但在这里，我一辈子从来不曾遇见过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有的人也许一辈子不知美餐了多少做祭饼的面包，可仍然时时刻刻想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里去，朝奄奄一息的病人脸上踹一脚，给健康的人拦腰狠狠一拳……您认识我的儿媳妇和她家里的人吗？”

“交往不深。”

“我和他们几乎没有交往。跟我的儿媳妇只见过几面，她的那个当司铎的伯父，也许是总司铎，天晓得他是什么鬼东西，我只见过一次。”

“总司铎。”

“此人甜言蜜语，可亲极了。他一心要我皈依宗教。幸运的是他那次只是路过此地，否则他会来个突然袭击，把圣体都抬来的……他压根儿不知道，我已经是个教徒……噢，听说我的儿媳妇是个美人儿，是吗？”

“很漂亮。”

“也许是个迷人的娘儿，我年轻的时候，人们谈起风流韵事常常这样称呼漂亮的女人。”他俨然是个行家，但又显露出一种

超脱的态度；他几乎不想再让人提及他惨死的儿子的妻子，挥动双手，画了个直挺挺躺着的人的样子。“我想，如今大伙儿也不再使用这个字眼了，女人已经从笼罩着绣床和灵魂的神秘之雾中解放出来。您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天主教会今天正在庆贺它有史以来获得的最重大的胜利：男人终于仇恨女人了。即使在最野蛮、最黑暗的世纪里，教会也没能做到这一点，今天竟如愿以偿了。神学家或许会说，这是天命的绝妙计谋：男人自信在性解放的大道上迅跑，其实却钻进了死胡同。”

“是的，也许是这样……虽说我觉得，即便在天主教世界，女人的肉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赞美，这样当众展览；它吸引人的魅力，简直跟商业广告赋予女人的作用如出一辙……”

“您方才讲的这句话：女人的肉体当众展览，这句话总算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像当年上绞刑架的囚犯示众一般……这就是报应吧……我大约谈得过多了，该休息一会儿罗。”

拉乌腊纳以为他应当告辞了，立即站起身来。

“别走。”老教授说，他生怕这希罕而极好的交谈机会如此迅速地结束。他似乎又昏昏欲睡，陷入了梦境，他的清癯的侧影跟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在大学回廊里见到他的半身青铜雕像毫无二致，雕像下面刻着人们从来不予理会，却喜欢加以嘲笑的题词。

“他会这样悄悄死去的。”拉乌腊纳默默地思忖。他有点儿心绪烦乱，凝视着教授，直到纹丝不动的老头儿好像继续方才中断的谈话，突然开口说：

“有些事情，最好不去触动，宁可让它们永远是个谜……俗话说，死者无法复活，还是救救生者吧。假如发生一件惨案，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您把这件事告诉一个北方人，又告诉他这句谚语，他很自然地会撇下死者不管，急忙去救护受伤的生者。相

反，西西里人却认为，一个是被谋杀者，一个是凶手，那需要抢救的生者便是凶手，对于西西里人而言，死者意味着什么，劳伦斯^①或许明白了这一点，他把爱神驱赶进了死巷：死者只不过是炼狱里的一个可怜的幽灵，一条徒具人形的小虫，在被烈火炙烤的砖地上挣扎……当然，假若死者脉管里曾经流着跟我们一样的血液，那就必须千方百计打发那生者，也就是凶手，到炼狱里接受火刑……我还不是一个这样彻底的西西里人，从来没有兴趣去抢救生者即凶手，我一向觉得，监狱其实倒是更实在的炼狱……不过，我儿子的不幸中，包含了某种因素，它迫使我想到生者，去注意那些生者……”

“莫非那些生者也是杀人凶手？”

“不，我不是说那些在肉体上直接杀害他的生者，而是指引导他去观察生活的某些现象，去做另外一些事情，引导他抛弃爱的情感的那些生者……有幸活到我这等年纪的人，乐于相信，死亡是心甘情愿的行为；对于我来说，它不啻是一桩无足轻重的、心甘情愿的行为，耳朵里光听到它的声音——他用手指着电唱机——和城市的嘈杂声，实在叫我腻烦。眼看我落到这种地步，女佣人六个月来天天在我跟前假惺惺地洒下几滴眼泪，背地里却高兴得一个劲儿地唱歌，我的这位儿媳妇十年来每天早晨都让人来打听我的身体可好，其实心里却巴不得听到我一命呜呼的消息。我决意要离开人世了，就像一个打电话的人听到另一头是个令人生厌的俗物或者白痴，只得撂下听筒一样……我仅仅想说明，人生在世，会体味到这样一种经验、痛苦、思想、情绪，以致死亡对于他来说，已不过纯粹是形式而已。好吧，假如罪人确实是有的，

① 戴·赫·劳伦斯(1885—1930)，英国小说家、诗人、散文家，他的某些作品以性爱为题材。

那就应当在最亲近的人当中寻找，拿我儿子的死来说，可以从我开始，因为做父亲的任何时候都应当承担责担，任何时候。”他的黯然失色的目光似乎消失在对遥远的年月的回忆中。“您瞧，我也是需要别人来挽救我的生者之一。”

拉乌腊纳猜度，老教授似乎话中有话，包含某种双关的涵义；或者，仅仅是某种痛苦的、难以捉摸的直觉。于是，他问道：

“您在思量某件更具体的事情吧？”

“噢，不！谈不上什么具体的事情。我只是思量那些生者。您呢？”

“我说不上来。”拉乌腊纳回答。

他们陷入了沉寂，拉乌腊纳起身告辞。老头儿向他伸出手来，说：

“真是个难解的谜啊。”

他兴许是指谋杀儿子的凶手，也许，是指生活。

九

九月底，拉乌腊纳回到了小城。在俱乐部里，卢塞洛律师立即把他悄悄地拉到一个角落里，以免令人生畏的上校听见，告诉他，这里没有发生任何新情况。倒是拉乌腊纳向卢塞洛叙述了重要新闻：他跟共产党员的会面，罗西奥大夫准备提供材料，请议员把丑闻公之于世的传说。

卢塞洛惊诧不已。他一面细听，一面不停地啧啧称奇：“您瞧！”尔后，他神色激动地提出许多疑问，又在记忆中搜索着罗西奥大夫生前说过的片言只语和某些举止行动，试图从中寻找能够跟这难以令人置信的事件联系起来的蛛丝马迹。

“我想，你会知道若干内情的。”拉乌腊纳说。

“内情？可我听到你方才讲的消息简直惊呆了。”

“他打算揭发你那个党的某位成员，但又想避免你站出来居中调解，劝说他放弃原来的计划，从这一事实中也许能够找到某种解释。他顽固执拗，但又有着异常温顺的一面。假如你知道了他的打算，你无疑会向他施加压力，促使他软下心来，因为当你面临着有人要攻击你那个党的成员，从而攻击你的党的威胁时，你无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事情一旦关系到家庭，关系到家庭成员，党派是无足轻重的。当初他若是找到我，他的全部愿望都会得到满足的。”

“他可能恰恰不愿意这样行事，让一个仅仅跟他有关的问题损害你在党内的地位，他确实说过，这是一桩微妙的、纯系私人的事情。”

“异常微妙的和纯系私人的……可你能否肯定，他确实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没有提供某些有助于确定，哪怕是大概的，这个要人的线索？”

“没有。”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我给我的堂妹挂个电话，然后我们一起上她那儿去。罗西奥总会向妻子透露点什么的……走吧。”

他们去打电话，卢塞洛告诉堂妹，这里有一位叫拉乌腊纳的老师，他掌握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看来唯独她才能解释其中的奥秘，他是否可以在这很不适宜的时候陪这位老师登门造访，打扰她片刻。

“我们走吧。”卢塞洛放下听筒，说道。

罗西奥太太双手叠在胸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拉乌腊纳准备告诉她的消息。丈夫的罗马之行使她吃了一惊，她不由得凝眸注视着堂兄，说道：

“也许是那一次，出事以前约两三个星期，他告诉我说，要上巴勒莫去一趟。”

至于其他情况，她什么也没有说。不错，遇害以前的一段时间，她的丈夫心绪烦乱，很少开口，偏头痛又常常发作。

“他的父亲，罗西奥老教授也对我这么说，他觉得那些日子里儿子好像完全变了样。”

“您见到了我的公公？”

“那个叫人望而生畏的老头儿。”卢塞洛插了一句。

“是的，我去访问了他……他脾气古怪，但头脑挺清楚，甚至有点冷酷无情……”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罗西奥太太说，“可不信仰宗教怎么能做人呢？”

“我想说，他在理性上是冷酷无情的……至于说信仰，我想

他是有的。”

“毫无信仰可言，”卢塞洛说，“他是个无神论者，属于至死都不肯改悔的顽固派。”

“我也不认为他是个无神论者。”拉乌腊纳说。

“他是反对教会的。”罗西奥太太接腔，“有一回，我跟我的丈夫和当总司铎的伯父一道去看望他……他竟然说些什么呀！请相信我，当时我听了浑身直打哆嗦。”她双手交叉，抱紧了一双裸露的美丽的臂膀，仿佛她现在仍然感到一阵阵憎厌的寒颤。

“他说了些什么呢？”

“他的话我简直害怕再重复一遍，我一生中从来不曾听说过……可怜的总司铎伯父紧握手中小小的银十字架，不停地劝他以仁爱为怀……”

“其实，他曾告诉我，总司铎是个极其温柔可爱的人。”

“一点儿不错。”罗西奥夫人说。

“总司铎伯父是位圣人。”卢塞洛连忙补充。

“不，不能这么说，也不应当这么说，”罗西奥太太纠正他，“我们是没有缘分成为圣人的……当然，可以这么说，总司铎伯父有着宏大的胸怀，德高望重。”

“您的丈夫，”拉乌腊纳说，“长得活脱像他父亲，连思维方式也有几分相近。”

“像那个注定要下地狱的老头儿？上帝多慈悲吧！……我的丈夫非常敬重当总司铎的伯父，敬重教会。每个星期天，他陪伴我上教堂做弥撒。他信守耶稣受难日的规矩。对于跟宗教有关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流露出半句亵渎或疑惑的话语……而我，是很爱他的，假若我猜疑，哪怕是一丁点儿，他的思维方式跟他父亲一样，您想，我会跟他结婚吗？”

“不过，”卢塞洛说道，“你的丈夫也确实叫人捉摸不透。”

他对宗教，对政治，究竟抱着怎样的看法，连你，他的妻子，也未必能够讲个清楚……”

“很清楚，对于宗教、政治，他是敬重的。”罗西奥太太后退了。

“是的，在这方面他是持敬重的态度……但从拉乌腊纳方才讲的情况来看，他显然不是个开诚布公的人，他的思想，他头脑里正在酝酿的计划，甚至对你都滴水不漏？”

“是这样。”罗西奥太太叹了口气，转向拉乌腊纳，“可是对他的父亲，难道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是滴水不漏吗？”

“他什么也没有说。”

“他对议员说过，这是件非常微妙、纯系私人的事情吗？”

“是的。”

“他答应向议员提供文件？”

“全部调查材料。”

“听我说，”卢塞洛向堂妹建议，“我可以瞧一眼他的抽屉和文稿吗？”

“我想让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持他在时的样子，眼下我实在没有心思去触动它们。”

“这可是为了消除疑团，揭开一个令人不安的谜……而且，我知道什么呢？假若有人让他受了冤屈，我出于对他的情谊，对他的纪念，愿意竭尽全力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你说得倒也在理。”罗西奥太太站起身来。细挑的身材，丰满的胸脯，直到腋下浓密的黑毛处都裸露的臂膊，身上舒散着一股清幽的香气，嗅觉灵敏、缺乏热情的人能够辨别出巴莱查加香水跟汗味的区别；她打拉乌腊纳面前飘然而过，像登入卢浮宫的萨莫特拉齐亚的维多利亚^①。

他们被引进了书房；室内显得有几分昏暗，也许因为是光线

投照到写字桌上，把塞满书籍的书架抹上了一层深沉的色彩的缘故。写字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书。

“这是他当时读的书。”罗西奥太太说。

卢塞洛用两只手指头夹住摊开的一页，把书合上，读着书名：《致E夫人的书简》。

“这是啥玩意儿？”他向拉乌腊纳请教。

“很有趣的作品，一个波兰人写的。”

“他特别喜欢读书。”罗西奥夫人说。

像拿起来时那样小心翼翼，卢塞洛把书摊开，放回到写字桌上。

“先瞧瞧抽屉吧。”他建议。于是，他打开了第一个抽屉。

拉乌腊纳俯身浏览摊开的书，一行文字映入他的眼帘：“唯有触犯制度的秩序的行为，才导致人接受法律的严峻处置。”他的目光向书上扫视了一下，虽然没有逐行阅读，却仿佛排除了某个障碍，立即明白了上下文，这是作者评论加缪的《局外人》^②的一段文字。“制度的秩序！试问制度又在哪里？它从来不曾存在，莫非将来会出现吗？当一个局外人，真实的或犯罪的局外人，或者同时是真实的和犯罪的，那不过是当制度的秩序存在的时候才允许享有的一种奢侈。至少说，不应当把罗西奥大夫消失于其中的制度视为制度。因此，刽子手远比罪犯更配称作局外人；如果断头台还派用场，那刽子手远比逍遥的时候更称得上真实的局外人。”

罗西奥太太也动手翻寻文稿，她半蹲在写字桌最低的一个抽

①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艺术珍品，1863年发掘出土，现藏巴黎卢浮宫。萨莫特拉齐亚为希腊一海岛。

②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长篇小说《局外人》(1940年写成)是其成名作。

屈跟前，如同披了一层阳光和昏黯交织的网纱；她袒胸裸肩，浓密的棕褐色的髻发神秘地遮掩了她的面容。拉乌腊纳的思路也在阳光与昏黯交织的愿望之网里消失了。

她关上抽屉，做了个跳跃式的舞蹈动作，轻盈地站起身来。

“什么也没有。”她说，但丝毫没有流露出厌烦的情绪，好像这番搜索完全是为着满足堂兄的要求。

“什么也没有。”卢塞洛以同样的声调应声说，把最后一卷手稿整理好。

“我说不清楚，但可能有个箱子存在银行里。”拉乌腊纳说道。

“我也这么想的，”卢塞洛接腔，“明天我想办法打听一下。”

“不可能。他知道，这儿没有任何人会动他的东西；他的书籍，他的手稿，我也从来不去碰它们……他是很细心的人。”罗西奥太太说，陷入了沉思，好像让人明白，她是不拘小节的。

“可以肯定，事情非常蹊跷。”卢塞洛说。

“在你看来，这个共产党议员还有什么文件？都跟他的遇害有关系吗？”表妹向他询问。

“无稽之谈。”他转向拉乌腊纳，说，“你看呢？”

“谁敢打保票呢？”

“噢！”罗西奥太太几乎嚷了起来，“这么说，您认为……？”

“不，我并不认为……我想，自从警察局毫无根据地去追查药剂师的所谓风流韵事，一头扎进了死胡同之后，人们自然要走到这一步；一切假设都是可取的。”

“那匿名信呢？药剂师收到的那封信，你把它置于何地呢？”卢塞洛问道。

“不错，那匿名信呢？”罗西奥太太紧跟着追问。

“我觉得，它不过是凶手玩弄的一个花招，”拉乌腊纳说道，“药剂师其实是虚设的靶子，借以掩护……”

“您当真这么认为？”罗西奥太太惊愕莫名，急迫不耐地问道。

“不，我并不这么认为。”

罗西奥太太似乎卸掉了沉重的包袱。

“她坚信不移丈夫是受药剂师的牵连而死的，任何其他假设她都无法接受，以为会损害她对丈夫的印象和崇拜。”拉乌腊纳暗自思忖。他责备自己不该用他的假设去搅乱她的心绪，虽然，说句实在话，他并不觉得他的假设完全是捕风捉影。

十

“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收赃纳贿，经营走私，巧取豪夺……依你看，他可能是谁？”

“本地人？”

“也许是本地人，也许在大区，或者在省里。”

“您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圣安娜堂区神甫说道，“因为如果把范围限在这个小城，那么连在娘胎里尚未出世的婴儿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假若把范围扩大到大区，到省，那就像一团乱麻，很难清理出头绪来了。”

“那就局限在这个小城吧。”拉乌腊纳说道。

“卢塞洛，卢塞洛律师。”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他不是这种人。”

“他不会收赃纳贿，不会经营走私，不会巧取豪夺？……那么，请原谅，我应当对您说，您是个糊涂虫。”

“不，不……我想说，这个人，我方才跟他交谈的这个人，竟然就是……不可能。”

“谁？您方才跟哪个人交谈了？”

“我不能讲出他的名字。”他的脸红了，竭力避开神甫那双立即变得锐利无情的目光。

“我亲爱的老师，跟您谈话的这个人，没有告诉您那有权势者的名字，也没有告诉您他在什么地方；他大约告诉了您某些特

征，请相信我，除去已经被揭露出来，吃了官司的人以外，这些特征可以安到成千上万的人身上……从这汪洋大海般的人群中，您想把您那个有权势的人揪出来？”神甫满怀同情地、宽厚的微笑。

“说实在的，我起先还以为我不能讲出姓名的那位是本地人呢……可您对我说，小城只有卢塞洛……”

“卢塞洛是天字第一号，不用思考就会想到他；严格地讲，唯独他才是名符其实的有权有势者。还有许多小号的，也有人会把我归到这一伙人当中去……”

“瞎胡闹。”拉乌腊纳以并不坚定的声音抗议。

“不，也许他们是对的……不过，我重复一遍，卢塞洛是天字第一号……您对此人可有透彻的了解吗？我是指他的欺诈走私的营生，他的不义之财，他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势力。因为要了解他的声名品行实在是很容易的，这是个不乏聪明才智的白痴，为了猎取或者保持高官厚禄，他会毫不犹豫地踩着别人的尸体前进……自然，除了当总司铎的伯父……”

“我晓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可对于他的权势却不甚了然。您当然比我更清楚他的底细。”

“他的底细我倒是清楚！……您听我细说：卢塞洛是福拉利斯公司董事会成员，每月薪金五十万里拉，这个公司的技术顾问，每年二百万；特里纳克里亚银行参事，又是二百万；维谢里斯公司理事会理事，每月五十万里拉，福拉利斯公司和特里纳克里亚银行资助的大理石开采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设在荒丘沙砾地方，压根儿见不到一块大理石，即便特地从外地运来，转眼间也就不翼而飞了；省议会议员，这个职务在经济上固然得不偿失，车马费只能勉强维持给侍者的小费，可抬高了他的身价……您知道，正是他促使他那个党的议员改变立场，从跟新法西斯党联盟转向

跟社会党合作，当时这样的行动在意大利还很罕见……他由此赢得了社会党人的好感：当然，他假若能促成他的党再向左翼靠拢一步，那他这一回就将走在时代的前面，并会赢得共产党的好感……不妨对您直说，省里的共产党已经跟他眉来眼去，暗暗地希望……现在，还是谈他私人的家当吧，其实我也只了解一部分：在省的首府，他拥有大片地皮，据说在巴勒莫也有；手里掌握着两家建筑公司、一间为公共机关和企业服务的印刷厂、一家运输公司……此外，尚经营着某些见不得人的买卖；假若您想伸出鼻子去嗅一嗅这些玩意儿，哪怕是出于纯粹的、毫无利害关系的好奇心，那也会大难临头……我只想再说一点，假若有人递给我一张他开的空头支票，无须任何保证，我会接受的。”

“简直不可思议。”拉乌腊纳说道。

“当然罗……不过，您可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吗？有一次，我在一本关于相对论的著作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我们的肉眼瞧不见奶酪里蠕虫的脚爪，但不能据此断言，蠕虫瞧不见自己的脚爪……我便是一条奶酪里的蠕虫，而且清楚地瞧见其他蠕虫的脚爪。”

“你真会讲笑话。”

“不全是笑话。”神甫蹙紧双眉，表露出一丝愠色。“我们时时刻刻都是跟蠕虫为伍。”

这番尖刻的话语几乎使拉乌腊纳产生了跟神甫推心置腹地交谈的愿望。把他了解到的关于罗西奥大夫凶杀案的全部情况，向神甫和盘托出吗？这是一位不受任何偏见约束，阅历深厚，绝顶聪明，恃才傲物的人，天晓得，也许正是他有能力寻得解决问题的钥匙。但他转念一想，神甫谈吐过于放纵，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公正无私、玩世不恭的自由人。另外，神甫对总司铎满怀敌意，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假若他得知那些在某种程度上给总司铎的家

庭蒙上阴影的事情，他会情不自禁地给它添油加醋，四处张扬。拉乌腊纳对放荡的神甫讨厌，也无意之中导致他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虽然他分明知道，世上原本没有善良的神甫；他的母亲就从来不掩饰对圣安娜堂区神甫的这种讨厌情绪，常说他的不体面举止是跟神职人员的高洁行为水火不容的。

“除了卢塞洛，省里还有那些人，比方说，称得上有权势的人物？”

“让我想一想。”堂区神甫说。尔后又问道，“把众议员、参议员排除在外吗？”

“排除在外。”

“费德利爵士，拉维纳律师，雅科皮托博士，安福索律师，埃瓦杰利斯塔律师，博雅诺律师，卡梅拉托教授，马科梅尔律师……”

“看来，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唉，是的，我早就对您这么说过……此类蠕虫之多，实在是不计其数，不在同一块奶酪里是难以置信的。可您，请原谅，何以有这等兴趣去解此难题？”

“好奇，纯粹是好奇心……我在火车里遇见一位老兄，他对我讲述了我们这里一个人用不法手段发迹的情形……”自从他对谋杀案发生兴趣以来，拉乌腊纳已经习惯于以某种轻松自如的态度撒谎，他又有点儿不安，仿佛这么一来暴露了他隐秘的倾向。

“那么……”堂区神甫打算发问，但随即做了个手势，打消了追根究底的念头。看来他并不完全信服教员的解释。

“我很抱歉，耽误了您的宝贵时间。”拉乌腊纳说。

“我正在读卡萨诺瓦^①的回忆录，经过校勘的真本……法文

① 乔万尼·贾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威尼斯冒险家，以才华出众、私生活放荡闻名。著有用法文写的《回忆录》。

的。”神甫自得地说。

“我还没有读过。”

“它同我们熟悉的流行版本并无很大差别，也许文字不那么华丽……我在思考，把这类回忆录当作某种爱情教科书，那么其中最饶有兴味之处该是：同时勾引两个或三个女人，要比引诱一个容易得多。”

“真的吗？”拉乌腊纳很惊奇。

“我对此深信不疑。”堂区神甫右手扣胸，说道。

十一

拉乌腊纳记得很清楚，直到凶案发生的前一天，罗西奥和卢洛塞见面的时候还互相问候，寒暄一番的。他们之间的关系缺乏至朋亲友之间应当有的亲昵和热忱，这要怪罗西奥大夫，他跟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长年跟他一起行猎的药剂师曼诺，都保持一种让人觉得他冷漠无情、睥睨一世的距离。他的拘谨的言谈，几乎仅仅止于回答对方的问题；而且，聚会的客人愈是众多，他愈是罕言寡语，沉浸于悠远的遐想中。唯有跟老朋友拉乌腊纳单独相遇的时候，或者避开大庭广众，找个僻静的角落，他才有点儿侃侃而谈的兴致。人们推想，他跟药剂师结伴，在林子里行猎一整天，大约也会多少交谈一番的。

遇难前的一段时间里，罗西奥跟他妻子的堂兄的关系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何况他沉默寡言的脾气也很难叫人发现什么变化。在人们心目中，这一事实足以排除罗西奥制造阴谋，陷亲戚于罗网的可能性。至少说，他不会悄悄做出什么奸诈的不义行为；在当地，这类事情并不罕见，一方面不动声色地竭力掩饰对朋友的阴恶用心，一面伺机用各种最卑劣的手段，企图置朋友于死地。但拉乌腊纳压根儿不想考虑这一假设。

他眼下走到了这一地步，除去洗手不干，听其自然，他已经再也无能为力了。起先，他只不过是排遣假期的时光，坦白地说，这实在是很不明智的行为。如今学校又开学了，他得重新开始每天在小城与首府之间疲于奔命的生活；他的母亲眷恋乡土和家庭，硬是拒绝了他提出的迁居首府的提议。虽然他多少觉得

自己是母亲顽固态度的牺牲品，但他从学校返回小城，踏进他诞生的那座古朴而宽敞的宅第，他便体味到一种他所不甘愿丧失的生活乐趣。

不过，公共汽车的班次对于他是极不便利的。每天清晨七点钟，他搭车离开小城，半个钟点以后到达首府，离上课还有半个钟点，他便在大街上溜达，或者在教员休息室里坐等，或者去喝一杯咖啡；然后，他要呆到中午一点半钟才能搭上班车，两点钟回到家里……多少年来，这种单调的生活周而复始地循环着，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他越来越感到它是不堪忍受的负担。

邻间亲朋都不止一次劝他买辆小汽车，学会开车子；当然，母亲是反对的。他始终没有采纳这一建议，除了不愿让母亲担惊受怕，他总觉得，他的年纪，他的神经，他的散漫的注意力，都不适宜驾驶车子。如今，新的学期开始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疲倦的怠惰，终于下定决心试一试了。他暗自盘算，假如头几次驾驶练习后，教员认定他反应迟钝，那他就立即罢休，乖乖地重新开始传统的、诚然是沉重的生活。

这一小小的决定，很可能在他一生中产生无可挽回的后果。这跟他并未真正地迫使自己忘记这一惨案毫无关系，而应当归咎于他上司法局大楼去办理领取驾驶执照必须具备的法律证明时跟卢塞洛的不期而遇——罗西奥大夫和药剂师惨案的另一面，出人意料地在他眼前闪现了出来。这样的发现已是第二回了，可这一回，对于他却是性命攸关的。

他惶惑不安地登上了司法局大楼的楼梯，大凡一个普通的意大利人跨进政府机关，尤其是政法机关的迷宫，都难免有这种心情。突然，他瞧见卢塞洛陪着两个人从楼梯上迎面下来，其中一个，他立即认了出来，是参议员阿贝洛，党内公认的品行端方、学识渊博的头面人物。为了有力地显示自己博大精深的学问，此

人不止一次地证明，圣奥古斯丁^①、圣托马斯^②、圣依纳爵^③，以及所有著书立说，向现代人传播思想的圣人，都比马克思主义高出一筹。这是他到处炫耀的法宝。

卢塞洛好像对这一巧遇很高兴，他想借此机会让知书明理的拉乌腊纳结识文化界的泰斗阿贝洛参议员。他把双方一一作了介绍，参议员向拉乌腊纳伸出手来，漫不经心地说了声：“很荣幸，亲爱的朋友。”当卢塞洛说，拉乌腊纳执教于高级中学，平常喜欢写些文学批评文章时，他顿时变得彬彬有礼起来。

“文学批评？”参议员问道，凝神注视着对方，“您写了哪些文学批评文章呢？”

“微不足道的东西，论康帕纳^④、夸齐莫多^⑤……”

“唔，唔，论夸齐莫多。”参议员失望了。

“您不喜欢他吗？”

“不。西西里今天只有一位伟大诗人：卢齐亚诺·德·马蒂亚……您读过他的诗作吗？”

“没有。”

“‘请你细听，腓特烈，
掠着微风飞翔的海鸥
把我的歌声带给了你……！’”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忏悔录》、《三位一体论》等。

② 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基督教神学家、经院哲学家，著有《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

③ 依纳爵·罗耀拉(约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

④ 迪诺·康帕纳(1885—1932)，意大利现代诗人。

⑤ 萨瓦多尔·夸齐莫多(1901—1968)，西西里著名抒情诗人，195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您熟悉这首诗吗？美极了，德·马蒂亚写的，献给腓特烈二世^①。您找来读一读吧。”

拉乌腊纳显得局促不安，他被参议员的博学多识镇住了；卢塞洛莞尔一笑，仿佛要表示自己的友谊和同情似的，忙给他解围，问道：

“你干吗上这儿来呢？有什么事吗？”

拉乌腊纳解释说，他是来办理法律证明书的，准备申请驾驶执照；他好奇地随意瞥了站在一旁，陪着卢塞洛和参议员的那个汉子一眼。显然，此人是乡间来的，参议员的随从，或者卢塞洛的顾主。他的外表怪有趣的，一副轻巧的金丝眼镜，大约是杜鲁门时代美国人戴的，架在一张宽阔、粗糙、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他兴许察觉到了有人好奇地打量他，虽然这种好奇心是无意的，缺乏明确的目的，他很不自在，便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烟，又从中取出一支香烟。

参议员向拉乌腊纳伸出手来：

“再见，亲爱的朋友。”鄙薄不屑的神气取代了漫不经心的态度。

拉乌腊纳跟他握手的时候，瞥见了那汉子放回到衣兜里去的烟盒是红黄两色的。他跟卢塞洛告别，又匆匆向站在一边的汉子打了个招呼。

二十分钟以后，他一溜小跑离开了司法局大楼，因为学校里还有一小时的课等他去上。打烟草店门口经过的时候，那盒烟，那红的、黄的颜色，蓦然像火花一样在他脑子里闪亮。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促使他走进了烟草店，要了一盒布朗卡牌香烟。

烟草店老板伸手到货架上去取布朗卡牌香烟的一瞬间，他全

^① 腓特烈二世(1194—1250)，西西里王国国王。

身脉管充盈，心跳加剧，一阵炙热的旋风烧烘着他的脸，犹如一个赌徒屏息敛气地注视着赌桌上的圆球的转轮里缓缓滚动。一盒布朗卡牌香烟摆在他面前的柜台上——红黄两色的烟盒。他强烈地感到一阵冒险和胜利带来的兴奋的晕眩，他模仿着赌场里管台子的唱报“红门”、“黑门”的声调，默默地——或许是大声地——说着：“红的”，“黄的”。他很可能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以致烟草店老板愣了一会儿，奇怪地盯视着他。他付了钱，走出了烟草店。

他用瑟瑟地颤抖的两只手拆开烟盒，取出一支烟，点上火，吸了起来，不由得琢磨起方才意外发现的令人吃惊的线索，把它跟以前掌握的情况联系起来。他的思绪缭乱，忽然想起，轮盘赌里是没有“黄门”的；眼前又浮现出蒙特卡罗赌厅的场面，他曾经去过那儿一回，像马蒂·帕斯卡尔^①和依凡·梅思金^②一样，被弄得心神迷乱，眼花缭乱。

拉乌腊纳来到学校的时候，校长已经在走道上等候，一面监视着教室里乱哄哄地喧哗的学生。

“拉乌腊纳老师……”校长温和地责备。

“请原谅。”拉乌腊纳说，一面急匆匆走进教室，手里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满意、惶惑和恐惧，一起在心头蟠曲。学生们瞧见老师头一次吸烟，禁不住发出一阵欢快的大笑。

① 意大利现代著名作家皮兰德娄长篇小说《已故的马蒂·帕斯卡尔》的主人公，弃家出走后，在蒙特卡罗赌场厮混，赢得一大笔钱。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白痴》的主人公。

十二

从最初的印象看，吸布朗卡牌香烟的人，可能是个刺客，但也许是达拉斯大学某个博学的教授，专程来跟参议员阿贝洛探讨学问的。不过，像每个西西里人一样，拉乌腊纳的直觉早已被生活的阅历和恐惧感磨炼得异常敏锐，警告他提防眼前的危险；这好比猎狗搜捕一头豪猪，尚未来得及发现猎物，反倒被猪刺伤了自己，悲哀地吠叫起来。

当天晚上跟卢塞洛的会面，证明他的预感是有根据的。

卢塞洛顾不得跟他寒暄一番，笑吟吟地问他道：

“参议员给你的印象如何？”骄傲和得意的神情溢于言表。

拉乌腊纳略加思索，模棱两可地回答：

“是个令人钦佩的人物。”

“你这样评价，我很高兴，确实很高兴。这是个闪耀着思想火花的人，了不起的天才……你瞧着吧，迟早会任命他当部长的。”

“内政部长。”拉乌腊纳不无讥刺地说。

“为什么是内政部长？”卢塞洛猜疑地问道。

“像他这样的人，你想把他往哪里摆呢？当旅游部长吗？”

“自然，需要让罗马的那些人明白，分配给他一个重要的部，关键的位置。”

“他们会明白的。”

“但愿如此……很遗憾，像他这么个人，在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的历史上如此微妙的时刻，竟然无法人尽其才。”

“不过，假若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站在右翼立场上的，在这向左转折的时刻，也许……”

“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不妨说，参议员的右派立场比中国人奉行的政策还要左……请问，什么是右，什么又是左呢？对于他来说，这些区别是毫无意义的。”

“真有意思。”拉乌腊纳说，随即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那位陪着参议员的人是谁？”

“打蒙塔莫镇来的，非常能干的一个。”但他忽地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他的目光闪射出严峻、冰冷的光芒，“你干吗要问这？”

“随便问问，出于好奇心……我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物。”

“是的，他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声音里隐约透露出嘲弄和威胁。

拉乌腊纳本能地打了个寒噤。他赶紧把话题重新转到参议员身上。

“可阿贝洛先生完全接受贵党眼下奉行的路线吗？”

“为什么不接受？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向右摆动，眼下是开始向左摆动的时候了。这样，其实是什么也没有改变。”

“那跟中国人有什么相干？”

“中国人？”

“我想知道，何以参议员的右派立场比中国人奉行的政策还要左……”

“瞧，你倒真像共产党似的，喜欢咬文嚼字，抓住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不放，把它变成一根绳子，简直可以绞死一个人……我说他比中国人还要左，只不过是个譬喻……假若你乐意，我也尽可对你说，他比佛朗哥还要右……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有着宏伟的抱负，什么右派呀左派呀，我已经跟你讲了，对于他

毫无意义……噢，请原谅，我们以后再谈这些吧，我有点儿事，得先走一步。”他的脸上掠过一阵阴影，顾不上打招呼，匆匆走了。

半个钟点以后，卢塞洛又返回了俱乐部，完全换了一副模样，他充满热情，轻松愉快地跟众人周旋，谈笑风生。但拉乌腊纳起了一阵惶悚不安甚至恐惧的感觉，他的心紧皱了起来。“简直是个娅特萝波^①。”

卢塞洛竭力把话题重新引到拉乌腊纳向他打听的那个汉子身上，解释说，方才细细回想了一番，此人兴许并不是蒙塔莫镇上的人，大约住在首府，他们总共才见过两面，有一回是在蒙塔莫镇相遇的，所以产生他是蒙塔莫镇人的错觉；这汉子非常能干，因为参议员一直这么夸奖他，说他忠实、可靠……卢塞洛的表白反倒使拉乌腊纳满腹狐疑。

第二天晌午，拉乌腊纳乘公共汽车去蒙塔莫。镇上有一个大学时代的同窗，曾经多次邀请他上那儿去，参观新近发掘出来的几件很有价值的古西西里的文物。

错落有致的建筑，静谧和谐的风光，使蒙塔莫显得很美。镇中心一座巴洛克式的广场，一条条笔直的马路，从广场向四周辐射。他的朋友住在广场的一座大楼里，楼外阳光灿烂，里面却一片灰暗，阴森森的，阳光仿佛在巨大的砂石砌成的墙壁上僵凝了。

朋友不在家，他是名誉督察员，上文物发掘的现场去了，上年纪的女佣人从勉强打开一条缝的大门里这么告诉他，便匆忙要当着他的面关上大门。从里面忽然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

“是谁？”

^① 据希腊神话，娅特萝波为命运三女神之一，负责切断生命之线。

女佣人挡住还没有关闭的大门，朝里面喊道：

“没什么，有个人要见教授。”

“让他进来。”那声音命令。

“他要见教授，可教授不在家。”

“我告诉你，让他进来。”

“基督保佑。”女佣人低声叹息，好像眼前要发生什么灾难似的。她打开大门，请拉乌腊纳进去。

从房门打开的屋子里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背微微驼着，身披一件苏格兰呢外套。

“您找我的兄弟？”

“是的……我是他的老朋友，念大学时候的同学……他好几次邀请我上这儿来，参观刚出土的文物，新的博物馆……今天……”

“请里面坐，他快要回来了。”他转过身去，在前面引路。

那男子刚转过身去，女佣人立即对拉乌腊纳做了一个警告的动作：把右手伸到额头前面，绕一个圆圈儿。这一莫名其妙的手势使拉乌腊纳止住了脚步。男子并没有回转过身子来，说道：

“孔契塔在警告您，说我是疯子。”

拉乌腊纳大吃一惊，但同时心里不免觉得踏实了，便尾随男子走了进去。

穿过客厅，来到一间书房，各种书籍、雕塑、古董琳琅满目。男子在一张写字桌后边坐下，示意拉乌腊纳跟他面对面地在桌子另一边就座。他把桌子上的一堆书挪了一挪，说道：

“孔契塔以为我是疯子；说老实话，其实何止是她一个人这么想呢。”

拉乌腊纳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仿佛表示不可置信。

“不幸的是，在某些方面，我倒确实是个疯子……我不晓得，我的兄弟有时候是否跟您谈起过我；至少有这样一个根据吧，他

念大学的时候，便认定我是爱财如命到了发狂地步的吝啬鬼……我叫贝尼托，是他的哥哥……我的名字，自然不是来源于您马上会联想到的那个人；我们几乎是同龄人^①……民族统一以后，我们家庭里革命的、共和的思想很浓厚；我叫贝尼托，就因为我诞生的那年，有位叔叔去世了，而他出生时正逢贝尼托·华雷斯打倒马克西米利亚诺^②；推翻和处决一个国王，这件事使我祖父欢欣鼓舞。不过，他倒没有因此而改变给家庭成员起名时袭用波拿巴名字的传统；打1820年革命以来，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大凡男姓，都取拿破仑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名字，假若是女性，则叫蕾提齐娅^③。您瞧，我的兄弟叫杰罗拉莫·拿破仑，我的妹妹取名蕾提齐娅，而我，除了贝尼托·华雷斯，还有个无人知晓的姓名朱塞培·拿破仑。朱塞培这个名字极可能跟波拿巴和马志尼^④都有关系……一语双关，当然是很妙的……法西斯当权的年代，我的名字颇引人注目，居然跟掌握国家命运的那个人有一样的名字——贝尼托，一样的年龄，那些喜欢胡思乱想的人说不定还以为我们当年一起参加过进军罗马^⑤的壮举哩……您是法西斯主义者吗？”

“不，根本不是。”

“请别见怪；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当真？”拉乌腊纳觉得荒唐可笑，又感到愤慨。

“是这样……我这就给您举个例子，这是近来最叫我伤心落

① 指同名的法西斯头子贝尼托·墨索里尼。

② 贝尼托·华雷斯(1806—1872)，墨西哥政治家，1861年任共和国总统；1864年，马克西米利亚诺复辟称帝，1867年，华雷斯率领民众推翻马克西米利亚诺统治，把他枪决。

③ 拿破仑一世母亲的名字。

④ 朱塞培·波拿巴(1768—1844)，波拿巴家族成员，先后任那不勒斯王和西班牙王；朱塞培·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英雄。

⑤ 指1922年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分子进军罗马，攫取政权的事件。

泪的一件事……我有个老朋友，叫佩皮诺·台斯塔夸德拉，从二十七岁直到四十三岁，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全在牢狱和流放中打发了，这样的一个人你若是把他叫做法西斯分子，他决然会跳出来跟你拚命，或者当众把你臭骂一通……而事实上，他完全是个法西斯分子。”

“法西斯分子，您这么称他？台斯塔夸德拉是法西斯分子？”

“您认识他吗？”

“我听过他的演说，读过他的文章。”

“当然，根据他既往的表现和他的演讲、文章，您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把他当作法西斯分子一定是出于十足的恶意或者疯癫……也许确实是出于疯癫，假若我们把疯癫视为真理的某种避风港，但无论如何谈不上恶意……我方才对您说到，他是我的朋友，我的老朋友。但那又有什么法子呢？他就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终于跻身于统治阶层，谋取到了一个小小的，或许并不舒适的位置，一旦身居高位，他便把国家的利益跟公众的利益，他的追随者的利益跟他的对手的利益，把私利跟正义，截然分割开来……难道您不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请问他，究竟是谁让他吃尽了阶下囚和流放犯的苦头？我们甚至不妨别有用心地假设：当时，掌权的党闹了一个误会，墨索里尼本想请他……”

“别有用心？”拉乌腊纳追问。

“我这么说，您会失望、困惑，正如佩皮诺的言行叫我失望、困惑一般；要知道，我不但是他的老朋友，而且是投他票的选民。”

“您在大选中投票支持台斯塔夸德拉的党吗？”

“并不支持他的党……说得准确点儿，支持他的党，仅仅是因为有求于他的缘故……这儿的人无一不是这样的行事……有人为了补助金，有人为了混口饭吃，有人为了弄到自备武器许可证，

有人为了签证，所以才巴结某个政治家；而我，则是出于对台斯塔夸德拉个人的尊敬，出于友谊……请您想一想，对于我来说，走出家门去投他的票，需要怎样的自我牺牲精神。”

“您从来不出家门？”

“闭门谢客，不知几十年了……在活了一大把年纪之后我精确地算了一笔帐：假使我出门去找一个正直可靠、明白事理的朋友做伴，那我就要冒这样的风险，在那里至少会碰上一打窃贼，七个傻瓜，他们随时准备向我滔滔不绝地侈谈对人类、对政府、对市镇当局、对莫拉维亚的看法，您认为划得来吗？”

“不值得，确实不值得。”

“何况，我在家里日子过得蛮好，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伸出双手，摸摸他周围堆积的书。

“您的藏书真丰富。”拉乌腊纳说。

“这倒不是说，我这里便遇不上窃贼、白痴……您当然明白我是指作家，不是指人……但我很容易摆脱，把他们打发给书商，或者送给来看望我的头一个白痴就是了。”

“看来，您即使深居简出，也无法躲开所有的白痴。”

“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过，书房里全然是另一样感觉，我获得了一种更加安全、距离世界更加遥远的感觉……多少有点儿跟戏院相似，我实在是自得其乐……不妨对您说，从我这个小天地眺望外界，世上发生的一切全犹如戏院里的演出一般可笑：婚礼、殡葬、争吵、远航、归来……因为这一切我都看得分明，听得清楚；传到我这儿的任何事情，其形象和音量全是成倍地放大的……”

“我认识一位蒙塔莫镇上的人，”拉乌腊纳打断他的话头，

“可惜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高高的个子，宽阔的面孔，棕褐色的皮肤，戴一副美国样式的眼镜；他是参议员阿贝洛的忠实追随

者……”

“您是教员吗？”

“是的。”拉乌腊纳回答，对方突然表露出冷冰冰的、猜疑的神情，他的面孔刷的一下红了，一直红到了脖颈，仿佛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您忘了姓名的那个蒙塔莫人，在哪儿认识的？”

“几天以前，在司法局大楼。”

“他身边跟着两名宪兵吧？”

“没有，他陪着参议员阿贝洛和我的一个当律师的朋友。”

“您想跟我打听他的姓名？”

“倒也不见得非知道他的姓名不可……”

“可您到底想不想知道？”

“自然想知道。”

“为什么？”

“怎么说呢？受好奇心的驱使……此人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真有趣！”贝尼托突然纵声大笑，笑得呃呃连声，泪水簌簌地滚落下来。尔后，他平静下来，用一块紫红色的大手帕擦干眼泪。

“他是个疯子，”拉乌腊纳暗自思忖，“地地道道的疯子。”

“您知道我为什么笑吗？”贝尼托说道，“我笑我自己，笑我方才胆小如鼠……坦白地说，我方才害怕了。我平常以镇上的自由不羁的人自居，但其实难副；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害怕受到罪犯和密探的夹攻……不过，即便您果真是密探的话……”

“我不是密探……方才我对您讲过，我是教员，您兄弟的同窗。”

“谁指使您干这件事，去跟拉加纳较量？”他又哈哈大笑起

来，尔后解释说，“我提这个问题，是出于谨慎，而不是因为害怕……好啦，我已经把您想知道的事情告诉您啦。”

“这么说，他叫拉加纳，是个罪犯。”

“正是这样，一个受到尊敬，没有人胆敢动他一根毫毛的罪犯。”

“您以为，眼下他仍然是不可侵犯的吗？”

“我说不上来，也许有朝一日也会触动他的……不过，我亲爱的朋友，应当正视这样的事实：意大利是个惹人喜爱的安乐窝，当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跟土生土长的黑手党作斗争时，其实就意味着，正宗的黑手党早已安安稳稳地在窝里扎下了根……类似的情况，我四十年以前就领教过了。不错，无论重大的事件或者平庸的琐事，大凡头一回出现，总是悲剧，一旦重复出现，便带上滑稽剧的色彩了。总而言之，我心里是很不安的。”

“那有什么相干呢？”拉乌腊纳跳了起来，“假若是四十年以前，我也会觉得您言之有理的，何况那时黑手党之间大鱼吃小鱼……可今天，不大相同了……您以为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吗？”

“当然不是……不过，您听我说，我想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想必您也是晓得的：一家大企业打算在靠近某个居民区的山上建设大水坝。十来名议员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后，考虑到水坝将严重威胁居民区的安全，便建议停止该项工程。政府却我行我素，让工程继续进行。后来，大坝竣工，并投入了使用，但很快出现了危险的征兆。政府仍然无动于衷。专家们预见的惨剧终于发生了。代价——两千人死亡……两千人啊！那些在这里滋生的拉加纳之流用十年的光景也未必能害死这么多条人命……这等事情我还能给您讲许许多多，不过您也了如指掌。”

“这件事不足以证明……坦率地说，我觉得，您讲的这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倒像是一份辩护词……您没有想到恐怖……”

“您认为，隆迦罗涅地区的居民对水坝事件就会善罢甘休吗？”

“这是另一码子事。我同意您的观点，这是极其严重的事件……”

“当事人将逍遥法外，就像那班身手不凡的、典型的意大利罪犯一样。”

“可话又说回来，假使这个拉加纳，还有那些我们认识和不相识的拉加纳们，虽然有人包庇，但终于被摸了老虎的屁股，依我看就是前进了一步，很重要的一步……”

“您当真相信吗？在我们生活的这种环境里？”

“什么样的环境？”

“五十万西西里人离井背乡，迁居国外；农业整个地荒废了；硫矿纷纷倒闭，盐井奄奄一息；吹得天花乱坠的油田，不过是一场闹剧；大区行政机构昏昏然，无所事事；罗马的政府对这里的一切又放任自流……我们正陷于灭顶之灾，亲爱的朋友，灭顶之灾……西西里岛如同一艘海盗船，船首张牙舞爪地蹲着它的斑斓的豹子^①高悬于桅杆的大纛上，还有古图索^②的画作，还有政治家们献祭的九十面小彩旗；这艘海盗船的船舱里，有孜孜探索的作家，有马拉沃里亚一家^③，有钻牛角尖的逻辑家，还有狂人、恶魔，挤作一团；柑桔、硫磺、尸体堆积如山。船只正在沉没，我的朋友，正在沉没……我——一个疯子，您——兴许是个有志者，正遭水淹，海水已没及我们的膝盖，而我们还在侈谈什么拉加纳，争论他究竟是躲藏在参议员的身后，还是混在那些垂

① 西西里大贵族世家的纹章，上画一只大豹。

② 雷纳托·古图索(1912—)，意大利当代著名画家。

③ 意大利近代现实主义作家维尔加(1840—1922)所著长篇小说《马拉沃里亚一家》，描写西西里渔民生活，此处泛指西西里下层劳动人民。

死的人当中。”

“我不敢苟同您的高见。”拉乌腊纳说道。

“打开天窗说亮话，连我自己都不同意。”贝尼托喟然叹息。

十三

“什么动物把becco^①藏在泥土里？”阿图洛·佩科利拉刚跨进俱乐部的门，便大声提出了这个问题。

几乎每个晚上，阿图洛都要在俱乐部里讲几个妙趣横生的笑话、双关语，或者说一段俏皮话，这些全是他平日阅读报刊、书籍或者在首府观看说唱节目时积铢累寸的收获。不过，要是他的父亲，公证人佩科利拉也在场，阿图洛就得强行克制自己，闷闷不乐了。阿图洛喜欢借口他的脑子过于疲劳，来为他在大学里经常逃课的行为辩解，公证人佩科利拉倒也不反对，只是说，儿子的确需要一批快活的朋友，但不该在朋友中锋芒毕露。医生们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但公证人父子着眼于他们那个需要赢得社会尊重的职业，还是坚持这一点。

这个晚上公证人没有上俱乐部去，所以阿图洛一进门就抛出了这个有趣的问题：什么动物把becco藏在泥土里？

常常跟动物世界打交道的人说，准保是山鹑或食蚁虫，另外一些缺乏专业知识的人想得更远些，举出了天鹅、鹳鸟、鸵鸟和兀鹰。

阿图洛任他们去争论了一阵子，然后得意洋洋地宣布答案：

“寡妇！”

一阵哄堂大笑，随即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反应。萨尔瓦乔上校

① 意大利语，意为鸟喙，又可指戴绿帽子的丈夫，此处为双关语。

按捺不住了，从椅子上霍地跳起来，愤愤然地大声责问：

“您把战争中阵亡者的遗孀也包括在内吗？”

“当然排除在外。”

“您提的问题犯了一个语法错误，”会计师皮拉尼奥指出，“‘藏’这个动词应当用avere，而不是tenere，您显然受了西班牙语和那不勒斯方言的影响。”

“接受您的意见。”阿图洛讲新的笑话的时候，不喜欢匆忙地跟别人争论。

路易吉·科尔瓦亚的反应完全是表面的，也许是卤莽、漫不经心的，他好像若有所思地问道：“谁晓得，罗西奥大夫的寡妇会不会再嫁。”

“莫非她也把becco埋葬在泥土里？”阿图洛失去了素来擅长的机智，昌失地问道。

“你尽胡搅蛮缠。”路易吉面孔涨得通红，大声嚷嚷。他意识到了自己方才的失言，因而更加愤怒。这个游手好闲的阿图洛又无情地夸大他的错误，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拿这等微妙、这等危险的事来开玩笑

“我讲的那句话的意思很清楚，”路易吉冷静下来，解释道，“我听到寡妇这个字眼，脑子里闪过了那个想法……可你，既不懂得尊重生者，也不懂得尊重死者……”

“我不过开个玩笑罢了。”阿图洛解释，“大伙儿都没有听出来我是开玩笑吗？早知如此，我也不会……”

“有些事情就是开不得玩笑……假若我在这里问诸位，我们可怜的朋友罗西奥的寡妇以后该怎么办，你尽可相信，我是抱着绝对敬重的态度来谈论的……何况，我们在座的诸位都了解罗西奥太太的人品……”四周响起了一片“千真万确”！“那还用说！”的附和声。路易吉继续说，“罗西奥太太是如此年轻，甚

至不妨说，如此美丽，无论什么人，只要想到她将永远沉浸在痛苦和悲哀之中，都会油然而生某种恻隐之心。”

“唉，”萨尔瓦乔上校叹了口气，“真是个美妙的女人！”

“而您，现在……”阿图洛有点儿挑衅地接腔，他后悔适才放过了关于战争阵亡者遗孀的话题，因此想挑逗起上校的大男子主义，再刺激他一下。

“现在，怎么啦？”坐在安乐椅上的上校虎视眈眈，仿佛一头准备随时扑上去的金钱豹。

“现在……”阿图洛重复，语气和举止流露出一快活的情绪。

“您想作弄我，”上校猛地站起身来，“我，凭我这七十二岁的年纪，假使每天至少有一次……”

“上校！我简直认不出您来啦！”会计师皮拉尼奥严肃地打断了他，“你的声望，您的地位！”

皮拉尼奥确信，作为一名上校，举止理应端庄，言行得体，因此他的提醒即刻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您说得有道理，”上校回答，“有道理……可我竟遇到如此卑鄙的挑衅……”

“不必介意。”皮拉尼奥打断他的话。

这样的场面几乎每天都要在俱乐部里发生；若是皮拉尼奥不在场，人们便可尽情地欣赏上校暴跳如雷的表演。

上校重新在安乐椅上坐下。倒是皮拉尼奥接过了关于罗西奥太太的话碴：

“她年轻、漂亮，这我都同意……但是请注意，她身边有个女儿，也许她要把全副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

“把全副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这意味着什么呢？”邮政局长插进来说，“只要有钱，有个好朋友，这类事情是不用犯愁的。

女儿凭她父亲留下来的遗产，足可妥善安排；只要给她找个条件好的寄宿学校，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言之有理。”路易吉表示赞同。

“不过，”皮拉尼奥说道，“需要考虑事情的另一面，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女儿，虽说经济上相当富裕，可是谁若真心想要她，倒也要反复斟酌哩。”

“您果真这么想吗？在座的诸位，除了您，谁个会去反复斟酌？……一个像她这样丰姿楚楚的女人？谁个不争先恐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泽里洛爵士反驳。

“活见鬼！”上校大声吼道。

对罗西奥太太的尊重由此急转直下，从推崇她的品行端庄转到赞美她的风流俊俏。她的人品好像早已有了定论，被撇在了一边，而她袒露的肉体，她的肉体的某些部位，被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被放大着，如同在摄影师勃兰特的作品里富有魅力地展示的那样。谈话越来越不成体统，以致上校不得不充当罗西奥太太的庇护神，站出来干预。幸亏皮拉尼奥运用自己的威信，又把上校既往的功劳恭维了一番，才平息了他的怒气。

拉乌腊纳始终缄默不语。俱乐部里的常客每次热火朝天地对女人品头论足的时候，他几乎总是开心地倾听着。对于他来说，在俱乐部里度过一个晚上，不啻阅读一部小说；随着谈话的题目和气氛的变化，他好像是打开皮兰德娄^①的小说，或者欣赏布朗卡蒂^②的作品，当然，更大程度上接近于阅读后者的小说。所以，他也是俱乐部里的一名座上客，何况这里又是他辛劳一天之后休憩的去处。

① 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西西里人。

② 维塔里亚诺·布朗卡蒂(1907—1954)，意大利作家，西西里人。

然而，关于罗西奥太太的谈话却使他抑郁不舒，心绪烦乱，体味到一种自相矛盾的感情冲动。他厌恶这样的谈话，同时又被它深深吸引。不止一次，他几乎要拂袖而去，或者当众发泄他的愤慨；恶意的、不体面的言论，尤其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近乎嫉妒的痛苦，又令他动弹不得，终于未能起座告辞。

不堪入耳的序幕收场了，谈话又转到泽里洛爵士称之为遴选候选人的问题上来：在那班三十至四十岁，受过高等教育，品貌堂堂，性情温和，将来很可能做一番事业的单身汉中，谁个可能指望赢得罗西奥遗孀的垂爱和财产。不知是谁，或许仅仅出于恭维，言不由衷地提到了拉乌腊纳的名字。拉乌腊纳的面孔霎时间红了，这仿佛是他自卫的手段。

路易吉·科尔瓦亚出来给他解了围：

“你们干吗胡乱寻找呢？罗西奥太太如果想再嫁，她家里就有一个现成的、漂亮的丈夫。”

“此人是谁？”上校威严地问道，他的剑拔弩张的架势好像要向候选人发动闪电般的攻击。

“还可能是谁呢？她的堂兄，我们的朋友卢塞洛。”路易吉狡黠地回答，但又不掩饰对被点名的人的友情。

“那个在圣器室里胡作非为的耗子？”上校愤愤地嚷道，以鄙夷不屑的神情，准确无误地把一个小纸团掷进三米开外的白瓷痰盂里。

“正是，”路易吉吃吃地笑着，对自己的小聪明很是得意，
“正是……”

好几天以前，拉乌腊纳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并且认定它是凶杀的唯一可能的动机；这使他深感不安。如今，喜欢嚼舌头，散布闲言碎语的路易吉·科尔瓦亚竟也涌出了这样的想法，跟他的观点不谋而合。只有一点他还没有考虑清楚，或者说，在他的

脑子里依然是个模糊的、矛盾的和难以捉摸的疑点：罗西奥何以要秘密地求那位共产党议员助一臂之力，向卢塞洛发动突然袭击。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他妻子跟堂兄幽会的时候，借用警方的行话来说，被罗西奥当场捉拿了；要么是罗西奥虽说掌握了证据，但仅仅怀疑他们的私通。在第一种情况下，罗西奥的态度不能不说是稀奇古怪的，他分明目睹了一切，却背转身子去。冷漠地向妻子的情夫宣布他誓要报仇雪耻，而在他筹划报复的过程中，却又一如既往地跟他的仇敌交往。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有一个疑点需要澄清，卢塞洛可能洞悉罗西奥正在酝酿的报复计划。自然，也不排斥第三种假设：罗西奥太太是无辜的，她被堂兄欺弄，差点儿陷入圈套；她把这一切告诉了丈夫，或者，丈夫发现了这一切。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罗西奥既然深信妻子的忠贞，他顶多也只会跟第三者绝交或改变关系。他对人的七情六欲向来采取通情达理的、宽容的态度，因此，他一旦遭到并未使他身败名裂，而且又没有得逞的侮辱，他断然不会诉诸会使对方身败名裂的报复手段。

不过，需要考虑到，罗西奥去求教那位议员，仅仅是为着探索把事情公诸于世的可能性，他并未下定报仇雪耻的决心，而且，他明确地告诉议员，他将在把情况和盘托出或把事情悄悄了结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这将取决于……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卢塞洛在他的威胁之下是否改变态度吗？这么说来，他公开警告卢塞洛的同时，莫非提出了什么条件？那又得回到第一种假设上来，罗西奥的古怪态度颇像大陆上流社会或者电影里的那种戴绿帽子的丈夫，对妻子情意缠绵，苦苦地要把她挽留在身边。虽说对于被情欲、爱情和名誉主宰的生活方式，拉乌腊纳是个严峻的批判者，但他现在不能不察觉到，在他的这一假设中，对于亡友罗西奥敬重的情感丧失殆尽了，因此他又竭力想否定和推倒这一假设。他

翻来覆去地思量，感到案情中依然有着某种异常暧昧、捉摸不透的一面，事情的因果关系、各个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罪恶阴谋的各种因素，并不是完全清晰的。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在道义上和情感上，他已经深深陷入这异常暧昧和捉摸不透的纠葛。

十四

倘使说，在通常情况下，单凭三条价值有限的线索，仅仅透过众说纷纭的迷雾勉强抓住案情的脉络，便开庭审判，了结一桩案子，那拉乌腊纳就会觉得，他对司法部门及其遵循的原则的厌恶情绪和批判态度，是无可指摘的。可是，这一回，那三条自相矛盾的线索，那模棱两可的证据，在他看来却足以毫不含糊地确认卢塞洛的罪责。

正像圣安娜堂区神甫所说，卢塞洛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奸巨滑的蠢货。他以残忍而狡诈、在犯罪史上毫无新颖之处的方式作了案。他随意拣了一张报纸，从上面裁下需要的词语，剪贴成匿名信；他以为，《罗马观察家》跟其他报纸没有两样，在他出入的场所每次都可见到。这是第一个失误。其次，他发出匿名信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让罗西奥大夫自由自在地活动，跟人交谈，这第二个失误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作案的计划自然无法在一个早晨付诸实现。第三个失误在于，当侦察工作和报纸新闻的注意力仍然集中于布朗卡香烟的时候，他却公然陪着雇用的刺客招摇过市。

众所周知，内心里确认某个人为罪魁祸首是一回事，拿出令人信服的罪证，诉诸法律，又是另一回事。拉乌腊纳暗自思忖，看来，警察和法官平常都是把嫌疑犯或者罪犯的外在表现，即举止、谈吐、眼神、惶恐、犹豫这些新闻报道中难以表达的征兆，当作他们的认识和判断的主要根据。而这些，归根结底也是导致他现在对卢塞洛的罪责坚信不疑的因素。自然，也不乏这样的情

形，平白无故者的行为举止很象犯罪分子，从而把侦察者引入迷途；但在警方、海关、宪兵和法官的眼里，意大利人的一举一动，差不多从来都像个犯罪分子。而他，拉乌腊纳，距离法律，距离以法律的权威自诩者，比火星距离地球还要遥远；对于他来说，警察和法官好似往往以癫狂、痛苦的形象出现的火星，只存在于遥远的想象中。

自从拉乌腊纳向卢塞洛打听在司法局大楼陪同他的汉子是谁以后，卢塞洛心情一直很坏。他常常躲着拉乌腊纳，实在来不及躲开或者没法子假装视而不见，便勉强打个招呼了事。可有的时候又缠住拉乌腊纳，显得格外的热情，声称愿意为他效劳，为他在他的上司、副部长和部长面前美言几句。拉乌腊纳受宠若惊，但对卢塞洛的热情表示十分冷淡，回答说他没有向教育界的官僚们央求的；卢塞洛满腹狐疑，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暗暗揣摩，拉乌腊纳对他的热情竟然无动于衷，对他准备提供的帮助也断然拒绝，兴许这是一个正人君子对一个犯罪分子采取的如今已很罕见的恶意揶揄的态度，说不定拉乌腊纳还想把他的怀疑直接或间接地向宪兵队长、向特派员、向某个检查官报告哩。其实，这样的念头在拉乌腊纳的脑子里压根儿没有出现过；他的忧虑，他的不安，恰恰是担心卢塞洛认为他会有这样的念头。有时，他回想起罗西奥大夫和药剂师的悲惨下场，一阵恐慌不由得微颤过心头，提醒他小心为妙，避免落得个同样的结局；不过，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某种模糊的仁慈心，驱使他断然放弃因为他的努力而使罪犯落入法网的念头。他的行动全然出于一个普通人爱管闲事，喜欢追根究底的怪癖，不可能也不应当跟那些领取社会和国家俸给，以打击和法办恣意违犯和玷污法律者为己任的官吏混为一谈。多少个世纪以来，拉乌腊纳这种模糊的仁慈心是受欺凌和受压迫的民众奉行的原则，它给法律和执法者带来了麻

烦，以至产生这样的舆论：假如重视最公正的权与法，但又不愿把它们实现诉诸命运和上帝，那就只能求助于暴力了。

不过，拉乌腊纳心里同时又感到一阵苦恼，他似乎违心地成了卢塞洛和那汉子的同谋者，默默地、不恰当地包庇他们。这种感觉诚然包含着对他们道义上的厌恶和愤慨，却又不由得起到了帮助他们逍遥法外的作用，甚至使他们重新获得了安全感；毫无疑问，由于他的好奇心，前一个时期这种安全感他们一度丧失了。可另一方面，逍遥法外的卢塞洛是否已足可毫无顾忌取代他的牺牲品，占有那个在拉乌腊纳的脑海里和爱与死的迷宫里以烧媚迷人的姿态出现的女人？拉乌腊纳的感情和愿望在这里变得十分暧昧了，一种莫可名状的、饱和着他人生的全部苦涩、抑郁的嫉妒心，跟他目睹自己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而体味到的辛酸的快乐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全都异常混乱地在他的脑子里忽隐忽现，令他心神迷乱，浑身直感到一阵阵激动的战栗。

就这样，他度过了十月。

十一月初，正逢亡人节和胜利节，放假四天。拉乌腊纳终于明悟，各种灾祸总是降临到在家里坐不住的人的头上，而深居简出反倒得以细细地考虑一番未来的工作，享受到阅读书籍的愉快。十一月二日上午，他陪母亲去扫墓。亲人们的墓前供奉着鲜花，点着长明灯，这是他们事先雇人准备的。像往年一样，母亲喜欢沿着陵园的甬道兜一圈儿，在每一位亲人和朋友的墓前停下来，念一遍安魂弥撒。在庄严肃穆的卢塞洛家族墓前，他们遇见了露依莎，一身风雅的打扮，跪在一只天鹅绒垫子上，喃喃讷讷，默默祈祷；大理石的墓碑上，镌刻着不幸被死神召去的丈夫的名字，墓碑中央镶嵌着可怜的罗西奥的一幅瓷肖像，看上去比去世时约摸年轻二十岁，流露出介于快活与痛苦的表情。罗西奥太太赶紧起来，上前施礼，解释说，这幅丈夫年轻时候的肖像是她特意选择的，

因为跟他们最初相识时他的模样最相近。她介绍沿着礼拜堂的围墙安葬的所有亡人的家谱、辈份和跟她——一个不幸罹难、苟且偷生的女人，她补充说——的亲缘关系。她凄苦地叹了一口气，用手绢拭擦看不见的眼泪。拉乌腊纳的母亲默诵着她的安魂弥撒。握手告别的时候，拉乌腊纳觉得露依莎故意不愿放开他的手，在她的目光里，闪烁着一种哀求的、渴望谅解的神情。他暗自忖量，她肯定从她那个既是堂兄，又是情人的卢塞洛那里得悉了一切，现在，她恳切地希望他保持沉默。他心慌意乱，因为这意味着，她直接卷进了这个案子。

其实，完全用不着恳求拉乌腊纳保持沉默。他已经毅然下定了决心，要安安稳稳地在家里消磨每个晚上，深居简出，强使自己忘记这一切，让卢塞洛重新获得近来丧失了的安全感和自由。他想让露依莎也重新获得安全感和自由，这个女人想必内心里异常恐慌，所以才一个又一个小时地跪在丈夫的墓前，那么虔诚地祈祷，等待有什么人来给予她重新站立起来的勇气。拉乌腊纳发现，一伙浪荡青年正贪婪地偷偷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身穿一件黑色衣衫，把胸脯紧紧箍着，她全神贯注于祈祷，纹丝不动，身子袒露的部分以一种丰满而倦怠的美展现出来，犹如德拉克鲁瓦^①笔端描绘的美女；她站起身来的时候，露出了长统袜子套着的洁白的大腿。

“西西里人真是怪啊！”拉乌腊纳鄙夷不屑而又妒羡地寻思：在世界上任何一块地方，只消有个女人的裙子擦到膝盖上面几厘米，那么，不出三十米远，准会有西西里人，至少一个，在呆瞪瞪地偷看。他扪心自问，可以说，他没有故意向那黑色孝服下闪现出来的雪白的肌体投以贪婪的一瞥，他注意到了那群浪荡

① 厄盖纳·德拉克鲁瓦(1798—1863)，法国浪漫主义绘画主要代表。

青年的表演，事情很简单，他们也是西西里人。

母亲挽着他的胳膊，缓缓地行走，悄声地对他预言，用不了多久，罗西奥太太便会改嫁的。

“为什么？”拉乌腊纳问道。

“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何况她又如此年轻，如此漂亮。”

“那你当初怎么不再嫁？”

“当时我的青春年华已经消逝了，而且，我从来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老太太叹息。

拉乌腊纳感到一种近于厌恶的不愉快的感觉。“咄咄怪事，”他暗自思量，“在陵园里散步，怎么竟会觉着洋溢着盎然生气，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吧。”这一天确实分外的风和日丽，暖洋洋的，泥土和草木舒散着腐朽的、但令人神气清爽的气息，野薄荷、迷迭香、石竹花的芬芳，在陵园里飘荡，富贵人家墓地里的玫瑰吐出沁人的花香。

“以你看，她会嫁给谁呢？”他有点恼怒地问。

“他的堂兄，卢塞洛律师。”老太太止住脚步，细细地打量儿子。

“何以见得一定是他？”

“他们是打小时候就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彼此很了解，而且，他们结婚以后，家产又可以合并到一块儿。”

“你以为这理由很充分吗？我倒觉得，正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所以这件事颇有点伤风败俗。”

“你知道有句俗语吗？三个C是最危险的：表兄弟、堂兄弟、教父^①。最可怕的私通差不多总是离不开这样的亲戚、教父关系。”

^① 在意大利文中，表兄弟(cugino)，堂兄弟(cognato)，教父(compare)三个词均以字母C开头。

“他们之间发生过这等事情吗？”

“谁能说得清楚？有一个时期，他们都还未长大成人，生活在一起，据说互相钟情了……可以理解，那是年幼无知……听说总司铎对此很不高兴，从中加以阻拦……现在我也记不得了。可当时的确有过流言蜚语。”

“为什么要加以阻拦呢？假若两人互相爱慕，让他们结婚就是了。”

“你方才说，你觉得这件事伤风败俗，当时总司铎也是这么想的。”

“我说它伤风败俗，因为你方才没有提到他们互相爱慕这一点，只是说从小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家产……假若是恋爱，那就自当别论了。”

“堂兄妹之间联姻，需要得到教会的宽免，所以说，这里面总包含着某种罪孽……你想想看，总司铎能容忍自己的家庭里发生这种不体面的恋爱吗？总司铎是个心胸器度极其狭隘的人，这对于他无疑将是个奇耻大辱。”

“而现在呢？”

“什么现在？”

“我想说，假若他们现在结婚，岂不还是一回事吗？许多人都跟你一样认为，他们远在总司铎家里生活的时候，便彼此爱上了。”

“可不是一回事，现在不妨说是出于仁爱精神……娶一个带女孩的寡妇，把财产合到……”

“仁爱跟财产有什么相干呢？”

“怎么没有？对财产也要有仁爱精神。”

“耶稣，多奇特的信仰啊。”拉乌腊纳暗自惊叹。确实，他的母亲每日每时都表现出对财物的热忱，她从来不允许扔掉硬面包、

烂水果和盘子里剩余的茶肴。她常常吃着如石头一般硬的面包和快烂透了的苹果，自言自语说：“这是对我的惩罚。”她对残羹剩饭的热忱几乎叫人觉得，世上的珍物不如统统化作粪土更好，而她也很快枯萎、衰竭。

“假若他俩打在总司铎家里生活时便已相爱，那她出嫁之后，他们是否仍然暗中相好呢？是否可能某一天他们终于决定除掉罗西奥这个眼中钉？”

“不可能，”老太太说，“谁都知道，可怜的罗西奥大夫是药剂师的牺牲品。”

“假若事情的真相恰好相反，药剂师是罗西奥的牺牲品呢？”

“不可能。”老太太坚持自己的看法。

“好吧，不可能。不过，我们暂且这么假设……你说，这也是仁爱的举动吗？”

“比这严重的事情我也见太多了。”老太太冷静地回答，回避跟儿子发生争论。

他们不知不觉间来到了药剂师曼诺的墓前。在天使羽翼的庇护下，从圆形的釉瓷浮雕里，沉浸在狩猎的欢乐中的曼诺，笑吟吟地欢迎他们。

十五

拉乌腊纳把他讲授的意大利文学和历史的笔记拿出来，进行整理和补充；四天假日不知不觉过去了。他对待自己的工作极其认真，简直像着了迷似的，所以当他埋头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差不多忘掉了他无意之中卷进去的那个案件。他偶尔想起它，竟至觉得这是遥远的、跟他毫无关系的事情，仿佛是格林^①以其智慧、技巧和形式构思出来的故事。他跟露依莎在陵墓的邂逅，以及由此引起的遐想，也变幻为文学作品里的情节，具有基督教的、黑色浪漫主义的格调。

休息四天之后，他又重新开始了单调的、更加阴暗的教学生活。在开往首府的公共汽车上，他突然遇见了露依莎，不禁大吃一惊。

露依莎坐在第一排，黑纱裙裹着的大腿靠着敞开的窗子。她点头回答拉乌腊纳的问候，露出羞涩的笑容，做了个请他在她身边的空位子坐下的手势。拉乌腊纳踌躇了片刻，心里感到一阵惭愧，跟露依莎肩并肩地坐在第一排，不啻是把他内心的欲念、他的嫌恶、他的感情，统统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他很想找个什么借口，谢绝她的邀请。他把目光投向后面的几排位置，寻找他的一个朋友，有些事情想跟他谈谈，但那些乘客都是农民和大学生，而且没有一个空位子。于是，他向露依莎道谢，接受了她的邀

^① 格雷厄姆·格林(1904—)，英国小说家，著有惊险小说、严肃小说、宗教小说。

请。

露依莎跟他攀谈起来，说她很幸运，这个空位子能一直保留到他来，这样她就有个伴儿聊聊，因为只有交谈才能帮助她克服坐公共汽车时她常有的晕车的毛病，而她坐火车和坐小汽车却从来是感觉良好的。尔后，她谈起了晴朗的天气，在圣马丁诺的愉快的避暑生活，橄榄的丰收，她的伯父总司铎近来身体欠佳……她滔滔不绝而又漫不经心地谈着这些枯燥乏味的事儿，像是在人耳边擂鼓，叫人烦躁。拉乌腊纳头上血脉急涌，仿佛从高山之巅蓦地跌落到万丈深渊。说得准确点儿，他并非从高山上，而是犹如从梦幻中，从苏醒以后的悒郁，从喝了母亲给他冲的一杯淡咖啡以后的迷茫状态，径直跌进了深渊。坐在她的身边，也更使他觉得一阵阵耳热，浑身火辣辣的；他对她的评价愈是尖锐、无情，愈是察觉她品格上的瑕疵、反常，她的丰腴、俊雅的体态，两瓣显示出执拗而诱人的光彩的嘴唇，浓密的头发，混和着锦衾绣榻气息的温馨，便愈是激发起他的异常痛楚的欲望。

有趣的是，罗西奥去世以前，拉乌腊纳曾经有过无数次机会遇见露依莎，跟她交谈；她是个美人儿，这是没什么可挑剔的，但这样漂亮的女人又何止成千上万呢，尤其是今天，由于对各式各样的电影女明星的崇拜，女性美的标准也是各式各样的，变化无常的——苗条娟秀、丰腴绰约、阿蕾杜莎^①式的身材、清瘦的神态，无不是理想的美。可现在他却觉得，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会对她毫不动情。当她着了一身黑色的丧服，站在丈夫放大的遗像面前，他终于恍然发觉，她如今是分外的凄艳可人，分外的惹人怜爱；客厅里半开半闭的百叶窗，幽黯的灯光，披着黑纱的镜子，强烈地衬托出她的娇美的存在，她的充满肉感和青春活力的身

^① 阿蕾杜莎，希腊神话中的山林水泽女神。

子，给罗西奥的逝世蒙上了一层含有嘲讽意味的、惨淡的光晕。随着凶杀案的暴露，她的情感和不轨的行迹的暴露，他的激荡不安的情绪愈发厉害了；是的，祸根就在于她的或明或暗的放浪的媚态。拉乌腊纳暗暗承认，他这个颇有教养的人，素来对七情六欲之类的东西都是十分恐惧的，如今却越来越深地陷入罪过的旋涡。这正是横在他面前的危险的障碍；因此，这些欲念愈是对他发动侵袭，他的心灵便愈是努力规规矩矩地遵循理智指引的轨道行事。尤其是现在，她的柔软的身子，在颠簸之中贴紧了他的身子，使他昏昏沉沉，恍惚觉得灵魂飘飞出了躯壳；文学作品中描绘的这种令他神往的感觉，如今竟在他的身上应验了。

下了公共汽车以后，拉乌腊纳不晓得该做什么才好：是向她告别，抑或送她到她该去的地方。约有片刻功夫，他们呆呆地站在广场上；尔后，露依莎倏地收敛了一路上谈笑风生的表情，甚至她的柔软身子的线条仿佛也变得坚硬起来，告诉他，她想跟他谈谈这回上首府来的原因。

“我发现，”她说道，“我的丈夫确实到罗马去找过他那位当议员的朋友，想拜托他办件事儿。那天晚上您和我堂兄上我家里来，您曾经跟我谈起过它，您还记得吗？”说到堂兄这个字眼，她流露出了嫌恶的神情。

“当真吗？”拉乌腊纳毫无思想准备，他惊慌失措了，想赶快弄清楚她出人意外地对他表示信赖的原因。

“是的，当我不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我几乎偶然地发现了这一点……您那时对我讲的一番话，后来促使我回忆起许多事情，许多细枝末节，把它们汇拢到一块儿，您无意中发现的情况便显得是真实可信的了……于是我开始搜索，寻找，终于找到了我丈夫的一本日记，这是他瞒着我，悄悄地藏匿在书架上一排书后面的……当时我已经绝望了，心情暴躁，可是在从书架上随意

取下一本我想阅读的书的时候，却……”

“哦，他写的日记……”

“是制药厂送给医生们的一本大记事簿……从元旦那天记起，每天三行或四行，笔迹几乎难以辨认，是医生们惯用的草书，上面记载着他觉得需要备忘的事情，大部分跟我们的女儿有关。约摸从四月初起，他在日记里开始记载有关一个他没有提到姓名的人……”

“他没有提到此人的姓名？”拉乌腊纳以怀疑和嘲讽的口气询问。

“是的，他没有提到此人的姓名，但非常容易理会，他指的是谁。”

“噢，非常容易理会……”拉乌腊纳说，从他的语调能够察觉，他本想温和地嘲弄一番，但终又克制了自己。

“清清楚楚，没有一点儿含糊的地方——是指我的堂兄。”

拉乌腊纳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直感到心胸阻塞，几乎停止了呼吸。

“我很信赖您，”露依莎继续说，“因为我晓得，您跟我的丈夫有着很深厚的友谊和感情；这件事谁都不知道，在我把确凿的证据拿到手以前，谁也不应当知道……今天我上这儿来就是为着查找证据，我掌握了几条线索。”

“那就是说……”

“什么那就是说？”

他本想告诉她，那就是说，她跟案件毫无牵连，是清白无辜的，他一度怀疑她形迹可疑，其实是冤枉了她；他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赶忙改口道：

“那就是说，您不再相信，您的丈夫是因为跟药剂师一起打猎而遇害的？”

“平心而论，我还不能下这个结论，但这是可能的……您说呢？”

“我？”

“您深信不疑吗？”

“深信不疑什么？”

“深信不疑这样的事实：我的堂兄罪责难逃，可怜的药剂师是无辜的牺牲品。”

“的确……”

“我请求您，什么也别对我隐瞒；我多么需要您的帮助啊。”露依莎忧伤地说，一双满怀哀求的、伤感的、光闪闪的眼睛凝视着他。

“我也说不上深信不疑。不妨说，我仅仅有点儿猜疑，说句老实话，这些猜疑容易勾起不愉快的感觉……可您……你果真打算把矛头对准您的堂兄吗？”

“为什么不？假如我的丈夫之死……请听我说，我需要您的帮助。”

“我甘愿为您效劳。”拉乌腊纳喃喃地说。

“首先，请您向我保证，我现在将要对您讲的事情，您不向任何人泄露，包括您的母亲……”

“我一定做到。”

“其次，我们把您知道的情况和我今天打算弄清楚的情况，在一起谈谈，讨论一下，然后确定我们的行动计划。”

“不过，需要小心谨慎，最好三思而行，因为怀疑是一回事……”

“我希望今天就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怎么着手呢？”

“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而且现在谈还为时过早

“……我在这儿逗留到明天晚上；假如您不反对的话，明天晚上，我们再见一次面……在哪儿会面比较合适呢？”

“我也说不上来，……说不上来，我想，假使您想回避跟我在公众场合见面的话……”

“我不想回避。”

“那在咖啡馆行吗？”

“在咖啡馆，太好了。”

“罗梅利斯咖啡馆，那儿顾客不多，还有雅座……”

“将近七点钟？或者七点整？”

“对于您是否过于晚了点？”

“不。另外，七点钟以前我大约很难脱身，这两天中我要完成的任务很艰巨……好在明天晚上您就会知道一切的……那么，一言为定，七点整，在罗梅利斯咖啡馆……假如您不反对的话，我们然后搭乘最后一班火车，一起回小城去。”

“我将感到荣幸。”拉乌腊纳由于幸福而脸红了。

“那您怎么对您母亲说呢？”

“我就说，学校里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回家晚了，其实这也不是头一回了。”

“您不会对我食言吧？”

“我会履行诺言的。”拉乌腊纳喜不自胜。

“那么，明儿晚上见。”露依莎向他伸出手来。

拉乌腊纳感到一阵爱怜和悔恨的激动，朝她的手掌弯下腰来，几乎要吻到了它。然后，他呆呆地伫立着，凝眸注视她娉婷的身影在清新碧净的棕榈树荫夹道的广场上渐渐远去。一个纯洁、坚毅、绝色的尤物！拉乌腊纳的热泪几乎滚落下来。

十六

罗梅利斯咖啡馆是一座年代悠久的建筑，室内的全部摆设都用一色镂空的花叶装饰，几面镶着雄狮铜饰的大镜子，熠熠闪光，柜台上雕镂着一幅蛇的图案，那大蛇仿佛从柜台上窜了下来，餐桌、椅子的腿上，吊灯的支架上，杯具的把手上，到处都依稀可见蛇影。三十多年前去世的一位当地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把这家咖啡馆着实赞美了一番，使它声誉蜚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市民们已经渐渐地把它淡忘，它的名气已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了。平日，这里顾客稀稀落落，大多是那些怀念着它的光荣历史的外地人，或者像拉乌腊纳这样喜爱安静和文学的人士，才乐意光临。罗梅利斯先生出身于以制做点心而远近驰名的家庭，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今天仍然热心掌管着这家咖啡馆，兴许也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为着纪念曾经光顾和歌颂过这家咖啡馆的作家。

七点差一刻，拉乌腊纳来到那里。他是很少在这样的时刻上罗梅利斯咖啡馆的。只有几位早晨或中午必到的常客。罗梅利斯先生坐在收款处的计算器后面，阿科泽男爵坐在餐桌边打瞌睡，莫斯卡和卢米亚是两位曾经身居要职的法官，几年以前告老退休，正在下跳棋，嘴上叼着托斯堪纳雪茄^①，旁边放着两杯玛撒拿酒^②。

① 意大利托斯堪纳大区出产的烈性卷烟。

② 西西里岛玛撒拿地方生产的名酒。

拉乌腊纳认识他们。他向他们点头致意，在座的人，甚至连平素最懒得理睬人的男爵，都认出了他。莫斯卡法官问他，今天何以一反常态，在这种时候来咖啡馆。拉乌腊纳解释说，他误了公共汽车，只好等着乘晚上的火车。他拣了靠近角落的一张桌子坐下，向罗梅利斯先生要了一杯白兰地。罗梅利斯舍不得雇一个侍者，他的笨重的身躯从用铜雕的花叶装饰着的柜台后面站立起来，慢慢吞吞地斟了一杯白兰地，把它端到拉乌腊纳的桌子上。拉乌腊纳从皮包里取出一本书来，罗梅利斯问他是什么书。

“伏尔泰的情书集。”拉乌腊纳回答。

“嘿嘿！伏尔泰的情书。”男爵吃吃地笑道。

“您读过吗？”拉乌腊纳忙问。

“我的朋友，”男爵说道，“伏尔泰的东西我再熟悉不过了。”

“今天谁还会读伏尔泰呢？”卢米亚法官感慨。

“我就常读伏尔泰的作品。”莫斯卡法官说道。

“噢，是的，我们当中不乏伏尔泰的读者；我不晓得，拉乌腊纳老师是怎样阅读的……不过，从周围的实际情况看，绝不能说伏尔泰是当今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家，或者，至少不能说今天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他。”

“言之有理。”男爵叹了一口气。

拉乌腊纳不理睬他们的谈话。罗梅利斯咖啡馆的这些老主顾之间总是这样争论不休的。沉默了好一会儿，每个人都默默地咀嚼方才谈话的内容，偶尔迸出两三句话语。约摸过了一刻钟，莫斯卡愤愤地说：

“那些叭儿狗是从来不屑于读伏尔泰作品的。”在罗梅利斯咖啡馆的词典里，叭儿狗是指那些政治家。

“伏尔泰？他们连报纸也不读的。”男爵接腔。

“就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读过一页马克思的作品。”罗梅利斯先生说道。

“那班人民党，”男爵迄今仍把天主教民主党称作人民党，“也从来没有读过一页斯图佐^①的著作。”

“哼，斯图佐！”莫斯卡法官打了个囁。

又是一阵沉默。时针指向七点一刻。拉乌腊纳匆匆浏览着伏尔泰一封颇为放荡的书简，顾不得理会它的意思，只管打眼梢瞟着咖啡馆的大门。谁都知道，迟到一刻钟或者半个钟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他并不急躁，只是感到惶恐。这两天来，惶恐的感觉始终蟠曲在他的心头。这是充溢着喜悦，但同时又混和着不安的惶恐，他恍惚觉得，露依莎（他现在内心里这么称呼她）正在他的身边，面对着他的母亲，等待着某种最终裁决。

八点差一刻的时候，阿科泽男爵又打开了话盒子，用明显挑衅的口吻对罗梅利斯先生说：

“话又说回来，您那位路易吉阁下可是不喜欢读伏尔泰的作品的。”他是指给罗梅利斯咖啡馆带来不朽的声誉、受到罗梅利斯先生最热忱、最狂热崇拜的那位作家。

罗梅利斯从收款处的计算器后面把脑袋和胸脯探出来：

“跟路易吉先生有什么相干？他读破万卷书，无所不知……如果他的视野里没有伏尔泰的位置，那是另一回事。”

“亲爱的罗梅利斯爵士，”莫斯卡法官插话，“我同意，是的，路易吉阁下的眼光跟伏尔泰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向墨索里尼致贺电，戴上钢盔……”

“请原谅，阁下，您也许没有向法西斯宣过誓？”罗梅利斯

^① 路易吉·斯图佐（1871—1959），天主教政治家，1919年创立天主教民主党前身意大利人民党。

的眼睛里闪烁着一股怒火，他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

“我没有宣过誓。”卢米亚法官举起一只手，说道。

“我倒记不得了。”莫斯卡法官回答。

“哼，你记不得了？”卢米亚快快不乐地说。

“噢，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不过，那纯粹是偶然的，法西斯分子一时疏忽，让你滑了过去。”

“压根儿不是偶然的，是我设法抵制了宣誓。”

“唉，宣不宣誓当时对于我们确实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莫斯卡感叹说，“要么咽下这口苦水，要么自取灭亡。”

“而路易吉先生却……”男爵冷笑了一声。

“在我们这鬼地方，”罗梅利斯先生反唇相讥，“嫉妒把人的心肝都吞噬了。路易吉先生写的作品受到全世界的崇敬，但在这里却被人形容成一个向墨索里尼打贺电，头戴钢盔的小人……神经病……”

谁也不理会他的愤怒和影射，因为这三个老头儿专以激怒他们的朋友为乐趣。

假若在别的场合，这一番唇枪舌剑会使拉乌腊纳很开心的，眼下他却几乎把露依莎迟迟不露面的原因怪罪于他们，因而显得焦躁不安。他站起身来，走到咖啡馆门口，打开门，向大街右边和左边依依张望。街上阒无一人。他又回到原处坐下。

“您等什么人吗？”罗梅利斯问道。

“不。”他干巴巴地回答。“她不会来了，”他暗暗思忖，“已经八点钟了。”

他又要了一杯白兰地，这使罗梅利斯先生吃了一惊。

八点一刻的时候，莫斯卡法官跟他搭讪：

“拉乌腊纳老师，近来学校里的情况怎样？”

“很糟糕。”

“怎么能好得起来呢？”男爵接腔说，“到处都呈现一片衰败的景象，学校自然也无法幸免。”

“言之有理。”卢米亚法官应声。

九点差一刻，心神不安的拉乌腊纳迷糊地觉着他的眼前出现了露依莎遭逢凶险的幻影。他很想把自己遇到的事情，把自己眼下的感觉，向这四个老头儿谈谈，他们的人生阅历自然更丰富，对人情世态的了解自然更深切。可阿科泽男爵指着拉乌腊纳合上的书，说道：

“阅读伏尔泰的这些书信，很容易让人回忆起一句关于忘恩负义的亲戚的意大利谚语，要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亲戚其实就是我们血肉之躯的一部分。”他还特地说明，伏尔泰的书信是写给侄女的。

卢米亚法官心直口快地道出了那句谚语。男爵又补充说，伏尔泰正好用了谚语里表示亲缘的那个字眼，而且是意大利原文；他向拉乌腊纳要了书信集，找到了那处地方，给朋友们朗读起来。

他们开心地放声大笑，一阵憎恶的感觉掠过拉乌腊纳的心头。“向这群玩世不恭、无聊至极的老头儿，怎么能吐露我的忧虑、我的痛苦？”干脆上警察局去吧，找一个严肃的、通情达理的警官，向他报告……然而，向他报告什么呢？莫非向警官报告说，有位女士跟他约会，在罗梅利斯咖啡馆相见，可她没有露面？简直会叫人笑掉大牙。报告自己心神不安的原因？这势必导致那架可怕的机器运转起来，不可收拾。再说，露依莎这两天里调查的情况他又知道些什么呢？倘使她获得了跟起先的推测截然相反的证据？或者，倘使她压根儿没有弄到任何证据？倘使她的女儿突然患病，或由于别的始料未及的原因，匆匆把她叫了回去？还有，倘使她一心一意忙于调查，竟把约会忘记了呢？

不过，透过这种种假设，他眼前又一次隐隐约约闪现出露依莎遭逢凶险、血肉模糊的幻影。

他怀着急迫不耐的心情，在柜台和大门之间来回踱步。

“您有什么心事吗？”男爵停止朗读，问道。

“没有，我在这里呆了两个钟点了。”

“我们在这里呆了好多年了。”男爵合上书信集，递还给他。

拉乌腊纳接过书来，放进皮包里。他瞧了瞧表：九点三十分。

“我不如慢慢地朝火车站走去。”他说。

“您搭的那趟火车，离开车还有三刻钟。”罗梅利斯先生提醒他。

“我稍许散散步，今天的夜色很美。”拉乌腊纳付了两杯白兰地的钱，向众人点头告别，走出了咖啡馆。他随手把大门关上时，只听得卢米亚说：

“他好像跟什么女人有约会，等得不耐烦了。”

大街上行人稀落。夜色沉静而美丽，但习习寒风，锋利得砭人肌骨。他忖量着那些叫人悒闷的假设，一面踽踽独步，朝火车站走去。

他折到火车站广场，一辆小轿车从他身旁掠过，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在他前面十来米的地方戛然停住，然后朝着他慢慢地倒车。车门打开了，司机探出身子招呼道：

“拉乌腊纳老师，拉乌腊纳老师！”

拉乌腊纳走近车子，认出他是小城的一个熟人，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

“上车站去吗？乘火车回小城去？”

“是的。”

“请上车吧。”司机热情地说。

“真碰得巧，”拉乌腊纳暗想，“这样可以早点回家，或许还来得及给露依莎家里挂个电话，打听一下情况。”

“谢谢。”

他上了车，在司机旁边坐下。风驰电掣的小轿车，在茫茫夜色中消失了。

十七

“他是一个孤高自许、沉默寡言的人，有时显得心情压抑，喜怒无常；像他这种人，是的，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兴许还很富于激情，可是，往往因为对一句话、一件事的误会，他会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应和冒昧的举动来……作为教员，他是无可指摘的：谨严，自觉，是位极出色的教员。他的学识很渊博，教学方法得当……从这方面看，我再重复一遍，他是无可指摘的……至于他的私生活……我不想草率地下结论，但作为一个男人而言，他的情感世界，我始终觉得——怎么说才好呢？充满了复杂的因素，叫人捉摸不透……”

“叫人捉摸不透？”

“也许这句话说重了，而且跟大多数人对他和他的生活形成的看法不相吻合；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是个心平气和，言行富有条理，作风极其严肃的人，他发表意见的时候喜欢开诚布公，直言不讳……不过，有的时候，即便很了解他的人，也会发觉他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怒气冲天，叫人望而生畏……在女教员、女学生面前，他简直像个厌恶女性的怪物，其实我倒觉得他只是胆小而害臊罢了……”

“这么说来，就他对待女人、对待情欲的态度而言，他叫人捉摸不透……”特派员追问道。

“情况大抵上就是这样。”校长肯定地回答。

“那么，昨天，他昨天的表现怎样？”

“我想说，很正常：上完课之后，他跟我，跟同事们闲谈了

一会儿。我记得，我们谈到了博尔杰塞^①……”

特派员的铅笔在备忘录上急速地记下了这个名字。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谈论博尔杰塞？那只是因为拉乌腊纳近来接触这个问题，他认为，人们对博尔杰塞过于贬抑，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

“您也持这种观点吗？”特派员猜疑地问道。

“说实在话，我很难表态；需要把他的作品重新读一遍……他的《卢贝》曾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不过那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亲爱的特派员，三十年了。”

“唔……”特派员哼了一声，他用铅笔神经质地把方才记下的博尔杰塞的名字划掉。

“不过，”校长接着说，“也许我们是前天谈论博尔杰塞的。昨天……反正我觉得他昨天跟平常丝毫没有两样。”

“这么说，您是肯定他昨天没有留在学校里参加个什么会议罗。”

“一点儿不错。”

“那他为什么对他的母亲这样说呢？”

“天晓得。毫无疑问，他试图隐瞒什么；不妨认为，他试图隐瞒的唯一事情，是跟某个女人发生的关系，或者说，假如不是暧昧的关系……”

“那就是约会，会晤，我们也作了这样的设想……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打他离开附近的餐厅以后，也就是下午两点半钟以后，他的行踪。”

^① 朱塞培·安东尼·博尔杰塞(1882—1952)，意大利小说家、诗人、文艺批评家，西西里人，著有《意大利浪漫主义批评史》、《邓南遮评传》和长篇小说《卢贝》(1921)等。

“他班级的一个男孩子上午告诉我，”校长说道，“昨天晚上他瞧见拉乌腊纳先生在罗梅利斯咖啡馆闲坐。”

“我能跟这个孩子谈谈吗？”

校长立即派人把孩子叫来。那男孩子证实，头一天晚上，他打罗梅利斯咖啡馆前面经过时，向里面膘了一眼，瞧见拉乌腊纳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正在读本什么书，当时将近七点三刻，也许是八点钟。

孩子打发走以后，特派员把铅笔和备忘录放回口袋里，站起身来，叹了一口气：

“好吧，那就上罗梅利斯咖啡馆走一趟，我得赶紧办完这件事，他的母亲早上六点钟就来警察局报案，正等着呢。”

“可怜的老太太……他对母亲是极其孝敬的。”

“谁知道呢！”特派员说道。

他脑子里闪现出一个想法，在罗梅利斯咖啡馆里，这个想法得到了证实。

“依我看，”卢米亚法官说，“他跟什么女人有个约会，情绪很激动，坐立不安。”

“他等待约会的时刻到来，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活像个头一回跟女人相会的小伙子。”男爵说道。

“您说错了，亲爱的男爵，在我看来，他的约会是定在这里，可那女人没有露面。”罗梅利斯先生纠正道。

“很难说，”莫斯卡法官喃喃地说，“很难说……事情跟一个女人有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两个小时以后，当他离开咖啡馆的时候，我们当中不知谁说了一句：他急着去跟女人约会了……”

“那是我说的。”卢米亚接腔。

“通常，赴约会的人总是乐意花费点时间等待的，可他的举

止，说实在的，与众不同，却打开一本书来阅读，又不时地抬起头来，一双眼睛紧张地瞟着大门，在大门和柜台之间踱来踱去，有一次，他甚至打开门，朝大街右边和左边张望了一会儿。”莫斯卡补充说。

“这么说来，”特派员立即抓住了这个细节，“他并不知道那女人打哪个方向来，该打右边还是左边来。由此不妨推断，他不知道那女人居住在城里的什么地方。”

“我们无法作出任何推断，”男爵不以为然，“现实从来远比我们的各种推测来得丰富，不可预料。要是您一定想作出什么推断，我愿意提醒您，假如他确实在这个咖啡馆等待什么女人，那么，这个女人应当是从外地来的……您想想看，此地的女人会在晚间七八点钟的时光，离开家门，到咖啡馆来赴约会吗？”

“除非她是娼妓。”卢米亚插话。

“他可不是跟娼妓厮混的男子。”罗梅利斯说道。

“亲爱的罗梅利斯爵士，您可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富有教养、傲世离群、一本正经的男人，火辣辣地贪求跟娼妓厮混哩。”卢米亚反驳道，“当然，要是有一个娼妓跟他幽会，地点宁可选择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旅馆里；而这咖啡馆，是恋人们相会的场所。”

“问题在于，”男爵侃侃而谈，“他究竟是在这儿有个约会，等待了两个钟点，因为女人失约，他便离开了咖啡馆，声称去火车站，结果失踪了；还是他不过是在这儿消磨辰光，约会时间到了，他便去赴约，失踪了。假如他在这儿等待那女人，后来发现自己受骗了，丢了脸面，或者女人因为鬼知道什么原因失约了，他焦虑不安，那他会如何行动呢？存在三种可能性：要么回家，躺在自己的床上发泄怨恨或者忧愁；要么打上女人家的门去，要求对方作出解释，却不料遇到第三者，使他一命呜呼；再不，他

自个儿跳楼或卧轨自杀。他既然没有回家，那就只剩下两种可能性。假如他在咖啡馆仅仅为了消磨辰光，后来便去赴约，可能性就只有一个：在约会的地点，他遇上了女人的丈夫，或父亲，或兄弟，要了他的命。”

“不过，细细追究起来，还不妨作出另外一个不够罗曼蒂克味的，却更自然、更实在的假设：他去赴约会，跟他喜欢的女人相见，他忘乎所以，竟把自己的母亲、家庭和学校，抛到了九霄云外……这难道不可能吗？”莫斯卡说道。

“我不相信，须知他是个禀性恬淡、举止行为极其稳重的人。”罗梅利斯摇头。

“言之有理。”卢米亚附和说。

“我的脑袋都快炸了。”特派员站起来。

男爵的推理自然没什么可说的，条理清晰，精确可信，但也给他出了个极大的难题。他对那些可能跟拉乌腊纳萍水相逢，发生偶然的关系，或者可能跟他一直勾勾搭搭的所有女人，逐一进行了调查。首先打全体女学生开始，十五岁到十八岁之间的女孩子今天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然后是女同事。男女学生的母亲们，至少是那些风韵犹存、讨人喜欢的母亲们。作风轻佻的女人和娼妓，或者说多少还懂得廉耻的女人和以卖身为营生的女人。这项工作看来无法收场，除非有朝一日拉乌腊纳像一只在别人家屋顶上度了几个良宵之后的猫儿忽然再现。

而此时，拉乌腊纳的尸体，正横卧在一座报废的硫矿渣滓堆上；硫矿位于省府和他的家乡的中途。

十八

9月8日，小城庆祝童贞玛利亚节^①。人们抬着金塑玉装的圣像游行，放烟火，喧嚣的音乐在城市上空回荡；先是宰猪杀鸡，开怀畅饮，最后是品尝冰淇淋。总司铎卢塞洛平素最崇拜圣母，教堂里供奉玛利亚圣像的祭坛也最受他的敬重，为了庆贺节日，他又恢复了在家里款待亲朋邻里的传统。这一传统已有许多年的历史，去年因为要对罗西奥大夫的身亡表示哀悼而被迫中断了。

8月刚纪念过惨案一周年，如今他的宅邸终于又在节日里敞开了大门；何况，他还要宣布他的侄子卢塞洛律师跟他的侄女露依莎订婚的喜讯。他表示，尽管世人对这件婚事抱着恶意的态度，但它出于天主奥秘莫测的意旨，他只得委身于天主的圣意。

“您瞧，我唯天主之命是从……”总司铎向路易吉·科尔瓦亚解释，“唯有天主知道我是不是赞成这桩婚姻的，他们两个像亲兄妹一般在我的家里长大成人；不过，自从发生那件惨案以后，这又成了一件修行积德的事情……自然，出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同情……我可怜的侄女，这等年轻，身边又有一个孩子的牵累，能够忍心看着她孑然一身生活一辈子吗？再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要给她物色一个好丈夫，不贪图她的钱财，却有一副温柔的心肠，跟她相亲相爱，视她的孩子如亲生女儿，那是可能的吗？很困难，亲爱的路易吉诺，太困难了……我的侄儿，说实在的，本不该娶这门亲，但终于下定了决心，我不敢说这是自我牺牲，但他

^① 相传九月八日是圣母玛利亚诞生的日子。

迈出了堪称充满仁爱精神的、正确的一步。”

“活见鬼！”站在总司铎背后的萨尔瓦乔上校听到最后这句话，愤愤然嚷道。

总司铎愣住了，陡地转过身来，但一瞧见是上校，脸上的怒气立即化作了微笑，温和地提醒他：

“上校，上校，您总是……”

“请原谅，”上校打断他的话，“您是位侍奉天主的神甫，以仁爱为本，当然是天经地义；可我是个老不死的罪人，看问题跟您大不相同。露依莎女士是位绝色超群的女人；您的侄子卢塞洛律师，神圣的天主在上，是个男人。我现在只是想说，男人嘛，终究是男人，何况是面对这样一位如花似玉、温雅风流的……”

总司铎戏谑地向他挥拳示威，悻悻地离开了他。上校转向科尔瓦亚，更加放肆地继续说：

“这个昏庸的神甫，竟跟我侈谈起仁爱精神来。我要是想追求一个女人，什么发狂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像那个女人……”

他朝露依莎指了指；露依莎一身雅淡梳妆，虽还有几分服丧的意思，却愈发显得丰姿楚楚，站在未婚夫的旁边；她瞧见了上校，对他彬彬有礼地颌首，莞尔一笑。上校好像觉得身子一阵发麻，凑到路易吉的跟前，附耳低声说：

“您可瞧见那动人的笑容？她微笑的时候，似乎是要袒露身子，卖弄风骚，叫我都动心了……”他蓦地扬起胳膊，仿佛要拔出佩剑似的，大声吼道：“子弹上膛，为了天主，子弹上膛！”

看他张牙舞爪的样子，路易吉以为他要朝露依莎扑去；谁知上校却冲向放点心的餐桌，那里开始分发冰淇淋了。路易吉也朝餐桌走去，遇见了圣安娜堂区神甫、公证人佩科利拉夫妇、泽里洛爵士夫人，他们絮絮私语，津津有味地对来宾们品头论足。路易吉没有那份兴致，离开了客厅。

公证人狼吞虎咽地吃下了冰淇淋，追上了他。他们倚着阳台，街上，人声鼎沸，节日庆祝活动又出现了高潮。路易吉闷闷不乐，发泄他的全部怨恨，从玛利亚节诅咒起，直到南方基金会、菲亚特、政府、梵蒂冈、联合国，他都一一骂遍了。

“我们全是受人凌辱的玩物。”他愤愤地说。

“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吗？”公证人问道。

“一切都不称心。”

“我们俩谈谈心吧。”公证人说。

“有什么意思呢？”路易吉懒懒地回答，“我知道的事儿，你也知道，人人都知道。何必谈它呢？”

“我好管闲事。另外，我有满腹牢骚事要发泄；我们是有六十年交情的朋友了，要是不跟你推心置腹地谈谈，我还能跟谁深谈呢？这些事儿，甚至对我的妻子我都守口如瓶的。”

“我们出去走走吧。”路易吉提议。

“上我的办公室去。”

公证处距离总司铎的寓所只有几步远，坐落在第一层。他们进到里面，公证人扭亮了电灯，关上门；他们面对面地坐下，各自细细地谛视对方，默不作声。过了片刻功夫，路易吉开口道：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谈心，你就谈吧。”

公证人沉吟半晌，尔后，像揭开身上的一块疮疤，痛楚而果断地说：

“可怜的药剂师死得好冤——他是清白无辜的。”

“多新鲜！”路易吉说，“他死后不出三天，我便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你自个儿明白的，还是旁人告诉你的？”

“旁人告诉我一件事，它帮助我弄明白了事情的内幕。”

“什么事儿？”

“罗西奥大夫发现了妻子跟堂兄私通，有一回，他当场捉住了他们。”

“不错。我也听说了，或许比你晚些时候。”

“事情发生后我便知道了，因为罗西奥雇佣的女仆，恰好是我姨妈克罗蒂苔家女仆的母亲。”

“噢……但我不清楚，罗西奥发现妻子跟另外一个汉子亲密地厮守在一起，他是如何反应的呢？”

“他毫无反应，扭头就走了。”

“我的天主！怎么能便宜了他们？要是我，非宰了他们才解恨。”

“是的，咄咄怪事……如今，世人既受嫉妒心支配，又被虚荣心所捆缚，所以才不乏戴绿帽子的模范丈夫……再说，可怜的罗西奥大夫狂热地爱着妻子。”

“我可以给你作番补充，因为这是我得来的第一手材料，玛特丽齐教堂圣器看管人亲自告诉我的，不过我请你……”

“你还不了解我吗？即使把我吊在十字架上，我也不会泄露的。”

“事情是这样：约摸有一个月的光景，罗西奥始终守口如瓶，后来，有一天，他去见总司铎，原原本本地揭发了他发现的那件丑事，并且向总司铎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把堂兄撵出小城，永远不再露面，要么他将向他的一位朋友，共产党议员，提供若干文件，足以叫他妻子的情人戴上镣铐，去服苦役。”

“可打哪儿弄来的这些文件？”

“看样子，罗西奥乘卢塞洛外出的机会，上他的办公室去了，那里一名年轻的实习生接待了他，对他说，律师出门去了，一时间难以返回；但罗西奥声称卢塞洛跟他约定此时会面的。中午的时候，实习生该就餐去了，他只晓得大夫和律师一向亲密无间，

并不清楚近来两人的关系恶化了……于是，他让大夫独自留在办公室里，罗西奥乘机把有关材料统统拍摄下来……卢塞洛一直蒙在鼓里，直到罗西奥向总司铎告了他的状，他方恍然大悟。总司铎告诉他罗西奥手里掌握的材料，卢塞洛气急败坏，把年轻的助手好生盘问了一番。实习生这才回忆起罗西奥那次突然的拜访，坦白说，他让大夫独自呆在办公室里了。卢塞洛惊骇无比，给了他一记耳光，把他解雇了。事情发生之后，卢塞洛重新细细琢磨了一阵子，终于又去把那年轻人找来，解释说，他当时感情过于激动，因为罗西奥大夫责备他失约，而他们原先约定的这次会面实在是太重要了；他送给实习生一万里拉，让年轻人继续留在身边当助手……”

“这些都是圣器看管人给你透露的吗？”

“不，我是从那年轻实习生的父亲那儿打听到的。”

“不过，卢塞洛会把这等重要文件随意放在外人唾手可得的地方吗？”

“这我可说不清楚，罗西奥也许事先配了一把保险柜的钥匙。另外，许多年来，卢塞洛为所欲为，踌躇满志，所以当时他毫无顾忌，自信没有人敢触动他的一根毫毛……当他的伯父把罗西奥发出的最后通牒一五一十告诉他的时候，他惊慌失措，顿时觉得一切都完蛋了。”

“情况正是如此，”路易吉表示同感，“可我姨妈克罗蒂苔的看法却相反，她认为，罗西奥遭到暗算，是由于那对情人无法再掩盖他们不可告人的勾当，无法再伪装成正人君子的缘故……一句话，是情欲作祟。”

“情欲……”公证人说，“那些人早已习以为常了，打他们在寄宿学校念书，回家休假的时候，就发生了暧昧的关系；起先瞒着总司铎，后来只隐瞒着丈夫；他们觉得其乐无穷，体味到一

种去干被禁止的勾当，去冒险的乐趣……”

谈话突然中断了，因为传来了轻微的、连续的叩门声。

“可能是谁呢？”公证人不安地自言自语。

“你去开门吧。”路易吉说。

公证人把门打开。泽里洛爵士一进门便说：

“你们干吗逃避节庆活动，却藏在这里说私房话？”

“嗯。”公证人冷冷地回答。

“你们谈论些什么呀？”

“天气。”路易吉回道。

“还是撇开天气不谈吧，幸运得很，现在天气很好，不值得一谈……坦白地说，我要是不跟人谈谈，我简直受不了啦；你们方才谈的事儿，正是我想说的。”他突然用手掌捂住心窝儿，咬紧牙关，好像忍受着一阵剧痛。

“如果您果真受不了啦，那就请吧，我们洗耳恭听。”路易吉说。

“你们不乐意一起谈谈吗？”

“我们能谈些什么呢？”公证人故作天真地问。

“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方才在议论这件婚事，议论罗西奥，药剂师……”

“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公证人说

“还谈到可怜的拉乌腊纳，”爵士继续说道，“他就像《基督的苦难》里的帕多一般失踪了。”

五十年以前，《殡葬》即《基督的苦难》一剧公演时，安东尼奥·帕多饰演犹大，按照剧情的要求，这个角色应当从舞台进入地道，像上百次排练和演出中发生的那样，地道的入口准时打开了，但人们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帕多活着出来，这却不是剧本规定的。这一事件后来成了一句谚语，形容那些神秘地失踪的人和

物。提到帕多，路易吉和公证人不禁快活起来，但他们马上显得很镇静，做出一副严肃、天真、忧愁的面容；他们避开泽里洛的目光，问道：

“这跟拉乌腊纳有何关系？”

“可怜的善人们，”爵士亲昵而又讥刺地说，“你们真个是天真无邪，竟然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你们抓住这个小指头，咬它一口吧。”

他摊开手掌，竖起小拇指，先伸到公证人的嘴边，然后伸到路易吉的嘴边，就像过去不讲究消毒的年代，母亲用这样的方式去磨炼婴儿刚长出的乳牙。

三个人纵声大笑。然后，泽里洛说：

“我知道一件秘密，我请求你们，除了我和你们，切勿泄露给外人……这件事跟拉乌腊纳有关……”

“拉乌腊纳，是个糊涂虫。”路易吉打断他，说道。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千方百计

作者= 莱奥纳多·夏侠著 李国庆译

页数= 2 3 4

S S 号= 1 1 1 3 0 6 0 2

出版日期= 1 9 9 4 年 0 6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